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张 耀 祠 回 忆 毛 泽 东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 前言

许多同志要我写点回忆录，他们说，把你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期间所知道的事写出来，让后人看一看。

毛主席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人民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贡献了他毕生的精力，感人的事迹实在太多了，由于自己的水平所限，不能生动地写出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几十年，因为工作纪律上的要求，对于看到的和听到的事不准作记录，现在仅凭自己的记忆作一整理。时间久了，有的内容和时间不一定准确。但所写的都是我在四十年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所经历过的事情。粗粗写出来，让世人了解、认识我们的领袖，使人们更加热爱我们的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珍惜今天的生活！

本书共有八个部分，其中大部分都是鲜为人知的情况。内容涉及各个时期，但相当章节是反映毛主席晚年时期的。

毛主席的晚年，由于年龄大、身体不好等原因，特别是 1966 年以后，他在用人上的失误，使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听不到真实情况，以至于使国家政局到了难以控制的程度。

我们在毛主席身边做保卫和服务工作的人员，与外界没有接触，许多事情也蒙在鼓里，当事情大白于天下时，无不感到痛心。

不管怎样讲，毛泽东是一代伟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晚年虽然有错误，但他是大公无私的，从不谋一己之私利，他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没有毛泽东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是不可磨灭的。我深深怀念毛泽东主席。

张耀祠

1996 年 9 月 9 日

## 第一章 走进中南海

我担负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任务，前后算起来有四十多年的历程，相当一部分时间与毛主席形影不离。从 60 年代开始，基本上是与毛主席住在一起的，很少回家跟亲人团聚。无论是毛主席住在中南海，还是外出巡视工作，以及首都开展一些重要的国事活动，大都在汪东兴同志领导下，由我具体负责毛主席的安全工作，紧随毛主席的行踪。

### 1. 组建 8341 部队

1953 年，中南海。

5 月的一个丽日，公安部第九局局长（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把我叫到中南海，他对我说：“调你来任公安部第九局副局长（中办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团长。”

中央警卫团是直接担负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任务的。

这期间，我是中央公安警卫师副政委。当汪东兴同志说要调我到这里来挑这个担子时，我感到中央警卫团直接担负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工作，这项任务艰巨重大。我怕搞不好，完不成任务。于是我就建议说：“最好另选别的同志来。”

汪东兴说：“党组织已经决定了，不要变了，你快点来，把中央警卫团组建好。”

我到职后，同机关的同志一道，一方面负责组建这支部队，一方面做好保卫“五大书记”（毛主席、刘少奇委员长、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副总理）的安全工作。此外，住中南海内的政治局委员、党政军领导机关以及住玉泉山、新六所首长和机关的安全任务都是由我们负责。

5 月初，我们以中央警卫师一团为基础，进行组建中央警卫团。中央警卫师一团的前身是延安时期的中央警备团的底子，干部比较老，经过几天时间的工作，一千多名干部战士选调齐全，按编制组建起来了。尔后，我们把组建的情况给总参谋部作了报告。总参决定，按照编制序列，中央警卫团的代号为 8341 部队。部队有了代号，机关对外联系工作，干部战士写家信，与亲朋好友通讯往来，都用 8341 部队的这个代号，不准用中央警卫团的番号对外，以利保密。

“8341”部队的代号就是这样来的，并非像社会上传说的那样神，有很多报刊、甚至有些权威性的报刊都说：“开国大典后，毛泽东派人访老道，老道写了‘8341’四个数字，毛泽东不详其意，就把它作为自己的警卫部队的番号了。直到毛主席逝世后，人们才发现，原来这个数字有两个预示，一是预示毛主席活 83 岁，二是在位 41 年。”细一推算，毛主席确已活到了 83 岁；从遵义会议到他老人家去世也恰好 41 年。如果要把“8341”这个代号分为两个数字来理解，这纯粹是一个巧合，绝不是什么老道的灵验。何况毛主席压根儿就没有派人去访什么老道。

8341 部队建制是规总的编号，根本没有必要再去琢磨这种数字了。

这支部队的建制是归总参谋部，警卫任务归中央公安部第九局领导。当时的公安部长是罗瑞卿同志。

6 月 9 日上午，我们在中南海团部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议。会上，由我宣布中央警卫团的成立。

我在会上说：“根据上级组织决定，由我兼任中央警卫团团团长。任命杨

德忠为中央警卫团政治委员，张宏为副团长兼团司令部参谋长，王化宇为政委兼团政治部主任，王连龙为政治部副主任，周广益为后勤部部长，程会仔任团后勤部副部长。”

尔后，我又宣布了团的编制，传达了中央公安部的指示，对中央警卫团提出了具体的任务和要求。

6月22日下午，我们在中南海东八所召开了全团军人大会。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央警卫师政委张廷桢、公安部第九局局长汪东兴前来参加了会议。

这些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强调说，中央警卫团的任务是保卫党中央领导核心和党政军领导机关，确保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在城市的环境里的警卫工作一定要搞得过敌人，只准做好，不准做坏……

后来，警卫目标增加了。北戴河、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外宾住地、毛家湾以及中央领导和外宾的行驶路线，均由中央警卫团负责安全。这样，到1968年，这支部队便增加到了数千人。

我们的警卫是以公开的武装形式同隐蔽的敌人作斗争。其对象有两类：一是职业特务，专门搞行动暗害，收集情报；利用金钱美女，收买引诱我内部立场不坚定的人。二是一些亡命之徒，他们对革命和革命领袖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

对此，这个部队组建不久，我对中央警卫团的干部强调安全工作时，给大家讲了敌人谋害领袖的大量事例。由苏联的列宁被刺，讲到中国的山东省军区黄祖炎被害。我对他们说，在党中央周围的武装警卫，它设立的每一个岗哨，都是防止阶级敌人的第一道防线，这一道防线如果被敌人突破了，就会危害安全。我们武装警卫，特别要严密防止没有时间地点、白天夜间和刮风下雨天伪装成各色各样的人混进警卫区，破坏我们的警卫目标。我还讲，警卫工作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失去了革命警惕性，离危险只差一步。什么是革命的警惕性呢？革命的警惕性就是阶级的坚定性，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安全的责任心。我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要教育部队具有高度的警惕性，防止和消灭各种‘暗箭’，保证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绝对安全。”我们要求部队不仅要具备英勇献身精神，还要学会同隐蔽的敌人作斗争的本领，既要心细如丝，又要不畏强暴。

此外，还要警惕另一种敌人，就是预防自然灾害，如火灾、电线起火、抽烟失火、水灾、地震。

在做好人身安全保卫的同时，我们也注重了政治保卫，维护政治影响。最初，中南海有的岗哨有时拦住了中央领导人的车，我们认为这是有关政治影响问题。为此，我们要求岗哨记住首长的车牌号、姓名、特征及其它记号，尽力熟悉机关人员，便于他们出入营门。还加强了保密工作。一个革命军人如果丧失了革命警惕性，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就等于向敌人缴了械，安全就没有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要受损失。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好，敌人搞不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机密情报，敌人就好比个瞎子，找不到我们的目标。有失密、窃密，才要重视保密，做好保密工作，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安

全。这支部队誓死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做到了“五个忠于”，即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职守。建国以来一直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政治事故。

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主席这里。内卫是8341部队一中队，无论是毛主

席在中南海，还是出巡，都紧随不离。

陈长江副大队长兼一中队队长、李连庆指导员领导一中队的全体同志天天跟毛主席在一起，他们敬仰毛主席，热爱毛主席，与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

毛主席一般是白天休息，晚上工作，这是从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改不了。但白天又很难静下来。那时，中南海麻雀成群，一中队的同志想了好些办法保持毛主席睡觉时周围的安静。一个战士建议说：“铲草除根，捣毁麻雀窝。”经过几天时间的努力，附近的所有的麻雀窝都不在了。麻雀失去了家园，不知道迁徙到什么地方去了，但中南海仍有不少鸟儿在叫。后来用土块打鸟，土块打上去，土散鸟飞，又没有响声，觉得这个办法最好，于是大家用土块对付那些喳喳乱叫的鸟，效果还真不错。

这时，一中队的警卫战士写了一首小诗：

同志，  
请你别吵，别跑，  
我们的领袖睡觉了，  
他昨夜开会一直到了拂晓。  
风啊，  
请你轻些，再轻些，  
让领袖安静地歇一歇，  
你看他前天办公到现在  
已有两天两夜。  
小鸟，  
请你别唱，别叫，  
让领袖舒舒服服睡个觉，  
下午他要接见先进工作者，  
晚上还要作报告。

一首小诗，表达了警卫战士对毛主席的一腔情和爱。其实，毛主席也爱护着身边的警卫战士，一些毛主席熟悉的战士调走后，便经常念及他们。如曾文，韩庆余等，都是在他身边干了很长时间的同志。主席每每提及他们，总是处于一种怀旧的留恋之中。

## 2. 我第一次站岗，就在毛主席的门口

1954年的一天，我陪主席去越秀山游泳，毛主席下水游了一圈，一上岸来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张耀祠。”主席又问：“你经过长征没有？”我说：“我经过长征。长征开始时，我在八军团保卫局，到了贵州黎平，就调到国家保卫局来了。”

当时我并没有讲我当兵的第一班岗就站在毛主席的门口，而那时的心里是非常明白的，但我感到在毛主席面前表白自己不太好，直到毛主席逝世我也没有给主席讲过这件事。其实，我自己最清楚，自从当兵以来，我的工作几乎就没有离开过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工作岗位。

这里，让我作一个历史的回顾。

我是1933年参加工农红军的，同年7月，调往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警卫连，担任保卫毛主席和政府机关的任务。

那时，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把毛泽东担任军队中党的、军事的职务全夺去了，只管一些政府工作，即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当然，

就这个职务，同样也是受中央保护的首脑人物。后来张闻天出任了人民委员会主席，毛主席仍然享受着一级保卫的对象。

中央政府警卫连成立后，边整训，边执行任务。这天，班长安排我上岗，这是我当兵以来的第一班岗，是“大姑娘坐轿第一回”，我没有想到这第一班哨就站在了毛主席门口。我站在那里，手持着枪，感到既紧张又激动。

不多会儿，毛主席拖着疲惫的身体出来了，他是到外面散步的，我心里反复默念着：“毛主席，是毛主席！”

下哨后，我兴奋地对全班同志讲：“我今天见到毛主席啦！”

那时，毛主席细长的个子，面骨突出，身体很弱，尽管两眼充满了血丝，但仍然显得炯炯有神。在战争年代的环境里，中央的领导每人每天只有十二两粮食，五分钱的菜金，生活非常艰苦，毛主席的身体状况显然属于营养不良。

1934年4月，根据组织决定我被调到八军团保卫局侦察科当科员。同年5月，部队从瑞金经过于都县，再到兴国县崇贤前线作战，与国民党的军队展开了几个月的激战。10月上旬，部队撤离前线，向于都县开进。“九九”重阳节这一天，部队过于都河。从此开始长征。那时，不叫长征，而叫“大反攻”，反攻到哪里？没有人讲。红军到达贵州黎平县，八军团分散了，这时我又调到了国家保卫局侦察科当科员。红军攻占了遵义城，当中央首长和毛主席进城时，我参加了保卫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入城仪式和毛主席向遵义群众演讲的安全保卫工作。

这些，主席是不知道的，我也从未给主席谈及过。主席挨整的历史，只有他自己才说得清楚。

终于，这一天来了。

### 3．南巡中主席同我的一次谈话

1962年夏天，我随毛主席出巡南方。

专列奔驰在江南的大地上。在杭州至南昌的途中，毛主席把我叫进了公务车厢，他正躺在床上看一本线装书。见我去了，放下书，挥挥手：“坐坐！”毛主席叫我去谈什么，我心里没有底。但我早就察觉到了主席对调走的战士很怀念，是不是要谈这件事情呢？于是我主动向主席作了检讨，我说：“主席，1959年上级要我们一中队的人减少一点，我当时没有请示主席，就把主席熟悉的同志调走了。”我说，“像曾文这样一些同志调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现在也不知道，若当时请示主席，就不至于发生这事！”

主席说：“是呀，应该给我说一声嘛！有些同志天天见面，现在看不见了，很想念他们！”

主席呷了一口茶，然后点上一支烟，又说：“这是小事，调走几个人，我这里的‘墙’也垮不了，过去王明，就把‘墙’推倒过。”

主席第一次给我讲了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情况。他说：“28个半（即28个半布尔什维克。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以王明为首形成的教条主义派别）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是不赞成的就要打，结果来了个二万五千里长征，把江西苏区搞垮了。”“那个时候，中央政治局开会，不让我参加，只让管点政府工作和群众工作，毫无发言权。”“一直到1934年11月，中央红军过了第四道封锁线之后发生了行军方向问题。红军要到湘鄂西与贺龙会师呢？还是打到贵州去？按照原定计划，是要到湘鄂西。在这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他们在湖南通道召开了中央军委，这

一回他们才请我去参加会议。在会上，李德、博古仍主张按原定计划向湘鄂西方向行军。我当时就发言说，‘建议中央红军放弃与贺龙会师的计划，改变路线，不向湘鄂西挺进，而挥师向西，尔后向北进入贵州。贵州情况要好得多，因为黔军力量较弱，类似在广西走廊遭受两面夹击的可能性极小。所以在贵州有可能获得喘息的时间，以便整顿被打散的部队，研究今后的行动计划。而如果按原定路线前进，就会遇上蒋介石所埋伏好了的二十万军队，一路上大山也多，我军就有被消灭的危险。’”

主席点上烟，接着说：“我这么一说，朱德首先表示同意，接着，周恩来、王稼祥也表示了赞成。”

毛主席对这一段历史实在是记得太清楚了。他说，“那时候，中国处在危急关头。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首先由博古作正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

毛主席搬着指头说：“我一个，朱德、王稼祥、张闻天、陈云等一些同志都在会上发了言。在讨论中，到会的很多同志对博古的报告很不满意，他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讲客观原因多，讲主观原因少，也不承担责任。许多同志发言严肃地批判了李德、博古‘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认为不解决错误军事路线问题，可能会使全军覆灭。当时朱德就说，李德在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中，命令红军打阵地战，其结果是丢掉了苏区，牺牲了很多人，最后，我们还是撤离了江西苏区。而西征开始的军事策略也是错误的，害怕接敌，仓皇逃跑，以致损失惨重，这也是中央的责任。如果继续这样领导下去，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了。”

主席呷了一口茶，说，“朱德讲到这里，王稼祥接上了，他说，同意总司令的看法，我重复一句，错误的路线必须改变，‘三人团’（注：博古、李德、周恩来）得重新考虑……他十分坚定地说，‘拥护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这时候，张闻天也站了出来，他说，‘请问博古同志能再继续领导下去吗？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顾问，我们自己要有点主见。我完全赞成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毛泽东同志。’陈云也说，过湘江的教训不能再重演了，‘三人团’的领导必须改变，博古同志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再继续领导下去是有困难的，希望大家慎重考虑。”

毛主席继续讲：“我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最根本的是在制定战略战术上犯了‘左’倾的错误，如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指挥者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赶到打，这样哪能打胜仗呢？这完全是瞎指挥嘛！”

主席谈得慷慨激昂。

谈到李德，主席说：“共产国际派李德到中国江西瑞金来当中国红军军事顾问，博古不懂军事，李德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就同博古结合在一起，博古把他奉为最高顾问，指挥一切。第五次反‘围剿’的重大军事行动都是李德决定的，推行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蒋介石调动了几十万军队，筑起了千万道封锁线，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而李德、博古则以‘先发制人’、‘六路分兵’、‘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一寸土地’、‘不打烂坛坛罐罐’的错误方针，同优势的敌人拼消耗，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

毛主席非常沉重地说：“中央红军撤离瑞金时，有八万多人，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过湘江，八军团打垮了，红三十四师几乎全师覆灭，兵力损

失了五分之三，到了遵义，红军保持四个军团的番号，一、三、五、九，实际上只有十六个团，一个干部团，还剩三万余人。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

“我们这个党啊，真是多灾多难！”

遵义会议后，决定由张闻天代理博古作总负责，由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小组负责指挥军队行动。新的三人小组的出现，情况就不一样了。

毛主席这次跟我谈话，我也提了一些问题，毛主席很高兴，他谈了四十多分钟。

火车继续向南昌奔驰，我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 4. 毛主席站在扳登上即兴演讲

1935年1月5日夜，红六团在团溪镇宿营。这个镇离遵义只有几十里路。6日清早，天未亮，红六团起床了。这时，刘伯承总参谋长骑马连夜赶到红六团团部。他对全团指战员作了动员，他说：“下一步打什么地方，大家都知道了。目前我们的处境还是比较困难的，要求我们仗要打得好，还要伤亡少，又要节约子弹，这需要我们多用点智慧才行啊！”

担任前锋的是第一营。营长曾保堂、团参谋长唐振旁走在最前头。唐参谋长在团溪镇上老百姓打听情况，找到了一位小伙子。他原在“侯家军”里当过兵，知道沿途情况。他说，离遵义30里路，有个山口，“九响团”就驻守在那里，只有过了这一关，才能进遵义城。

怎么叫“九响团”呢？

原来这个团上上下下都有一支一梭九发的“九连珠”毛瑟枪。号称那山口鸟也飞不过去。“九响团”的团长叫侯之担，人称“侯家军”。

红六团在当日夜晚，悄然包围了“九响团”，三下五除二，就被红军解除了武装。除打死的外，二百多俘虏畏缩在寒风细雨之中。接着，第一营换上了“侯家军”的军装，带着几个愿意参加红军的俘虏，准备诈取遵义城门。怎样“诈”？在这节骨眼上，刘伯承又冒雨赶到了，再一次对一营作了战前动员，指出应该注意的地方。他说：“遵义城里有敌人一个师，听说红军过了乌江，军心动摇。你们一个营先进城打敌人一个师，力量悬殊太大。但敌人是惊弓之鸟，一轰就跑。你们要有胜利的信心。同时要多用脑筋多用智慧。”

天黑，又下着雨，一营马不停蹄，直奔遵义城门。

俘虏用贵州土话喊开门。

城门上的哨兵问话：“那一部分的？”

“‘九响团’的。”被俘的“九响团”营长按照曾保堂的吩咐答道。

“‘九响团’不去守山口干什么来的？”

“红军打过来啦！”

“红军？红军不是还在乌江吗？”

城门上的那个哨兵叫来马排长，马排长用手电筒往下一照，见一群被雨水浇湿的穿“九响团”服装、挎“九连珠”的士兵。马排长盘问了一通，那位被俘的营长答得滴水不漏。于是，马排长下令开城门。

1月7日凌晨，城门开了，红军一涌而入。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红军攻进了遵义城。

老百姓看着身着侯家军军服的队伍一个个面黄肌瘦，就怀疑他们不是侯家军。当得知真情后，老百姓说：“我看你们就不是侯家军，侯家军一个个



都胖胖的！”并说：“我们非常欢迎你们来打倒侯家军，打倒王家烈。”

毛主席得知打下了遵义城，非常高兴。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打下的比较大的中等城市。

毛主席幽默地说：“知道吗？附近就是夜郎国，有个夜郎自大的人物就出在这里。到了夜郎国了，我们胜利了，红军将士可不能夜郎自大啊！”

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唐王朝时代的贵州府就在这里设立了遵义县，此后，便不断扩大其规模，有城墙城门，楼阁玲珑，但这个地方在那个年代并不出名，唐王朝也许并不知道有这个地方，更可能与洛阳、开封、西安相比，之所以它能扬名是因为红军在这里有过举世瞩目的历史性的转折。

为了严明红军纪律，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同志，积极做好政治工作，有针对性地向红军制定了《进遵义城八项注意》：  
（一）整齐武装服装。（二）不掉队伍。（三）不脱离部队，不自由活动。（四）到宿营地后出外要请假。（五）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六）不乱买东西吃。（七）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八）注意卫生，不乱屙屎尿。

为了保卫中央领导同志进遵义城的安全，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要侦察科、检查科派几个同志先进城，对城内敌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了解，部署好安全保卫工作。

我们进了城，住在新区，每天到新、老城区普遍找街道居民、商店店员、小商贩和学生对敌特及社会情况进行广泛的调查了解，并对逃离的原敌特以及军、警、宪和公安机关作了详细的查看。一边调查了解，一边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特别是向老百姓宣传红军的任务和性质。

军阀王家烈在贵州是一个土皇帝，横行霸道，欺压老百姓，无恶不作，老百姓早就恨之入骨，敢怒而不敢言。中国工农红军来了，老百姓非常高兴，热烈欢迎红军打倒王家烈。

1月9日遵义城喜气洋洋，街道两边，摆着烟、茶、酒、糕点等。群众早早排队站在街道两边，远远地等候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从他们的身边经过。国家保卫局侦察科、检查科的同志，身着便服，夹在群众中。国家保卫局特务队肩着驳壳枪，排列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两侧和前排，部队以三路纵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大街前进。群众看到中央领导同志走过来时，都热烈鼓掌，一时间，锣鼓阵阵，鞭炮齐鸣，口号声声，“欢迎中央红军到贵州来！”“打倒王家烈！”“打倒国民党蒋介石！”“打倒帝国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等口号声不绝于耳。中央领导同志满面笑容，频频向群众挥手致意，整个遵义城沸腾起来了。

进入遵义新城，过了桥来到老城。毛主席经过府衙门向广场走去。一时间，青年学生和市民便转头涌进了广场，到处都挤满了人。

毛主席注视着四周的人群，心情格外激动，看来他是要即席讲话了。

广场没有讲台，我们马上找来了一条长板凳，放在主席跟前，主席顺脚踏了上去，站在那里向欢呼的人群挥手。当时，我就站在主席的身后，跟群众搅和在在一起，密切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严防意外。

老百姓从未见到过毛主席，他们也不清楚站在板凳上的那个人就是毛主席。

站在我身边的几个青年小伙子指着凳子上的毛主席说：

“他不像毛主席，在大街上看到的那个高鼻子才是毛主席！”

这些青年人，把在大街上看到的高鼻子李德当成毛主席了。我心里暗暗发笑。

毛主席站在板凳上向群众讲道：中国工农红军来到贵州是要同你们一道，打倒统治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军阀王家烈，打倒国民党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毛主席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劳动人民，为什么祖祖辈辈都是穷人呢？富人为什么那样富呢？这是因为有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政策，对内发动全面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战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土豪劣绅对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国民党军阀的党、政、军所有的官员是一群贪官污吏，是专门敲诈勒索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吸血鬼，富了当官的和地主老财，穷了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我们无产阶级几千年来都是受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军阀官僚的压迫剥削。究其原因，最主要是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政权，没有自己的军队，人民就没有自由说话的权力。因此穷人没有靠山。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政权和军队，人民就有自由说话的权力，就有生存的条件。

毛主席站在凳子上，双脚一动不动，手却在不停地挥动着：“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谋利益、求解放的军队。劳动人民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建立人民民主政权。青年们要踊跃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壮大红军的力量。坚决打倒国民党蒋介石，打倒军阀王家烈，打倒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

毛主席又说：中国工农红军要北上抗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现在要把整个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全国各党派、各界人士、各方军队和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只要愿意抗日救国，我们都欢迎。共产党愿意同他们联合起来，一致抗日，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

1月12日，我从侦察科调到国家保卫局特务队任班长，担负保卫遵义会议的安全任务。会议从15日起，进行了三天。会上，对李德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撤销了他的军事顾问的职务。在离开遵义时，上级把李德交给我班负责看护。邓发局长指示：要注意三条：“一、不要他自杀了；二、不要他逃跑了；三，行军（特别是夜间）时和到达宿营地都要看得严，跟得紧，保证不发生问题。”

我说：“保证完成任务！”

### 5. 从雪山草地走向共和国新生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经常听他谈及红军在雪山草地的艰苦岁月，要求我们不能忘本，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建国初期，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共和国来之不易，我们现在虽然有些困难，但也不是二万五千里长征嘛，也不是雪山草地嘛！”毛主席不知有多少次向我们谈起红军过雪山草地的艰难，谈到动人之处，他就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来。我是一个从雪山草地上走过来的红军战士，是一个幸存者，我深深理解主席的这种心情。

红军是1935年6月开始过雪山草地的，当时我在国家保卫局，也不时见到毛主席，对这一段历史我一直记忆犹新。

我们平时讲的过雪山，实际上就是“夹金山”，它位于四川、西康边境，海拔四千多米，一上一下要走七十多华里，山上终年积雪，有四五尺厚。在长征时，我们在这一带跋涉地非常艰难。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跟我们一样，忍受着难以想象的艰难险境。山上空气稀薄，严重缺氧，憋得人喘不过气来，

浑身无力。在历史上，很少有人从这里走过，我们翻越大雪山无疑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壮举。红军于6月7日到达“夹金山”下，寒气阵阵向人袭来，大家穿上所带的衣服向茫茫雪山迈进，有的人从雪山上摔下去，过一会就被雪团淹没。

过了夹金山，到了四川北部懋功县的毛儿盖，部队休息了十几天时间，准备干粮，寻找羊皮和羊毛，为过草地作准备。毛儿盖地处大草地边缘，八九月份是草地雨季的高峰，我们经过草地时，时而下雨，时而下冰雹，时而又雨雪交加，狂风怒吼。站在草地，举目四望，茫茫一片荒凉，没有树木和房屋，没有人烟，没有一片干燥的土地，整个一片无人之境，难以见到一点人间的生机与活力，只有那腐烂了的永远浸泡在污水中的野草，无边无际。草地也有繁花锦簇的地方，但这样的地方往往就是陷阱，它的下面就是深不可测的沼泽，只要误入花丛，一分钟之内就会把你吞掉。我们要想在很快的时间越过草地，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天要走七八十里路，在草地整整走了七天。不仅要跟自然条件斗，同蒋介石和地方军阀斗，还要同张国焘错误路线斗。就这样，我们攀悬崖，过峭壁，涉急流，顶住了莫测的风暴，越过了无底的沼泽，战胜了饥饿的威胁，终于在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吴旗镇，同陕北红军会师了。在吴旗镇，毛主席对肖锋同志讲道：“你们算过没有？我们离开中央苏区已经走了多少天啦？”他沉吟片刻说：“到今天为止，我们共走了十二个月零两天，算起来，我们进行的战斗不超过三十三天，休息不超过六十五天，行军约二百六十七天，我们走了闽、赣、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我们已经走了二万五千里路程了。”

大家听毛主席这么一算，都喟叹不已。

据统计，红军在长征途中，路上共经历三百六十八天时间，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其中有十五天在打大仗；有二百三十五天白天行军，十八天夜行军，只休息了四十四天。在长征路上，平均走三百六十五华里休整一次，平均每日行军七十四华里。红军爬过了十八条山脉，其中五座山终年积雪。渡过大小河流二十四条，途经十一个省，占领过大小城市六十二个，突破了十个地方军阀的封锁包围，通过了六个少数民族地区。

在陕北延安，我们住了十多年时间。就在这期间，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错误路线在党内已经没有了市场。自然，共产党的力量一直是蒋介石的隐患，便派胡宗南的大军“围剿”延安。那时，我在中央警备团政治处当主任，相对平稳的生活促使我成了家，结了婚。但是胡宗南要来“围剿”延安了，我们不得不搬家。毛主席说：“失地是为了复地，为了整个全中国的胜利，他胡宗南来延安，我们让给他，但他没有想到国民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他还形象化地说：“当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 6. 撤离延安，进驻北京

1947年初，蒋介石调兵遣将，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胡宗南率数十万大军气势汹汹直扑延安而来。天上，飞机不断飞到延安上空进行侦察和轰炸。我们中央警备团有一个重机枪连，能对空射击，组成了三个组，分布在延安的高山上，担任防空任务。开始时，敌机低空飞行，我们打了几次，敌机不敢低飞了。

正当边区军民准备为保卫延安和胡宗南决战时，党中央审时度势，做出

了暂时撤出延安的战略决策。要放弃革命圣地——延安，中央警备团不少战士在思想感情上一时转不过弯来。他们说：“我们要与延安共存亡，坚决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决不让胡宗南占领延安。”绝大多数指战员说：“我们是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警卫部队，要坚决服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那里，我们就打到那里。”

毛主席说：“蒋介石打仗是为了争地盘，占领延安，他好开大会庆祝。我们就给他地盘，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员，缴获他的装备，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来壮大自己。这样，他打他的，我打我的了。等蒋介石算清这笔账，后悔就晚了。”“蒋介石占领了延安，双十协定就被他彻底撕毁了，他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我们撤出延安，意味着我们要解放西安，解放南京，解放全中国！这就是战争的转折点……”

1947年3月18日下午6时，中央警备团由刘辉山团长、张廷桢政委、古远兴参谋长、张耀祠主任带领二个连一个骑兵中队，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撤离延安。这时，胡宗南的部队分五路进攻陕甘宁边区。他的部队有二十四四个旅，二十三万人，十倍于我军的力量，当时，蒋介石命令他率领十万大军进攻延安，并集中了他的三分之二的空军力量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妄想给党中央以致命的一击。

在一片枪声中，中央警备团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安全撤离了延安。

在枣林沟，中央政治局开了一次常委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五个常委作了分工，由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前线为前委；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去河北西柏坡为中央工作委员会；中央机关在山西临县三交镇为后委，由叶剑英、杨尚昆等负责。

当时，毛主席说：“现在我们面临的很多任务，但是第一位的是在军事上打败国民党蒋介石。没有这一条，其它一切都无从谈起。”常委决定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全国的军事指挥，因为他是事实上的最高军事统帅，并由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同志的工作。

党中央毛主席留在陕北，这是一个英明决策，它既稳定了人心也鼓舞了士气，在政治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同时借以牵制住胡宗南的主力，减轻了华北、山东等战场上的压力，有利于刘、邓大军进军中原，早日转入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全军最高统帅部有意放在战争最前线，这在世界战争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历尽艰险，在前半年是最紧张的，先后进驻过十二个县、三十七个村庄，有力地指挥了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使中国历史发生了伟大的转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开辟了一条非常光明的坦途，用隆隆的炮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和毛主席离开西柏坡。十一辆吉普车、十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向北平开进，在当时来讲，这可是最大的阵容了。然而，就是这些车队，运载着胜利，运载着中国共产党的不屈的精神，也运载着共和国的新生，人们的脸上充溢着喜悦的泪水。就要到北平了，谁不为之而兴奋不已啊！走在前面的是带路的吉普车，第二辆就是毛主席乘坐的中型吉普车。

路上，毛主席对卫士同志说：“1947年3月18日，我们撤离延安啊……去年3月22日，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进军啊，今天是3月23日，与去年的3月22日，只差一天，我们又向北平前进了，三年三次大的行动，都是在三月份。明年的三月份应该是解放全中国了，等全中国解放

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毛主席还说：“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靠军队打出来的。我们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至取得今天的胜利，这一切都是在山区和边沿地区敌人不注意的地方、敌人不愿意去的和去不了的地方发展起来的。因为我们的军队能吃苦，能克服一切困难，才会有今天的胜利。”

1950年2月，毛主席在哈尔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他非常自豪地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之后，在陕北和恩来、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性的战争。”

周恩来总理接着说：“毛主席是在世界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战争，人们说，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周总理说：“这个奇迹为什么能够发生呢？因为有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和伟大的人民。而领导我们党、军队和人民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进北京了，毛主席成了中南海的主人，他为社会主义建设日夜操劳，费尽了毕生心血。在我跟随他的岁月里，他的工作精神、他的学习劲头，使我为之感动。在百忙之余，他孜孜不倦地看书，战争年代是这样，和平建设时期同样是见缝插针，博览群书。他认为看书就是休息。他涉猎的知识很广，《诗经》、《左传》、《国语》、《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以及国外的马克思、列宁的著作等，他都看。有的书他看了好几遍，做了不少标记和批注。一次，他指着《资治通鉴》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也有古为今用的治国策，我们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同样需要这些啊，芝麻开门，关键是要开巧。”他又说：“没什么了不起的，十二寡妇征西，走了多远的路？写在史书上就了不起啦，还有东征的，南征的，北征的，都未创造过红军的壮举。”毛主席谈这些话时，非常自信，显然这种自信是从书中获得的。我发现，书在他的生活中实在是太重要了，他常常手不离书。躺在床上他要看书，吃饭他要看书，上厕所同样如此，在他的厕所里，放着由他自己选定的书籍和铅笔，他一进去，常常好长时间就不出来，把工作人员等得很焦急。出外巡视工作，我们则要帮他带上二三箱子书，以便供他选用。1962年12月，我随主席到江西，当时他患感冒，发烧三十九度，几次我进他的卧室，都见他拿着书聚精会神地看着，我劝他：“主席！你发烧，要多休息，不要看书了。”他说：“哎，看书也是一种休息嘛！”

## 第二章 毛泽东在“滴水洞”的前后行踪

关于毛泽东在“滴水洞”与世隔绝 11 天时间的情况，在社会上众说纷坛，传得沸沸扬扬。的确，这 11 天，是毛主席思绪最复杂的 11 天，也是谜一般的 11 天。在这个“西方山洞”里，毛主席唯有的一次外出，不过走出洞口三百多米远。我把毛主席到滴水洞的前后情况记录如下。

### 1. 在杭州，叶群秘告罗瑞卿

1965 年 10 月，毛主席住在杭州汪庄。这里环境清幽，是一个休闲和思考问题的好去处。也正由于杭州山青水秀，中央的很多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我国的第一部宪法就是毛主席在 1953 年冬带一批文人在杭州起草的。

1965 年 11 月下旬，杨成武同志住在杭州空军疗养院。一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约我到 he 那里去一趟。

接到电话的当天下午我就去了。

到了他的会客厅，见了面，没有说几句话，叶群笑容满面地进来了（叶群是 1965 年 11 月下旬来杭州的）。

叶群开门见山地对我讲，“我这次来，是林彪叫我带来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

我接过信说：“好。我交给主席。”当即将信装进衣服口袋里。

这时，叶群神秘秘地离开了会客厅，出去了。过了一会，她又折了回来，对我说：“我给林彪打了个电话，林彪说，信要我当面交给毛主席。”

我说：“好，你当面交。”我将信又还给了她。

当时，我琢磨不透，叶群怎么这样变化无常，这里面肯定有鬼。我心里老大不快。

这时杨成武对我说：“很久没有见到毛主席，很想看一看毛主席。”

我说：“我给你向毛主席报告一下。”

我没有别的事，便告辞了。

回到主席这里，我将上述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报告。

毛主席“噢”了一声，没有讲别的什么。

第二天早上五点多，护士长吴旭君通知我，要我立即打电话告诉叶群，主席要见她，叫她快点儿来。

我给叶群打了电话，便站在大门等她。不多会儿，叶群来了，进了头道门，我对叶群说：“谈话不要超过两小时，主席还没有睡觉。”

谈话进行到两小时，不见叶群出来。我进去催了第一次，我说：“已谈了两小时了。”

到了三个小时，我进去催了第二次，我说：“已经三个小时了。”

时间已过四小时二十分钟了，我实在耐不住了，又进去催了第三次：“已经谈了四小时二十分钟了，主席该休息了。”

每次进去催他们结束谈话，主席都没有讲什么。他们谈到差五分钟五个小时，叶群才得意洋洋地走出来，眼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三次催叶群，只能听到她的话头话尾，联系起来看，是叶群向毛主席告罗瑞卿的状。她对主席说：“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有想到罗瑞卿跟林彪的关系搞得这个样子。”

叶群又说：“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部长让给他。”“林彪的位子让给他没关系，但会不会发展到‘逼上夺位’

的程度呢，我想是会的。主席，他是两眼盯着这个位置的。”叶群还罗列了罗瑞卿的一些罪名，她说：“罗瑞卿反对林彪‘突出政治’，他说，‘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应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当天下午，叶群回到苏州。她在电话上向吴法宪说：我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了罗长子（瑞卿）的问题。你不要外传。

虽然那时毛主席对叶群的这些话半信半疑。但主席对罗瑞卿的看法变了。

第三天，毛主席要见杨成武同志，我打电话通知后，很快成武同志来了。我陪他一块进去见主席，并告诉他：“谈话不要超过两小时。”

杨成武同志是一位非常恪守制度的同志，跟主席谈话不到两小时就出来了。

1965年12月上旬的一天，离开杭州来到上海，12月8日至15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会前大家都不知道会议内容，在主席住地休息室等候。谢富治东张张，西望望，发现就剩下一个罗瑞卿总长没有来。于是就问：“罗总长怎么没有来？”

其他一些同志都站在一旁闲聊，没有谁去答理他。谢富治这边转转，那边看看，还是没有看见罗瑞卿同志，便又一次问：“罗总长没有来，是不是忘了通知他？”

叶剑英看他老在问这个事情，便说：“主席不会忘事。”看来叶剑英已经知道了一点来头。这次上海会议是解决罗瑞卿同志的问题，是头一次会议，是不可能让罗参加的。会上，主要说罗瑞卿反对林彪的问题，给他罗列了许多罪名，罗瑞卿一直不承认那些不实之词，再三说明自己是支持拥护林彪的领导。为此，罗瑞卿同志受了不少冤屈。

“九·一三事件”后，对罗瑞卿的问题毛主席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偏听偏信不好，我已是半信半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以后对罗瑞卿的冤案作了彻底的平反。

## 2. 《二月提纲》收发内情

上海会议后，毛主席又来到杭州。

1966年1月，毛主席由杭州来到武汉，住在东湖宾馆。2月8日，彭真、陆走一、许立群等同志来武汉向毛主席汇报《二月提纲》的内容，当时毛主席问了一些情况，没有说不要发表。2月12日《二月提纲》下发了，这个文件我看过一遍，后来不知为啥又收回去了。

以后才知道，这个文件是彭真同志批发的。康生心里非常不舒服，他说：“这个文件没有给我看。”

很快，康生把这件事情告到毛主席这里来了。

康生要开会批彭真同志。他的想法是先避开彭真开个预备会议，统一一个口径，然后正式开会批彭真。但会前没有给毛主席商量好。四月的一天，毛主席要徐业夫秘书通知开会，他除了通知刘少奇、邓小平、康生外，也把彭真通知到了，两次会变成了一次会。这样，在会议上当面锣对面鼓，该怎么批呢？

康生在会上一本正经地说：“我反对《二月提纲》。《二月提纲》发出前没有给我看，我不知道，文件发了之后我才见到，这是彭真批发的。”

康生是一个精于权术的人，《二月提纲》是二月十二日印发全党的，康生看到势头不对，便见风使舵，进行反戈，极力攻击彭真，说《二月提纲》

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

彭真同志说：“文件经过会议讨论、修改后，送康生看了才批发的，怎么没有给他看呢？”

会议开了半天，就围绕看没有看而争论，毛主席说：“把《二月提纲》收回来。”这样会议结束了。

参加会议的同志陆续走了出来，我站在大厅门口，康生冲着我阴阳怪气、没头没脑地说：“张耀祠，你今年多大了？”

我说：“我五十岁了。”

显然，康生感觉我是在装傻，于是没好气地说：“你不聪明啊？”

我顶了他一句：“我就是不聪明！”

后来，康生把汪东兴同志叫去了，问道：“今天开会，张耀祠怎么把彭真搞来了？”

汪东兴说：“这你不能怪他，通知开会、管文件是秘书徐业夫的事，张耀祠是主管主席的安全，这有明确的分工。”

第二天，汪东兴把这个情况给我讲了。我感到这件事有必要给主席说明一下。当我给主席讲清事情的原委后，主席没有批评我，他说：“没关系，让彭真来听一听，也好嘛！”

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6月，毛主席决定去长沙。

### 3. 传说中的“西方山洞”

在韶山西面，有三座山峰，南面是龙头山，北面是黄峰山，西面是牛形山，滴水洞就环抱其间。它占地约五平方公里，只有一条公路蜿蜒而至。它的豁口是韶山水库，深幽清雅。三面树木挺立，杜鹃火红。有两山陡立，过去原有一桥，桥下是一小溪，桥头边有一个山洞，即使是天于大旱，洞中仍滴水不断，回声悠扬，其韵如琴，这就是滴水洞。只因毛主席由东而至，所以称它为“西方山洞”。

毛泽东的祖祖辈辈都在这里辛勤劳作。当地人很迷信风水，毛主席的祖父也是很信这个东西的。

有一次，毛主席讲：“我的老祖宗就住在滴水洞旁边的虎歇坪，为了选择这个地方，请风水先生卜了11天时间。”

毛主席还讲：“为什么又搬到上屋场来了呢（即现在毛泽东故居）？我父亲早年还是一个很勤奋的人，他没有看重风水，而是看重了这一片的土地好。”

毛主席给我们讲了一件趣事：他的祖父毛翼臣有一个哥哥叫毛德臣，他们在虎歇坪干活时，发现这个地方很干燥，任何时候的雨水都淋不到。毛主席说：“他们活着就在考虑死后的归宿，二人都想埋在这里。还不仅仅因为这里干燥，因为他们请了一个风水先生看了的，说这里是一个风水宝地，正好在‘龙脉’上。于是两兄弟争吵不休。”毛主席笑着说：“我看这个风水先生既会挑拨离间，又能平息一些事情，他说：‘这块土地告诉我，你们二人谁先死谁就埋在这里。’奇了，风水先生还能与土地对话。”他还说：“只有在封建时代是这样，谁愿意早一点死呢？死是一种自然规律，谁又控制得了呢？”

毛主席非常沉静地讲道：“不过，老祖宗是不能忘记的，我至今还很怀念我的母亲，我母亲非常善良，非常慈祥，济困扶贫，爱老怜幼，我不能忘



记她啊！”

毛主席讲这一番话，两眼含着泪光。谁能理解主席的这一孝母之心呢！有一次，主席看韶山县志，他说：“蒋介石要挖我的祖坟，这是失民心嘛，失民心者失天下。”主席在讲这话时，是很得意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最终胜利了，打败了蒋介石。同时，从另一个方面看，毛主席是很讲民心的，他有一颗慈祥的心。

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截断了山沟，滴水洞不复存在了，但两山相夹，仍是一个大洞。毛主席对滴水洞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的很多亲人去世就埋在这一带山上。

毛主席喜欢这个地方，夏日凉风习习，气候宜人，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1959年6月26日，毛主席回到了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陪同主席一块去的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同志。那一次，我没有去。但后来得知主席对湖南省委有一个建议，他对周小舟说：“你们省委研究一下，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房，省里开个会，其他领导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

毛主席又讲：“我老了回来住一住。”

毛主席讲修几间茅房，两年后变成了几间别墅。

在滴水洞的万绿丛中，有一座青灰色的四屋脊的平房，那就是被称作1号楼的房舍，是毛主席的下榻处。1号楼背着毛家的祖坟地，由坟地延伸而至，面朝龙头山，似乎也有风水先生测定。房屋倚山而建。房内的会议厅，还有两套住房。一套是主席住的，另一套是江青住的。但江青从未来这里住过。两套住房包括办公室、卧室、卫生间。从1号楼通过2号楼的回廊，有数间偏房，为卫士、服务员所居住。1966年我随主席南巡，就住在2号楼，是跟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住在一起的。2号楼是两层楼的客房，共有24间。3号楼有数层，就在进洞不远的山脚下，距1号楼和2号楼约有六百米左右，是主席的警卫中队、省委接待处的同志留宿地。

在60年代初，滴水洞一度成为禁区。修建它的时候，被称为“二 三”工程，对外是绝对保密的。修成后，除个别领导同志在此小住外，一般的人不得进入。由此，本来就很神秘的滴水洞，越发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 4. 毛泽东走进“西方山洞”

1966年6月16日，我们随主席乘专列离开了风景秀丽的杭州，当日到南昌住了一晚。

17日，列车直奔湖南长沙。在九所六号楼住了一个晚上。

这是毛主席继1959年的第二次回故乡。那一次，他写下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一回他又要写下一些什么呢？我们揣摸不透，但是可以看出，主席是有心事的。当然，如果从表面上看，主席是要避一避这闹哄哄的世界。

6月18日，下午3时，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和接待处处长肖根如陪我们一道直奔滴水洞。

主席坐在一辆吉姆车上，我同高文礼坐在前卫车上，走在主席的前面，主席的一前一后均有轿车。一辆大客车尾随在后，那上面坐的是随行的警卫人员。

到了洞口，8341部队一部分进了3号楼，我和高文礼、钱嗣杰及部分警卫部队住进了2号楼，毛主席住进了1号楼，都是我们事先安排好了的。毛主席下了车，沿着1号楼边走边看，抬首望望葱绿的群山，他高兴地说：

“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

当时，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跟我一起住在2号楼，一块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同时，也作了明确的分工，在滴水洞外围的高山要道，由当地的警卫部队负责，内卫警卫由8341部队负责。

时值仲夏，气温较高，滴水洞别墅没有冷气设备。肖根如处长亲自从长沙用卡车拉来几个大木桶和几块冰，分放在木桶里，用电风扇把冰块吹融变成冷气，使室内温度降低。

毛主席看见很高兴，他幽默地说：“这种‘土空气’不错嘛。”

#### 5. 主席在“滴水洞”思考什么？

在滴水洞里，我没有看见他写下什么东西。其它工作人员也都没有见到。

毛主席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看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按照主席的习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我们一般没有什么事，是不会去打扰主席的。那时主席对林彪既有看法，又有些宠爱。在每天所看到的材料中，都有林彪吹捧主席的话，主席看了非常不自在。特别是林彪讲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主席抱着疑惑的眼光自问道：“我的话真有那么管用吗？”他说：“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他的这些话，都写进了他给江青的信中了。

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他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了，他说“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焦了，烧焦了就不好吃了。”我认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其指导思想、需要发动的规模等就是在滴水洞中形成的。毛主席还说：“这样的运动时间不能太长了，两三年足矣！”但那时，毛主席没有想到，这场运动竟然被林彪、陈伯达、康生及江青“四人帮”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利用了去，做了大量的坏事，后来毛主席也控制不了他们了。

#### 6. 唯一的一次外出，不过离洞口三百米远

主席在滴水洞也想到了游泳。1959年他去过韶山水库游泳，这次主席是不是还要去游呢？

这天，主席叫我去，他说：“耀祠，你去看看青年湖能不能游泳？”

我说：“好吧。”

我没有带任何人就去了青年湖。说是湖，其实是一个大水库，把两山之间筑起一个大坝，这样储了很深的水，黑压压的，水面清澈，难以见底。

我在这里碰到了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拿了一把锄头，在水库旁边的地里干活。他见我在观看水库，便叹了一口气，说：“修这水库，把上面大片的土地给淹了，这些土地都是很好的土地，如果毛主席知道的话，他是绝不会同意的。”

回到滴水洞，我对主席说：“青年湖是可以游的，水面很清。”

我说：“我在那里碰到了个农民。”于是我把这个农民所讲的话学了一遍，讲到毛主席“是绝不会同意的”时，主席“嘿嘿嘿”地笑了。

一向有游泳爱好的毛泽东，却没有去游泳。叫我去看了青年湖，我说可以游，但他也没有去。我知道主席的脾气，我要是说不能游，主席很可能非去游不可了。当然，这次来滴水洞也许有着别的思想情绪上的因素，主席也没有去韶山水库游泳。

主席没有离开过滴水洞，要说离开，也只不过有三百米远。

22日上午，主席看见大门口旁摆着一个轮椅，感到很有趣，想坐一坐，出去转一转。

从1号楼出来，我和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中办警卫局处长曲琪玉、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四人陪同，由曲、高二人推着轮椅。毛主席坐在上面，有一种天真的童趣。

马路左侧紧靠大山，上不去。马路右侧是一条二十米宽的深沟，一条小溪流过，水很小。再往右，仍是大山，大雨滂沱时，山洪直泻而下，汇入这条小溪，轰轰作响，直往韶山奔去。

毛主席坐在轮椅上，左看看，右瞧瞧，都是青山和溪水。群山依旧，溪水如常，他没有多少兴味了，说：“哎，我们还是往回走吧！”

这样，我们推着主席从原路回来了，最多不过三百米远。

这期间，毛主席同我们照了一张像，这张像，我至今还珍藏着。

#### 7. “又要到白云黄鹤的地方了”

毛主席住在滴水洞，湖南省委有意把工作会议安排在离滴水洞较近的韶山宾馆召开。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得知毛主席28号走，便请主席跟他们开会的同志照个像，毛主席欣然同意了。

26日下午，毛主席在滴水洞1号楼前，接见了湖南省委开会的全体同志，并一块合了影。工作人员向我提出“我们大家都想和毛主席照个像。”我对他们讲：“你们等着，我向主席说说。”当我向主席提出大家的愿望时，主席说：“好嘛！”

28日上午，毛主席同省委接待处的工作人员照了像。这时，他对大家讲道：“你们走吧！”

说着又进了1号楼，坐下来，点上烟。服务员见主席又折了回来，便急忙给端上茶。主席呷了几口，把烟灭掉，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滴水洞。

在长沙大托铺铁路支线上了专列，主席自言自语地说：“又要到白云黄鹤的地方了。”

他显得很沉闷的样子。

6月28日，到了武汉。直到7月16日，主席才正式公开露面。他在武汉接见了大批外国客人。

在武汉期间，主席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的思想显然是主席在滴水洞思考的结果。

说是给江青写的，但主席还是给王任重同志看了。当时周恩来不在武汉，没有先给周恩来看。

为什么主席把政治问题，采用家书的形式写给江青，我认为里面主要阐明左、中、右的现实和这种政治现象的未来归宿，而这时的林彪正在成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同时林彪大吹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这两个问题毛主席都不便于公开讲。江青那时是“文革”小组领导成员之一，给她写信是让她对政治问题敏感一些，做到心中有数，也提醒江青注意自身的缺陷。

为了让大家比较详尽地了解这一段历史，现将毛主席给江青信的有关片断摘录如下：

江青：

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注：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注：滴水洞在杭州的西面、主席由杭州而去）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注：有诗写武汉“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我的朋友的讲话（注：林彪五月十八日，在政治局引用了古今中外大量的政变事实，要求全党高度警惕，并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当时主席看了就很不舒服。历史就这么怪，强调警惕政变的人到头来自己搞起政变来了），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注：《毛泽东选集》），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旭。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老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演习……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长，下次再谈。

毛泽东

七月八日

毛主席的信写毕，叫秘书徐业夫抄了一份留存，原信寄给了江青。然而，江青不但没有帮上毛主席的忙，反而所作所为与毛主席背道而驰。她接到主席的信后，感觉自己不得了啦，变得猖狂起来了，成了一位“复仇女神”，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毛主席这封信，已不失为一部“预言书”。林彪出逃后，中央把这封信作为批林整风的会议文件下发。于是，毛主席这封信便显得“高瞻远瞩”了，人们说，毛主席对林彪看得太透了。

### 第三章 毛泽东组织警卫战士搞调查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不仅自己经常到全国各地巡视工作，体察民情，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而且还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掌握第一手材料，50年代中期，主席特别注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出去搞调查，无论是秘书、卫士还是警卫部队的战士，都让他们调查农村情况，主席经常讲：“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上不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无从谈起，今天说好，明天说好，老百姓就是吃不饱，这不行呀，空的理论、空着肚子，我们就会愧对几万万民众啊！”

#### 1. “不能光吃青菜，还要吃点辣椒”

1955年初，毛主席提出：“从全国每个省和广西自治区、每个专区选调一名军队干部；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武汉五个大城市各选调一名军队干部，集中到中央警卫团一中队。”（一中队担负着保卫主席的安全任务）

人员到齐后，我们报告了汪东兴同志，汪东兴报告了毛主席。主席说：“我要和同志们见见面，讲讲话。”

1955年5月14日下午3时半，部队在中南海颐年堂前院列队等候。主席微笑着走到队前，以喜悦的目光把每个同志看了一遍，和蔼地向大家问好，干部战士心情非常激动，热烈而长时间地鼓掌。

主席说：“合个影吧。”于是主席在正中央，摄影师选好角度，快门随即咔嚓一声响了。

然后主席走到队前，坐在藤椅上，部队原地坐下。

主席问：“我们工作为什么目的呢？”

大家一齐作答：“为共产主义！”

“对的。过去打日本，再早一点是打倒皇帝，你们这里有没有打过皇帝的呢？一个也没有吧？”

全场一片肃静。主席说：“我就是皇帝的臣民，我头上的皇帝就是光绪、宣统。现在宣统皇帝在东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战犯，吃了饭没事了坐班房。”

警卫战士隐隐作笑。

主席说：“过去也有总路线，过去的总路线就是反帝反封建，把那些王八蛋赶走，然后才走社会主义道路。”

主席讲完党的历史后，着重讲了任务。

主席讲道：“你们都是做警卫工作的，光站哨，工作很单纯，如吃菜一样，不能光吃青菜，还要吃点辣椒。我现在给你们增加一项工作，不知你们同意不同意。”

大家齐声回答：“同意！”

主席说：“今后你们就是三项工作：一项是警卫工作；一项是学习，学文化；加一项调查工作。一方面回去看家，一方面搞调查，以看家为名做调查工作。你们为中央做点事，我通过你们和群众接触，你们要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真实地反映上来。但是可不要说是给毛主席做警卫工作的，是毛主席派来的。我们国务院就有这么一个同志，回家后召开干部会，说是总理派来的，结果这个同志还没有回来，国务院就知道了。”

主席说：“你们对人要尊重，要尊重父母、尊重老百姓、尊重区乡干部。不要摆架子，我的学问不高，我向你们摆架子，你们不会高兴，团长向你们

摆架子你们也不会高兴。所以不要向群众摆架子。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

主席接着讲调查的内容，说：“要调查生产的粮食、特产、花生、芝麻、烟叶，农民生活怎么样，粮食够不够吃，征购的情况，多了，数也数不完。还要了解干群关系好不好，农村干部民不民主，有没有强迫命令，打不打人。你们要尽量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

主席说：“现在有不少人说没有粮食吃，有一个是真的两个是假的。粮食部有五个干部说，老婆都骗丈夫，存着两千斤粮食说没有粮食。赵虎城他姐夫向他诉苦说没有粮食，赵在她家里住了两天后发现他有粮食。赵问他为什么哭穷呢？第一，叫了就是穷，第二，明年可以少卖粮，第三，人家都叫，一个不叫也不好。不要相信那些都叫的是饿着肚子的，顶多是百分之十是真叫没粮食。你们回家时，发现家里有粮食不要骂，心里知道就行了。要向农民宣传党的政策。”

“过去我们征了过头粮，今后不要征过头粮，允许农民完成征购任务自己存粮食，变非法为合法。”

毛主席联系当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一些情况，讲了统购统销有五条好处：“第一，对农民有利，保证他们有粮食吃；第二，对灾民有利，不会饿死人。去年水灾有五千万灾民，重灾六分之一，其中四千万没饭吃，不统购统销的话，就要饿死百十万灾民。老百姓讲是百年没有的洪水，五千年没有的好政府，我看是五万年也没有的好政府；第三，对经济作物区有利，种棉花、甘蔗、烟叶的可以买到粮食；第四，对城市人民有利，我国有八千万城市人口，产业工人手工业者、政府工作人员和军队，可以统一由国家供应，保证工业化的实现；第五，还可以出口换机器，拿些豆子出去，没有统购出口就少一些，统购了就可以多出一些，不能出得太多了，我们是一个缺粮的国家。”

主席说：“中国有一个好处，就是人多，有六亿，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多人。三国刘备破曹操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你们看过三国没有？”

大家一齐回答：“看过！”

主席说：“三国我们可以看，现在我们就是缺东风。什么是东风呢？就是缺工业，缺现代工业，有工业才有汽车、拖拉机、火车头、飞机、坦克、重机器、轻机器、细机器。”

主席说：“你们团结好不好啊，要互相关照，不要打架，要打不要打出了血，打掉了牙！分工合作是为了总的目标，团结起来，勤奋学习，调查，把工作做好。很对你们不起，进北京五年多啦，今天是头一次和你们讲话（指一直跟在主席身边的一部分一中队同志）。为人民服务，你们为人民服务，我也为人民服务。……已经五点钟了，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有时间再给你们解答。同志们再见。”

尔后，主席亲笔写了《出差守则》，他写道：“（一）保密——不要说这里的情况。（二）态度——不要摆架子。（三）宣传——解释建设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好处。（四）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五）调查——生产、征购、合作社、生活、对工作人员的意见。”

遵照主席指示，我们分期分批安排各个省的同志回乡探家搞调查。

回家的同志按照主席的要求，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和社员的会议，走访亲友和邻居，与社员和区乡干部交谈，将了解到的第一手材料报告给主席。

主席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听取调查汇报。汇报中，主席不时地提出问题问大家，和他们一块进行讨论。为了打消他们的拘束，主席先是和他们拉家常，问他们多大年龄，家住什么地方，路上怎样走，家里生活怎么样。主席亲切的询问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干部战士打消了顾虑，汇报会开得生动活泼，把他們要说的话很自然地主席作了汇报。同时也在主席对干部的种种询问中，学到了主席的一些调查研究的艺术。

主席的调查研究，是很能下功夫的，早在 1930 年，红军到达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寻乌县，主席在马蹄河畔召开了一次宣传会。大家都到齐了，主席第一句话就问道：“同志们，你们来寻乌做调查没有？”

大家回答说：“调查了！”

“那么，你们讲一讲，寻乌做生意中间，哪一类最多？”

有人根据寻乌县城人最爱吃豆腐、喝水酒的习惯，回答说：“大概做豆腐、水酒的多。”

主席说：“就算说对了，那么再说说，寻乌哪几家豆腐做得最好、最容易卖掉？又有哪几家水酒做得最好？”

这下可把那位同志难住了。于是主席把调查的结果告诉了大家。并说：“搞调查，不能走马观花，要深一些，细一些。要有分析，要有结论。”

有一次，一位同志对主席的军事战略很不了解，他直言地对主席问道：

“你的战略是从《孙子兵法》上面学来的。”

主席久久地看着他，空气也都凝固了。他探着头，问这位同志：“请问，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

直问得那位同志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主席说：“是嘛，办事说话都得讲个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乱说一气，毫无根据，这怎么行呢？这是我们革命队伍的作风问题。”

2. “中南海有反革命分子，

但不是那么多嘛！”

中南海，丰泽园。

夕阳西下，彩虹挂满了半边天，中南海泛着金光，岸边垂柳青青。主席正在他的卧室兼书房里批阅文件。1955年7月19日7时零5分，一中队队长韩庆余带领队员李金来、李好学、王文礼、胡全德前来报告他们探家的情况。

几人以军人特有的风范，立正向毛主席行军礼。

主席从桌案上抬起头来，离开座椅，一一地和这几位同志握手，高兴地示意他们坐下。韩队长把四个人的名单呈给主席。

汪东兴站在一旁对主席说：“这是一中队队长韩庆余，上次在钱塘江、湘江游过泳。”

主席端详着韩庆余说：“我好像很熟，在哪里见过。”

汪东兴说：“这个中队担任丰泽园周围的哨，直接负责主席的保卫工作。”

主席说：“中南海有反革命分子，但不是那么多嘛，哨可以减少一些，你们要多抽时间学习。”

主席面对李主来这个面目清秀的小伙子问道：“你们会不会游泳？”

李金来说：“不会。”

主席有点失望地说：“你们都要学会，跟我一块出去，我淹着啦，你们

好把我拉起来。”

主席指着韩庆余，却对李金来问道：“你们队长领导你们，打你们不？”

李金来坚定地答道：“不打！”

主席“嗯”了一声，讲道：“领导方法还好。”

主席十分幽默地说：“李金来这个名字很好，金子来了，我们国家要富强了。李好学，爱好学习，看来肚子里有不少墨水。”

刚开始的时候，都有些紧张，主席讲了这番话后，大家轻松了起来。

这时，主席点上一支烟，高兴地对李金来问道：“多大岁数？”

李金来说：“二十岁。”

主席见李好学显得很老成，就对他问道：“你结婚没有？”

李好学十分坦诚地讲道：“结过婚了，还有一个小孩呢！”

主席问过这些话后，说：“请你们来，谈一谈探家调查的情况。”他对李金来说：“你先讲一讲。”

李金来毫无拘束地谈着探家的见闻，主席时而沉思，时而做着笔记，时而插话，时而长长地叹着气，一直谈到7时35分。主席站起来对大家讲道：“走，我请你们吃晚饭。”

韩庆余说：“主席，我们吃过了！”大家听队长此言也跟着讲道：“我们吃过了！主席你自己用餐吧！”

主席说：“一顿便餐，喝一点酒，大家在一起热闹热闹。”

大家跟在主席后面走着。

主席停住脚步，回过头来问：“你们这个队有多少人？”

韩队长回答：“八十五人。”

主席说，“出去调查，有的省可以多一点，现在你们就增加到一百人。”

大家坐下来开始用餐，都感到有些拘束。主席自始至终总是怕这些同志吃不饱，告诉他们哪个菜好吃，并给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往碟子里夹菜。主席说，“你们吃，不吃就浪费了。”看见谁的筷子动慢了，主席说，“你不要太斯文嘛！”最后主席站起来，说：“来，你们劳苦功高，干一杯。”说完主席一饮而尽。

吃完饭，主席请李好学汇报探家情况，李好学乡音很重，听起来有困难，有时候根本就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主席说：“你不是李好学吗，就是要好好学习普通话，要不愧别人对自己的称谓，把你的材料递过来让我看一看。”接着又把李金来的材料拿了过去。

主席一手拿着材料，一手拿着红笔，讲道：“你过来，你们都过来。”大家一下子围到主席身边，主席说，“你们看，这是狭小，而不是陕小。”主席立即斧正了过来。见到文字通畅的地方，主席马上就讲，“这里很不错，有分析有例证。还有一分为二，你看这里，除八户外，其它的户作了例举，这就很不错。”

主席对李好学讲道：“你有点文化，要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你们都还很年轻，像初升的太阳，要不断发展，不断有所作为。”

李金来说：“这是头一次搞调查，没经验，没搞好，以后争取让主席满意。”

毛主席说：“嗯，这个文章写得还不坏，让人感觉有不少的东西。”接着他把王文礼、李好学、胡全德的材料批阅后，放在一边，讲道：“把它转给吴芝圃（河南省主席）看看，以后还退给你们保存起来，看你们的进步。”



就谈到这里吧。”

10时30分结束谈话，历时3小时30分。最后主席亲切地跟这些同志握手。

3.“不能让他吃大了肚子，叫他吐出来！”

7月25日凌晨5时50分，中南海静悄悄的。毛主席在丰泽园菊香书屋读《明史》，我对他说，又有一批探家的同志回来了。主席放书离案，说：“请他们进来。”

这时，一中队长带队员高碧岑、奉孝同、何玉秋、管楚良、饶和生走进了书屋。

主席问这几个队员：“你们都认识我不？”

“都认得！”大家一齐作答。

主席问：“谁是我的老乡，你们都是哪个地方的？”

高碧岑指着奉孝同和何玉秋说：“我们这三个都是湖南的。”

饶和生说：“我们是湖北的。”

主席笑道：“湖北也是我的半个老乡。”

主席问饶和生：“你多大岁数？”

“二十四岁！”

“没有那么大，我看只有十八岁。”

主席讲道：“下次回家到蕲县跑一跑，到处调查，到河北调查，只要是我们的地方就要调查，一年两次，十年二十次。”主席问管楚良，“你结婚没有？”

管楚良摇摇头：“没找到。”

主席仰头一笑：“那么多的姑娘找不到，是你要求太高了吧，不要急，慢慢来。”

主席看完管楚良的材料，不禁眼睛死盯在桌案上凝固了，因为管楚良反映了一位乡村干部贪污了400元公款的事实。

主席沉重地讲道：“不能让他吃大了肚子，叫他吐出来。”

这时，主席请这些同志就餐，他讲道，“头一次喝了酒，这一次还喝点酒，大师傅拿来喝一点。”吃饭很热闹，主席不时地给小伙子碗里夹菜，叫他们吃饱吃好。就完早餐后，主席开始看奉孝同的材料，一边看一边问道：“你还是讲新化方言？”

奉孝同说：“改了一点。”

主席说：“很难改，心难移，还带着那么一点，慢慢来就会好一些。”

主席进而讲道：“你们学不学文化？”

大家都讲道：“一周一天。”

主席问：“还学什么？”

“礼拜六党日活动和整理卫生，其余五天除一天文化课外，军政各一半（星期天休息）。”

主席听得很仔细、很认真，他探着头问道：“政治是什么？”

“全国党代会四个决议，最近学习反胡风反革命材料，检查思想。”

“那么什么是军事呢？”主席问道。

“制式教练。”

“长时期学这些怎么行呢！我们不打仗，又不是战斗部队，少学一点制式教练，要学一些文化科学。”主席指着队长讲道：“不能让他们当一辈子

兵，出去还干一点事。”他老人家扳着指头讲道：“要多学一些地理、历史、数学、物理和化学，五年中学毕业还是问题不大的。”

主席问韩庆余：“你打过仗吗？”

“打过。”

“在哪？”

“长春。”

“打过谁？”

“打过郑洞国。”

“你的对象还在北京？”没等队长回话，主席又问道：“你下面的人有没有不愿意在这里的？”

“有两个。”

主席很严肃地挥挥手说：“呆一两年让他们回去。”

主席陷入了沉思，一时间把他的思绪拉向了遥远的年代，他说：“在辛亥革命时期，我当过半年兵，那时不像你们现在，严格得很，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但也学到了不少政治上的学问。”主席转而讲到现在：“一年你们要回两次家，这是重要的政治学习。我当教员，你们是我的学生，看你们一年进步一年，你们每次回家回来向我报告一次，你们要有文化，有分析问题能力，又能从实践中走来，就将成为我的很好的耳目。”主席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也教导这些同志学会调查方法，他说：“要从

小事问起，哪怕小孩讲的话也好，往往在最不注意的地方最容易发现问题，了解到真实情况，粮食收成怎样？合作社怎么样？不能浮在面上，走马观花，这样不好，不利于我们作出决策。打仗要研究敌情才能产生谋略，搞建设要听取老百姓的意见，才能发展社会主义。”主席说：

“你们这些人都是23岁，是兄弟，要团结协作共同进步。”

当毛主席看到农民生活困难，顿顿靠洋芋充饥时，他讲道：“欧洲、苏联、德国这些地方，把洋芋看得贵重得很，也是可以吃的。”

高碧岑的材料反映，大食堂（当时有个别地区已有

了大食堂，高碧岑的家乡就是一例）的饭吃不饱，说他

姐姐把粮食藏起来了，以备饥荒，主席讲道：“共产党人，

不对就批评，要有大公无私的思想，不能吃独食，吃独食是应该感到有愧的。”

材料说，有个合作社主任，带头卖过头粮，家中现在没有吃的，身上瘦得没劲下地干活，主席说，“有这样

的好人，你再回去时看看他，看他改变了没有，现在就

写信问问他。”主席说，“吃独食不好，卖过头粮也不好，俗话说，家中有粮，心中不慌。”

这时，毛主席靠在沙发上，长长地吸了一口烟，第

一次这样讲道：“国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

吃饭第一。”他说，“这份材料写得还不坏，可以给大家看看，有分析有例证。以后两个月写一次信，内容——有没有吃的，生产情况，合作社情况，每年写个四五封信，回信拿给我看，那我就消息灵通了。写的内容你们再研究一下。李银桥我叫他往家里写信，我给他改了一下，要能说明问题，

要能提取到真实的情况。”主席说，眼下的情况是“新上中农思想起了变化，不愿参加合作社，老下中农愿参加合作社。”

主席挥挥手，讲道：“都回去一次，和汪东兴讲一下，统一研究一下，增加到一百二十人。这么多人去搞调查，两个省六千万人口的情况，三个钟头就可以把主要的地方跑到，我想的这个办法好不好？”

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好！”

主席说：“这个办法确实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各种情况可以了解到。”主席说，“我想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建立关系，你们见到了农民，我看见你们就间接见到农民（举起三个指头）就离这么远，你们是武装起来的农民，有了阶级觉悟。”主席说：“你们再回家不要宣传吃大锅饭，农民讨厌。吃大锅饭不自由……”

毛主席说：“华东五个省，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华北先回去一个省——河北，总共五个省，行不行？”

队长说：“可以。”

在毛主席看来，这不仅仅是可不可以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不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我这个党的主席就坐不安稳，因此他讲道：“这是一个重要任务，我这里可以减少两个哨嘛！最迟在下个礼拜一，你们都回去。你们去福建那个地方的，可以多给一点时间，在家不住九天，也不住十一天，满打满算，十天怎么样。”韩庆余说，去云南的，来回途中要一个月时间。主席说：“你们又不是救火，非得要赶那个时间，多给他们一些时间嘛，路远的可以坐飞机回去。”韩庆余说：“路费太贵。”主席郑重地讲道：“这是公事，这是任务。”

#### 4. 自己调查的东西自己写

7月26日，韩队长带领第三批队员向毛主席汇报探家情况，有广东的曾文、叶遥、王燕宇，广西的凌理德、蓝宝华和江西的邱永香。李银桥向主席说，“你邀请的队员来了。”

主席说，“快请他们进来。”七个同志走进来了。主席说：“快坐下。”

队长把六个人的材料交给主席，主席先看曾文的材料，说：“写得好，写得好，你调查很好！”主席问道：“你会耕田吗？”

曾文坚定地说：“我会，我还会打铁！”

主席说：“喔，不得了，你还是重工业人材。”

继而问道：“你父亲也会打铁？”

曾文说：“会。我就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主席问：“你们那个地方女的也会耕田吗？”

曾文：“我们那里依靠女的耕田，男的做手工业。”

主席：“你们家参加合作社没有？”

曾文：“我母亲参加了。”

主席：“你母亲多大岁数？”

曾文：“五十八岁。”

主席说：“她还能劳动？”

曾文想了一下：“顶半个劳动力。”

主席：“参加合作社，有没有时间回家干活？”

曾文：“有的合作社一星期可以抽出一天时间干自己的活儿。”

主席：“这样好，”主席说，“要分清中农多少，贫农多少，下次要调

查他们的态度，他们对合作社持怎样的意见。新中农是共产党帮助翻身的，他们就赞成参加合作社。”

主席问：“你家是否比去年好一点？”

曾文说：“分给个人的土地不交租，现在粮食还是够吃的。”

主席：“你回家带点什么东西？”

曾文：“带点钱。”

主席把拿在手中的材料用手指点了点，说：“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写的？”

曾文：“别人抄了一下。”

主席把头往后一靠，笑道：“我不是看表面文章的，字再漂亮，内容空空，虚有一手好字。你们是给我提供情况的，而不是提供书法。”主席指了指案上，“那么多的书法真迹，我学一辈子也学不完，我通过你们进行社会调查，要学的是社会学，解决的也是社会问题。以后不要叫别人抄了，别人抄了，就不新鲜了，你们自己调查的东西自己写，就给人一种很原始的感觉。”

转而主席问道：“你们那里女人很厉害，是女人作主吗？”

“不是。”

主席讲道：“几千年前是女人作主，母系氏族社会，女人的天下，你男人人生不出孩子，就只能俯首称臣，因此，男人在女人面前，哪里敢说一个不字。”

叶遥讲道：“我们家就是女人作主。”

主席笑道：“你爸爸就俯首称臣了。”

在场的同志都笑了。

叶遥说：“是的嘛，我爸爸是受我妈妈管。”

主席看完曾文的材料，尔后看王燕宇的材料。王燕宇这次回家，见到了他家乡的一个地主，他曾经为这个地主放过牛，过着衣不遮体饭不饱肚的生活，便逃出来参加了革命，这次回家地主对他很不满，见到王燕宇连招呼也不打，背地里有说不完的风凉话。主席看到这里，问王燕宇：“看见你不打招呼，调查一下为什么不满，看他的态度。不能这样嘛，你翻身了，再不为他放牛了；他打倒了，成为普通劳动者了。其实，大家都是劳动者，并不是格格不入嘛！”主席说：“我跟你商量，你下次是否可以主动去看他？”王燕宇说：“可以。”“这就好嘛！他的态度好，打心眼里拥护共产党，我们就团结他，跟我们一道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主席还是那句话：“你以后不要叫别人抄，我要看你自己的。”

主席抬头看看钟，“喔，已经八点了，饿得要死！”他对李银桥说：“快去拿饭！”

毛泽东看完王燕宇的材料，接着看叶遥的材料。叶遥的材料也有地主的情况，说：“反革命，让他们参加，住几年合作社就会改变。”主席问：“你上过学校？”

叶遥说：“上过初中。”

主席说：“还不错。”

说话间饭菜上了桌。主席跟上两次一样，还是热情招待。吃过饭便看起凌理德的材料来，主席问凌理德：“你会耕田吗？”

凌理德：“会。这次回家和老百姓干了九天活。”

主席：“用这个办法好，和他们打成一片，可以了解到很多东西。你跟他们在一起，听没听到对我们的政策乱叫的？”

凌理德：“中农在三定后有叫的。”

在凌理德的材料中，其中有一个部分专门反映农民生活困难的问题，很多农家吃“黄狗藤”，主席说：“喔，是这样，以后捎一个给我看一看，怎么样？”“可以。”

主席：“你能不能到钦县看一看，那里有没有你的亲戚？”

凌理德：“可以去，那里有我的亲戚。”

韩队长站在旁边，一动不动，主席转过头来对他讲道：“下次给他十五天的时间，在家住十天，在钦县住五天。”

主席接着看蓝宝华的材料，说：“你例子举得好，思想也不坏，有政治头脑。”他看着看着，问道：“瑶族为什么不成立自治区？”

蓝宝华说：“农民反映，地方政府解释，以前可以，现在宪法规定是不可以。”他进而讲道：“现在有的农民政府贷款说是生产，实际上却在写呈文闹自治。”

主席说：“专门闹，这不好。搞调查工作的，广西南宁增加一个，桂林增加一个。”

韩队长说：“主席，城市调查什么？”

主席说：“城市能了解什么就了解什么，要抓住问题，要抓普遍的东西。”主席沉吟片刻，大声讲道：“你们帮助我作一点工作，赞不赞成？”

大家一齐说：“赞成！”

最后毛主席讲道：“了解情况是一个学习。有的调查很简单，以后多调查几个问题，一二个，二三个，四五个。好了，你们可以去落实了。”此时已是9点55分了，历时3小时20分。

## 第四章 毛泽东挥臂搏击江海狂涛

毛主席酷爱游泳，他那与风浪搏击的力量并非一朝一夕而练就的。他从小学会了游泳，而且水性很好，他家门前的“小池塘”，并不深，几乎每年的夏天，就是他和同龄人的天下。青年时代，便以诗言志：“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展示主宰世界、搏击惊涛骇浪的巨大精神力量。走上革命道路后，游泳便提高了层次，特别喜欢到大江大海去游。建国初期，因环境和条件所限，加之主席工作非常紧张，也抽不出大块的时间去游泳，只有在北京或到各省市巡视工作时，见缝插针地到室内游泳池里游它几个来回。真正到大江大海去游泳，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主席说要去游泳，那谁也拦不住。我们也只能按照他的意图，保证他游泳的安全。毛主席常说：“游泳是同大自然斗争的运动，应该到大江大海中去锻炼。”

### 1. 击浪北戴河

1954年仲夏，毛主席搬了几大箱书来到了北戴河。他每天工作到晨光破晓。批阅文件，为新华社修改社论，吟读《史记》，非常疲困。正如他在《贺新郎》词中所写的“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一天下午，主席举起双手，伸了一下腰说：“走，去观潮落。”我们走到海边，海面突然狂风大作，平静的大海在一瞬间咆哮起来，波涛汹涌，拍击海岸，卷起千堆雪，不多会儿，碧波变成了泛黄的浪涛。主席见到如此翻腾的大海，心情激动起来了，脸上露出一种要征服潮水的欲望，阵风吹动着他的衣衫“叭叭”直响，工作人员尾随在主席的身后讲道：

“主席，风大了，我们回去吧！”

主席说，“走，下海去！”

工作人员劝道：“今天风浪太大，不要去游，等到天气好了，我们再去游泳吧！”

主席说：“风浪越大越好，这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增强一个人战胜困难的勇气。”

主席一声不响地脱了衣服，只穿一条短裤，他看着卫士和一中队的战士说：“你们害怕吗？”

战士回答：“不害怕！”

毛主席说：“你们可以跟我走，也可以不跟我走，可以在岸上看，也可以回去。”

战士回答：“我们跟主席走，我们都不回去。”

主席直往大海走去。

面对滔天的浊浪，主席一直往深海处游去了，朝着迎面扑来的海水一起一伏地游着，时而被狂涛掩盖，时而冲出浪尖。孙勇、韩庆余及十几个战士围在主席前后左右。但是，茫茫大海，海水深，风浪大，大家都非常担心怕出事。

毛主席是游泳能手，水性好、游技高，水上耐力强。他在浪尖上大声喊：“放心，都不要慌。……现在是涨潮，沉住气，只有被冲上岸，不会被拖入海去。”不一会儿，他又在浪尖上喊：“现在是考验你们的胆量呢？”主席在风浪中游了一个小时才上岸来。朱仲丽同志见主席安全地上岸，高兴地迎了上去，向主席问好，并劝说：“主席，风浪太大，今后不要再冒这样的险了。”

主席沉稳地讲道：“你们不要怕什么冒险，凡事不冒险，就不能成功，许多成功就是通过冒险才取得的。这取决于一个人有没有勇气，敢不敢于排除万难。我说你们要有决心和信心，当然不是盲目地冒险。”

主席的工作是没有白天黑夜的，他游泳也是不分时候的。有几天，工作很紧张，几乎每日都在看文件，思考问题，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讨论国家大事。这天下午，他坐不住了：“走，我们到海边去！”周恩来、朱德也跟了去。

主席往身后看了一眼，便给游泳“高手”孙勇使眼色，示意跟他走在一起。孙勇急忙跟上主席。

孙勇说：“主席，我们不要走远了，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雷阵雨。”

果然，一到海边，天空突然黑了下來。刹时霹雳一阵雷声，撕破了海空，海水像传说中的海底巨龙在使劲地搅动一样，不停地翻腾着。

主席说：“你先下去看一看！”

孙勇纵身跃进了浪谷。

这时，海上除了主席与孙勇一批人外，见不到一个渔民，这些渔民就在刚才的那一阵雷中纷纷摇桨上了岸。

周总理、朱老总见到主席要下水，一下子慌了神，远远地使劲地喊：“不要下了，不要下了！”一边急呼，一边向主席跑来。

可是，这时主席已经下水了。

四处雷声不断，暴雨劈头盖脸地打来，岸上的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早就成了“落汤鸡”，他们仍在喊主席不要下水，为了让主席听见，还加大了声音。但是，风声、雷声、潮声早就把喊声淹没了，主席跟孙勇他们在波涛中任情地搏击。他一会儿是面朝天，一会儿是对着水，尽情地感受着狂澜怒涛和乌云阵雷，他也分不清哪里是海，哪里是天，好象天是倒挂着的海，海是倒挂着的天。这时，主席对工作人员说：“不要怕，海水就是被子，我们钻进了棉花套里了！”正说着话，他被海水冲到了一个同志的身上，这位同志正要拉他一把，可又一个浪头把他两人打开了。一位工作人员说：“主席，雨大了！”毛主席说：“没关系，雨大了多在脸上抹几把！”不知游了多久，他们见到了一只被海浪击破了的打渔船，主席担心地说：“刚才我见到了几个打鱼的，不知道出事了没有？”一位同志说：“不会的，这只船刚才靠在岸边的，上面没人，是被水卷到这来了！”主席说：“那就好了。”真是“一片汪洋都不见”，岸上的人们一个个都惊呆了，慢慢地，他们由担心到观赏，由观赏到赞叹，只见主席似浪里白条，波峰起伏，任凭遨游。不知游了多长时间，主席才靠近了岸边。这时，云散雨停雷声息。朱老总说：“主席偏偏游了这段风险时间。”在场的中央领导同志见到主席身上已被海水刮出了一道道血迹，都说：“快上来，快上来！”

主席上得岸来，甩打着身上的水，不住地讲道：“今天真畅快！”这时候，周总理、朱老总等领导同志才真正如释重负，悬着的心落了地。但主席却说：“秋风萧萧，洪波涌起，算不了什么！”接着，主席谈起刚才化险为夷的情景，感慨地说：“征服急难险恶，你强他就弱，不能怕，一怕，喝上几口水，就胆怯了，就被海水制服了你！大凡世界上凶恶的东西也是这样的，你表现得怯懦，你就会遭到凌辱，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看起来样子是可怕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朱老总说：“主席善于联想，当年你骑在马背上，就一步三叹：惊回首，

离天三尺三。”

周总理一副严肃的神态，他说：“还有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主席说：“那是过去，那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大志！”

转而总理说：“今天总算可以了吧，我们叫都叫不住。”

主席说：“我一个心思斗海浪，思想高度集中，哪里听见你们在叫！”

次日，主席欣然提笔写道：“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主席在诗中表现出了自己的感怀，公元207年，曹操和乌桓族作战凯旋，曾经路过这一带，留下了《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在主席看来，在中国大地上纵横驰骋的魏武，虽然雄视八方，但是时过千年，他所遗留下来的，只不过是一段漫长的动乱历史和一块早已成为陈迹的碣石。这里主席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白浪滔天、不知边际的大海以及在波涛中搏击的渔船，而且把大海与历史的脉络联系起来，让人感受到了美好的未来。“年年皆秋今又秋，今秋人间胜前秋。”

## 2. 突然提出游珠江

1955年，主席住在广州的小岛上，每天要处理大量的工作，而且还常常手不释卷。

夏天的小岛，热气腾腾。一段时间来，主席一直是在游泳池里游泳，而且每次去游泳池都提前告诉我们，以便作好安全准备。

可是有一天，他在书房里坐不住了，突然放下线装书，对工作人员说：“走，我们今天不去室内游泳池，也不去越秀山的室外游泳池，我们去游珠江征服海浪。”

主席说话是算数的，说走就要走。我们见此情景一下子慌了手脚。

主席来到江边，脱了衣服就要下水，搞得我手忙脚乱，急急忙忙地找来了一批会水的同志一块下江游泳，并找来了船只，以确保主席的安全。

主席在水中叫道：“喂，干么子，你们不要站在岸上，会水的都下来。”

急急忙忙赶来的罗瑞卿、陶铸同志累得汗流浹背，罗

·沼·瑞卿说：“你游吧，还有一批客人在等着你呢！”

主席说：“转告他们，我游完泳，谈话更有精神！”

其实根本就没有客人来，罗瑞卿是想让主席早一点上岸。说着话，主席游远了。跟随他游泳的同志无拘无束地谈着，好像他们都躺在绿色的草坪上。

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到大江大海去游泳，至少有三条好处：一是不受任何限制，天高海阔，自由自在，其乐无穷；二是紧张的工作之余，转而全身心地投向大海，动了筋骨，舒了身心，全身得到了放松；三是游泳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息。再增加一条是，磨练一个人的意志，增强征服大自然的勇气。”

## 3. 初试长江水

1956年5月初，主席还在广州小岛上，这里天气炎热，他觉得再游珠江，或者是游越秀山游泳池，感到不过瘾，他想到了武汉，想去游长江，那里江水滔滔，奔腾东去，不说历代的帝王将相，就是当今的许多高层领导人，谁又从此岸游到彼岸，主席决心要破这个先例。

但是，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他对卫士长李银桥说：“银桥，我们走



吧，到长江边上去，我们去游长江。”

李银桥向汪东兴报告了主席要去游长江的想法。汪东兴又马上报告了罗瑞卿部长，说主席要去游长江。

当时，罗瑞卿、王任重、汪东兴和保健医生都不同意主席去游长江。他们去劝说主席不要去长江游泳，说那里很危险。

主席见他们阻止自己去游长江，生气他说：“无非你们怕我死在长江，你们怎么知道我会淹死呢？”

罗瑞卿忙解释说：“主席，不是那个意思。保护主席的安全是党和全国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我是不同意你冒风险。那怕是一点风险也不允许有。”

主席对汪东兴说：“你要一中队的韩队长去武汉考察，看看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韩队长也是站在罗部长一边，不同意主席去游长江。

韩队长去武汉回来，向主席报告说：“长江不能游，那里水深水急，漩涡太多太大，听说还有江猪。”为了主席安全，韩队长是想劝阻不去游长江。

主席吩咐：“把孙勇叫来。”

孙勇是副卫士长，听说主席叫他，马上就赶来了。主席对他说：“你再去武汉，你亲自看看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这次，汪东兴同志要我同孙勇一块去，并带了三个会水的同志。到了汉口与省公安厅警卫处的同志一道，在长江大桥桥墩上面下水，试游了近万米。虽然水深流急，漩涡众多，但没有发现有“江猪”，完全可以游。

我们回到广州，由孙勇向主席报告情况。

孙勇对主席讲道：“我们试游了几千米，没有问题，完全可以游。”

主席说：“这就对了么，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他故意说给那些“阻力”听，“谁说不能游长江？孙勇不是游了吗！”

主席说：“这个老韩哪，不讲真话，他没有下水去体验就说不能游。我们去游长江，不叫老韩去，叫他离开这里。”

后来主席消了气，他说：“老韩是个好人，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唉，这事办得不对……”主席似乎有些后悔赶走了韩队长。但是韩队长已经调离一中队了。

5月中旬，汪东兴同志要我打前站，先到汉口去，同省公安厅的同志一起，落实主席横渡长江的各项工作，选好上下码头、大小船只、游泳选手和部署警卫等。

1956年5月下旬，主席在罗瑞卿等同志的陪同下，由广州乘飞机到长沙，游了湘江。他对长沙感情极深，青年时期，主席在这里读书，度过了难忘的光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5月31日，主席乘飞机由长沙来到汉口。一路上主席说：“快要到长江边了，这次你们不要再说有什么“江猪”了，事实胜于雄辩嘛！”

罗部长说：“这是一件大事，主席讲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次游长江你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实际出发。”

主席说：“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你们经常跟我在一起还不知道我的身体，这次你们看着我给你们游出点花样来！”

5月31日。在罗瑞卿、王任重等同志的陪同下，我们跟主席一起登上渡船，主席站在船头，拍了两张照片。他站在那里，像一座难以撼动的山，十

分伟岸，给人一种壮心不已的气概。

随着悠长的汽笛声，渡船开动了，主席的心情非常愉快，他问道：“我们要往哪个地方下水？”

王任重说：“在新亚码头。”

渡船徐徐稳进，犁起团团雪浪，碧波粼粼的江面上，激起层层银白色的雪花。主席远望天际，只见长江之水浩浩西来，天上白云朵朵，天水相连，悠远无垠。举目四望，龟山和蛇山隔江相峙。

那时长江大桥正在修建，我们见到桥墩已矗立在江面上，像是从水面上露出一座座小山。渡船像轻舟一样游过了小山，主席说：“天堑变通途的时候就要到了，我们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转瞬间，渡船驶近了武昌，在武昌的新亚码头靠岸。

这时，大家的心情非常振奋，都准备着下水渡江。水声风声人却没声，工作人员比主席的动作快，三下五除二地就脱了衣服。主席稳步地走上了小木船，这时已有几位青年率先跃入水中，主席走近扶梯，双手抓住梯子，顺着扶梯下水。他先让江水浸了一下身子，然后挥臂向前游去，击起层层浪花，他自由自在地向前游着，我尾随在其身后。那时候我的身体很结实，跟大家一起保护毛主席。

跟随主席渡江的游泳健儿，按照规定的位置，在毛主席周围形成中、前、左、右、后的不规则图形，消除了失防区，确保了主席的安全。还有三条小木船排成三角形，跟随毛主席担负救护任务，万一主席身体不适，或者出现其它不测，以便及时上船。

省公安厅和武汉市公安局对主席横渡长江也有周密的部署，无论是在堤岸上、各种要道上、龟蛇两山，还是对岸水面上，都有安全工作人员。当然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并不知道有主席在游泳。

毛主席在水中游得非常轻松自然，时而潜入水中，时而露出水面，时而侧泳，时而仰泳，顺水漂着走，真是怡然自得，游得舒心悦快。仰面朝天，他悠然地欣赏着广阔的天空，正如他在《水调歌头·游泳》中写的“胜似闲庭信步”，“极目楚天舒”。

主席说，“经常游泳好处多得很哩！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还能接触各方面的人，是了解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好时机，又是最好的休息。”

主席说：“你们会蛙泳、蝶泳、自由泳。我只会立正，稍息、睡觉，坐凳子。立正、稍息是基本动作，睡觉，坐凳子是日常生活，你们行不行呢？说完了即开始‘立正’‘稍息’作示范。”曾陈说：“主席！睡觉还可以，立正、稍息、坐凳子我们不行。手不动脚要动，脚不动手要动。”主席说：“当兵要从立正、稍息学起，游泳也要从立正、稍息学起。其实你们有的人本领比我高，能学会的。你们好好研究、锻炼锻炼吧。”

那天的风稍大一点，水太冷，游了快一个小时，肚子凉得难受，我已上船休息了。

我们对主席说：“主席，休息一会再游吧！”

主席笑着说：“还早呢！起码要游两小时！”又说：“我不要休息，水里也是休息。”

说实在的，我很担心主席的身体抵不住。先后几次劝主席上船，主席说，“我游得正舒服呢！”

有位同志问主席：“主席，今天的水温这么低，你不觉得冷吗？”

主席说：“下决心就不冷，不下决心水温再高也是冷啊！这里水上是夏天，水下是冬天，很好锻炼身体嘛！”

又有一位同志对主席说：“主席，现在浪大了！”

主席说：“浪大了用鼻子吹！”

“用鼻子吹”，说得大家“嘿嘿”直笑，只是人在水中，笑声不大。

毛主席一边游泳，思绪却由长沙到武汉，再跨越时空想到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地景况，真是正如宋代词家柳永在《雨霖铃》中讲的：“暮蔼沉沉楚天阔”。主席还联想到孔子对流水的感叹和宋玉笔下《高唐赋》巫山神女。

老人家在游完泳后，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檣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主席在解释这首词时，对我们说：“才饮长沙水，就是指白沙井里的水，武昌，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是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主席对我们讲道：“等到长江大桥修好后，天堑变通途了，我们再来游泳，那将是别一番情调了。”

#### 4. “可能是在捞宝吧！”

在堤岸上，聚集着一群观看江中游泳的人们，他们不清楚江中有毛主席在游泳，指指点点，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有的说，“今天天气这么冷，风这么大，居然还有人游泳！”

有的讲，“是掉了什么东西，你看还有三艘船，肯定是在打捞什么宝贝！”

也有人说：“可能是在训练出国比赛吧！”

还有人讲：“他们在游泳锻炼，可能是为了准备打仗！”

——这些人都蒙在鼓里，甚至于湖北省、市机关的大部分领导人都不知道。他们后来说，如果我们都知道毛主席在游泳，长江两岸肯定会站满人群。

这次，我们一直游到漳口东边朱家河入长江的义口才上了船。游了两小时零五分钟。

主席靠近船，一手抓住扶梯，转过头来轻轻地喘着气，看了看他所游过的路线，说，“我们游得不近嘛！”

主席顺着扶梯往上爬着，身上的水不住地往下滴落。他上得船来，工作人员急忙给他披上衣服，这时他才大口大口地均匀地喘气，显得悠然自得。他坐在藤椅上，拿着香烟，久久没有点上，他笑着，一副很怡然的神情，就像一位从战火中归来的英雄。

主席高兴地对王任重同志说：“你们会游泳的人，要练习练习嘛！以后有机会我要和你们比赛的哟！”主席讲的会游泳的人，但都没有游过长江，需要练习。是练提高游泳技术，是练游长江的胆量。

王任重只是笑，感到今天总算是安安全全的了。

曾获得横渡长江第二名的运动员小梁说：

“主席，你游得真好，你游泳的消息传遍了世界！”

主席谦虚地说：

“你比我游得好，你是运动员，我游泳只是为了锻炼身体啊！”

主席问小梁：

“你为什么没有争上第一名呢？”

小梁说：“我游的方向没有把握好，绕得远了。”

主席说：“方向是个极重要的问题。”

小梁望着主席，只是笑笑点头。是啊，方向是个极重要的问题，干什么不注意把握方向就会出现差失！

主席在 1956 年 5 月 31 日，从新亚码头下水，经过长江大桥直至漳口东边；6 月 1 日，从武昌到汉口；6 月 3 日，从汉阳回游武昌，穿过正在修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桥洞。主席一连三次横渡浩浩荡荡的长江。

### 5. 长江西岸人潮如涌

1966 年 7 月 15 日，主席对我们说：“你们去看看武汉大学，看他们现在于什么！”

于是我和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另外三位同志一块到了武汉大学。看到好多学生在扎木排。我问：“你们扎这个干什么用呀？”

一个学生说：“明天要横渡长江，这个木排是用于插彩旗的。”

回到东湖宾馆，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主席。当时，主席没有讲什么。

7 月 16 日。

这天早晨 6 时许，毛主席对我们说，“上午八时去游长江！”

于是我们同湖北省公安厅徐耘云副厅长和警卫部门分头进行各种准备工作，很快一切就绪。

上午 9 时 20 分，在王任重同志的陪同下，毛主席穿着睡衣，乘坐卧车到了长江边，下得车来，他举目四望，今天是一个好天气，他老人家信步登上了久久等他的渡船，首先检阅了武汉大学 5000 游泳健儿，这些参加横渡长江的学生，均是经过挑选而来的。

学生游泳方队推着彩旗，迎风飘扬，向前游着，潮水哗哗，伴着那时最时兴的革命歌曲。毛主席站在船头上，兴致勃勃地观看着他们，感到他们是祖国的希望，他的脸上充满了容光。

突然有人看见了毛主席，直喊：“啊，是毛主席，是毛主席，果然是毛主席！”顿时，整个江上欢呼起来。长江的潮水激动了，长江的两岸激动了，高音喇叭里的革命歌曲更加热情荡漾。这就是人民的领袖，这就是我们的人民。

毛主席在音乐声中向学生们频频挥手致意，鼓励他们奋勇向前。

同时，在汉口等待毛主席接见的三拨外宾也感受到了来自长江的欢呼声，他们在外办廖承志同志、外交部韩念龙同志的陪同下，也乘船观看了学生横渡长江。当外宾看见毛主席时，都热烈地鼓起掌来，毛主席转过头来也向外宾们挥手致意。

毛主席在船上看完学生渡江后，乘船向长江上游驶去，渡船到达武汉大堤口，主席说，“我最喜欢今天这样的游泳，走吧，我们都下去，都去感受一下长江的浪涛。”说着，几名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跃而入。毛主席也兴奋地下了水，他一会儿仰着身体跷起双脚，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像躺在床上休息一样，动也不动地随着波浪一起一伏地飘着走，非常自由自在，有的同志以为毛主席累了，哪知道他忽然一个侧身，冲破波浪，挥臂向前赶着，波浪叠起，卷起千堆雪，把小伙子们撇在了后面。

游泳健儿们奋臂赶上了主席，主席对他们说：“游泳是很好的休息，轻松自在，没有其它任何杂念，一切都顺其自然。”他说，“长江又宽又深，

水流湍急，是游泳的好地方。”他还讲，“横渡万里长江，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更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如果在游泳池里面游泳，那就没有多大意思了，要到大江大海中去游，到大风大浪中接受锻炼。”

毛主席一直游到武汉钢铁公司附近才上船，游程 30 多华里，历时一小时零五分钟。

游完泳，主席上船来，对王任重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它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毛主席多次游长江，我跟随他两次。

毛主席畅游长江的心愿实现了，他把邀游长江锻炼身体、磨练意志，看作是与天斗争的一种乐趣。他破除了惧怕狂风骇浪不敢游长江的迷信，鼓舞人们要经风雨，见世面，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成长。

17 日，主席在武汉接见了三批外宾。18 日回到北京。我看到一张报纸上介绍，说主席壮游长江 13 次，这位同志把主席凡是下了长江水的都作了统计，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的：1956 年 5 月 31 日，主席游武汉长江，水温 21—22℃，历时 124 分钟；1956 年 6 月 3 日，主席游武汉长江，游程 28 华里，历时 120 分钟；

1957 年 9 月 5 日，游武汉长江，水温 27℃，风速 4 级，历时 30 分钟；

1958 年 9 月 1 日，游武汉长江，水温 27℃，游程 10 多华里，历时 37 分钟；

1958 年 9 月 10 日，游武汉长江；

1958 年 9 月 12 日，游武汉长江，水温 28℃，游程 10 多华里，历时 30 分钟；

1958 年 9 月 13 日，游武汉长江，历时 20 分钟；

1958 年 9 月 14 日，游武汉长江；

1958 年 9 月 15 日，游黄石长江，大雨，风速 4—5 级，历时 40 分钟；

1958 年 9 月 16 日，游安庆长江，水温 23℃，风速 6 级，历时 30 分钟；

1959 年 8 月，游九江长江，水温 20℃ 以下，风速 3 级，游程 16 华里以上，历时 50 分钟；

1966 年 7 月 16 日，游武汉长江，风速 5 级，游程 30 华里，历时 75 分钟。

## 6. 与赫鲁晓夫一起游泳

主席游泳都是在祖国的江河湖泊，而一块游泳的都是黑头发、黄皮肤。但是，也有例外，主席跟外国人游过泳，可也是唯一的一次。1958 年 7 月 31 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同赫鲁晓夫会谈，赫鲁晓夫就想在我国领海建立“共同舰队”和在大连建立“长波电台”的问题，谈了半天，赫鲁晓夫支支吾吾，谈不到正题上。毛主席抓住要害问题不放，说：“请你说明一下，什么叫共同舰队？”赫鲁晓夫说：“我们共同商量。”毛主席说：“什么叫共同商量？”毛主席生气了，他断然拒绝了赫鲁晓夫的要求，并严肃地指出：“什么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沿海地区都拿去？”……“你们都拿去算了。”经过这场激烈地争论，赫鲁晓夫表示：“你不理解，我们也不提了。”“不同意就不同意吧！”

第二天，毛主席在游泳池等候赫鲁晓夫，准备进行第二次会谈。

交谈国际形势，双方的分歧是不大的。但是，当谈到苏共“二十大”批

判斯大林的事，赫鲁晓夫说：“你们为什么往我们的后院抛石头？”

毛主席微笑着，心平气和又十分坚定地说：“我们不是抛石头，而是抛金子”。

赫鲁晓夫的态度也很强硬，他说：“别人的金子我们是不要的！”

毛主席说：“不是你要不要别人金子的问题，是我们要助你们一臂之力！”

“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毛主席提议，“我们游游泳，凉快凉快！”

赫鲁晓夫的游泳水平并不高，说不上什么游姿，如果硬要给它取个名称的话，那就是人们常讲的“狗刨”，他“刨”了几下，气喘嘘嘘的，脸涨得绯红，头发蓬乱，像一只落水狗，他往池边刨着，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爬上了池子。

他还想继续游，将一块手绢的四个角打了一个结，戴在头上，蒙住他那乱糟糟的头发。接着他伸出手，不停地给工作人员画着圆圈，工作人员理解他的意思，给了他一个救生圈，套在了脖子上，又一纵身下了水。他注视着毛主席，只见毛主席将手一划，两腿一蹬一夹，肩头冲起一层浪花，速度很快，手刚划过几下，身体像巨鲸一样破浪前进，一下子划到了游泳池的中线。赫鲁晓夫见毛主席已游到了他的身边，喃喃地讲道：“我早知道你游泳是能手。”

狼狈的赫鲁晓夫两天后离开了北京，此行便成为中苏最高领导人的最后一次会晤。

1959年2月，主席在会见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夫妇时说：“你们都会游泳吧！”

“我们会。听说主席在水中一泡就是几个小时。”

毛主席非常不喜欢这个“泡”字，他说：“错了，那不是泡，是水中击浪，征服惊涛，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大自然斗其乐无穷，我那是与水斗，见到狂澜，我总要斗它一斗。”

斯特朗问道：“主席都游过些什么地方？”

毛主席挥着右手，说：“我几乎每年都要游长江，或者游其它江河。”他扳着指头说，“如广州附近的珠江，我老家的湘江，还有钱塘江、北戴河，建国之初，我在游泳池里游泳，但那太受局限了。游大江大海，很壮阔，用中国的俗话说，那叫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的整个身心都是自由的。”毛主席讲：“我还打算游黑龙江！”

斯特朗当时对主席问道：“那你就要游到俄国去了？”

毛主席说：“哎，你完全正确！”

毛主席沉吟片刻，讲道：“如果你们三位允许，我愿去横渡你们的密西西比河。大概另外三位先生——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不会欢迎我去吧！不过，我是个乐观的人！”

但是，12年后，尼克松还是到中国来访问了想游他们密西西比河的毛泽东主席。

1974年，毛主席已81岁高龄了，可他还在湖南长沙省游泳馆游了5次泳：11月19日下午游了30分钟，20日下午游了45分钟，12月3日下午游了30分钟，同月4日、5日下午各游了35分钟。

无论是“白浪滔天”的北戴河大海，还是“风吹浪打”的万里长江，都充分反应了主席搏击风浪，征服大自然的勇气和力量。

## 第五章 亲历庐山会议与“九一·三”事件

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但在 60 年代后，用人上有失误，林彪就是其中一个。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林彪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确定林彪为“接班人”。这时的林彪急欲登上权力的峰巅。在这以后，林彪及其反党集团成员经常勾结在一起，密谋夺权，妄图取代毛主席，在政府职务上想担任国家主席。他希望通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名正言顺地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 1. 庐山骤起风云

1969 年 10 月 15 日，毛主席离京来到武汉，在东湖宾馆下榻。此间，主席很少出去散步，也没有接见任何客人。他每天阅读文件、审批文件、看书读报，思考问题。1970 年 3 月，他提出要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改变国家领导体制，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当国家主席。并决定 8 月份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主席要汪东兴同志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他的建议，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3 月 8 日下午，汪东兴从武汉乘飞机回到北京。3 月 9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周恩来总理主持会议，汪东兴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经过讨论，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决定各有关部门分头进行准备工作。

3 月 9 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主席的意见，着手研究并开始了修改宪法草案工作，政治局的同志对宪法草案和全会的有关文件进行了多次讨论，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努力，拟定了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审议修改宪法草案，审议国民经济计划，以及战备工作问题。

中央政治局将文件送请毛主席审定，毛主席审阅同意了。

1970 年 8 月 18 日，我随主席从杭州出发，19 日下午到达庐山，在庐林湖游泳 25 分钟。尔后住进芦林 1 号楼休息。晚上住在脂红路 175 号。我担负保卫毛主席和全会的安全任务，并列席了九届二中全会。22 日下午 3 时，毛主席主持了政治局常委会。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到会。会议商议了由周恩来同志代表政治局向全会作政治报告。大家均同意主席的提议。毛主席说：“这次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8 月 23 日下午 3 时，全会开幕了，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作政治报告。

按照原定议程，周恩来作完政治报告后休会。

毛泽东出于礼节对三位常委问道：“你们还有什么要讲的？”

这时，林彪慢腾腾地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的稿子，采取突然袭击，以“颂扬”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为名，大讲“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现在有人反对提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反对提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不要不服气，要承认天才，不承认天才是不行的。”林彪在讲到毛泽东思想在我们一切工作中的指导作用时说，“这一点各个地方各个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可能是不一样的，这也很自然的，一切事物总是不平衡的，总是有差别的，就是在党内也是不平衡的，你们是不是觉得老三篇不大起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的，另外，还有其它的一些政策思想，以及哲学思想，这些都是起作用的，还有政治思想，多了！”

在讲了这些以后，林彪特别挑衅地说：“我说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当天晚上，政治局开会，由周恩来总理主持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吴法宪突然提出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要求明天放一次录音，学习讨论三天。”

其实，在8月23日早晨，叶群就对秘书说：“下午开会，首长可能要讲话，赶快将原来的讲话稿改一改。”由此可见，林彪要讲话，是早有准备的，林彪在常委会上对毛主席说“不讲了”，这是公开的欺骗，是别有用心。

林彪的这次突然袭击，完全是煽风点火，是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所采取的决策，他的政治目的就是坚持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反革命动员令。

林彪知道吴法宪提出学习讨论他的讲话，非常高兴，他要林立果（当时林立果也在庐山）给吴法宪打个电话，对吴法宪的效忠表示肯定。

林立果在电话里说：“你在政治局会上所提出的意见很好，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表扬你，说你又立了一功！”

吴法宪按照叶群的授意，串联了空军、海军、总后的一些中央委员，要他们都在小组会上发言，他说：

“林总的讲话不是随便讲的，是有所指的，是不点名的点名。明天，你们都要发言，就按林副主席的讲话调子讲，你们要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副主席。”

之后，吴法宪又找到王维国、陈励耘说：

“林副主席的讲话，说到我们的心坎上了，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是原则问题，也是对我们的支持。明天你们都要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事先报告过主席。”

陈伯达连夜组织人编辑恩格斯、列宁、毛主席论天才的几条语录，在小组会上发了，他还私拟了设国家主席一节的宪法草案条文。

8月24日上午7时，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开会，叶群说：“先给你们讲讲林副主席的意见，归纳为几点：（一）要表态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坚持天才论；（二）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三）发言不要点名，不要扩大打击面，打击面宽了，毛主席那里通不过；（四）今天下午分组讨论，吴司令你最好先发个言，你开个头，给大家定个调子。”

吴法宪说：“好的，好的！”

24日下午，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到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进行活动。

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言时，很有煽动性他说：“多么猖狂，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有人不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有人利用伟大领袖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不承认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

叶群发言说：“林彪同志很多会上都讲了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得多、懂得的也多。难道这些话都要收回呀？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如果不讲天才，马列还算不算数？”这些谣言集中爆发出来，欺骗了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

王洪文以及他主持的上海小组，也大肆吹捧林彪的讲话，说什么“林副主席的讲话非常重要，给我们敲了警钟，不承认天才，就是不承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王洪文还授意某人为他起草了一份“我们的态度”的发言稿。



8月25日上午，华北组将陈伯达的发言，出了一期第二号简报。由于这伙人的煽风点火，制造混乱，使全会无法进行下去。

## 2. 庐山真面目

毛主席识破了他们的阴谋。25日，毛主席找林彪谈了话，周恩来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了话，要他们向中央作检查。他们所在的会议小组简报还未发出，叶群等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要全部私自收回，中央没有同意。

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各组召集人参加了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宣布了三条：“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立即收回会议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没有发的不要发了；责令陈伯达作检查。”主席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冲着林彪说：“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

庐山会议的前一阶段，黄永胜没有参加，但他要讲话的调子，是与林彪一唱一和的，当总理通知李德生把黄永胜换上山来时，黄永胜感觉自己汇合到林彪“大合唱”的时候到了。但他一上山，发现庐山的“残云已去”，再不敢呼风唤雨了，只好把写好了的讲话稿撕毁了。王洪文也趁机转舵，把准备好了的讲话稿换成了批判陈伯达的天才论。会后毛主席找人谈话，开小会，这样持续了六天时间，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往往在凌晨二三点钟，从芦林一号回到住所。夜间，庐山就像罩着蚊帐，浓雾滚滚，伸手难见五指，能见度很底，看不见路。主席要我多找几个马灯做路灯，可有马灯还是看不见路，只好找两个干部手提着马灯，在车头两侧行进，车速不能开快，只能徐徐行进。主席经过几天来的调查研究，写出了《我的一点意见》，8月31日，印发到会的全体同志。

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驳斥了他的谣言和诡辩，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毛主席指出：关于天才的材料，没有马克思的话，“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陈伯达伙同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以及掌握军队大权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会内会外四处活动，煽风点火，以拥护毛主席任国家主席为名，反对毛主席提出改变国家领导体制和不设国家主席的决策，妄图把林彪抬上国家主席的宝座，毛主席非常气愤地批判陈伯达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主席特别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那样一些人的当。”陈伯达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是两面派，野心家。《我的一点意见》及时发表，粉碎了林彪一伙向党夺权的阴谋。

全会于9月6日下午闭幕，7日与会人员陆续离开庐山。

毛主席心里很难平静，直到9日他才离开庐山，到了江西南昌。

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查上批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主席还批道：“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10月15日，主席用铅笔，在叶群的书面检查上批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还批道：“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

12月18日，主席在会见美国客人斯诺时，心里就很不平静。斯诺一见面就说：“你是一代伟人，我到中国来见到处都写着四个伟大。”

主席抢过话题，非常生气他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就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它的一概去掉。”

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华北会议，由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系统地揭发了陈伯达的罪行，并宣布了改组华北军区的决定：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为政委。而当时对林彪则采取了“保守治疗”的方针。不久，周恩来还专门带李德生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北戴河看望了林彪。路上，周总理对李德生说：“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目的是给他一个台阶下。”

### 3. 伴随毛主席南巡

1971年8月14日，毛主席离京乘火车去南方巡视工作，我带了一中队一百余人，每人两支枪，一支手枪，一支自动步枪，还有轻机枪，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任务。毛主席每到一个省、市都要找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主席的巡视日程是：

8月16日，毛主席到武汉，在武汉谈话的有华国锋、汪东兴和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等。

8月17日，主席到长沙，在长沙谈话的有华国锋、汪东兴、丁盛、刘兴元、卜占亚。

8月31日，主席到南昌，在南昌谈话的有许世友、韩先楚、汪东兴、陈世清、杨栋梁、文道宏。

9月10日，主席到杭州，谈话的有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白崇善、汪东兴。这时，广西的韦国清来到杭州，由汪东兴向他传达了毛主席的谈话内容。

9月10日晚，主席到了上海，当晚找了马天水、王洪文、王维国、汪东兴谈话。

11日上午，主席继续在上海找许世友、汪东兴、马天水、王洪文谈话。

12日下午在北京丰台车站支线找吴德、李德生、纪登奎、吴忠、汪东兴谈话。

毛主席同各地同志谈话时，首先要求大家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有的同志记不清歌词，主席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领唱，唱完后，毛主席总要对歌词的意义进行讲解。他在杭州时就说：“在座的诸位，你们要学习列宁在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的那篇文章，要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能够讲解，更要照着去做。”

主席说：“国际歌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

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章，就是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我们的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这怎么行呢？我们唱了五十多年的国际歌，就是要讲团结，没有讲分裂么！我们党内有人搞了几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不信。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

毛主席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有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得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我们每一个党员。”

毛主席在谈到《我的一点意见》时说：“我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门批天才论的。”主席说：“天才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所到之处，毛主席都着重谈庐山的斗争问题，点名批评林彪、陈伯达和黄永胜等人。

他指出：“庐山这件事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毛主席说：“他们心里有鬼，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分离党，急于夺权。”

毛主席说：“林彪那个讲话事先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事先连招呼都没有打。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又赶快收回记录（指叶群等人发言的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主席还说：“庐山这次的斗争，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个大将外。”“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这在我党有史以来是没有见过的。”

毛主席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指黄、吴、李、邱）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成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事，自己写，免得误事。”

毛主席在谈到干部问题时说：“有些干部还没有站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少数，不好的干部加以批评教育，好的干部要表扬，但不能捧。”毛主席第一次不点名地点了林立果，他说：“二十几岁的人就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

毛主席在谈到军队工作时指出：“我不相信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军队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

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毛主席谈到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时说：“还是教育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党有这么一个规矩，有错误不要紧，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不讲政策，总是不好吧！”

想起吴法宪所讲的“伟大谦虚”，毛主席说：“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我在庐山会议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我认为毛主席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不但从政治上击中了林彪反党集团的要害，而且从思想上揭露了他们唯心论的根源。毛主席南巡讲话，特别强调指出：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不仅是理论上的斗争，而且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思想和政治二者是紧密联系的，是不可分割的。毛主席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回到北京，我还是要找他们谈，他们不找我谈，我去找他们谈。犯了大的原则错误，为首的人，要改也难，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前途有二：一个可能改，一个可能不改，要看实践。”后来，毛主席指出：“实践证明，黄、叶、吴、李、邱五个人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吗？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有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离，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毛主席最后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主席曾对我说：“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要搞上几个人在一起。”他还说，“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我们要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

#### 4. 毛主席闯险关

毛主席行动机警，严格保密。在各地住的时间：武汉住了10天，长沙、南昌住3天，杭州住了5天，上海住了一晚，没有下车。南京、济南、天津都没有停留。

毛主席的南巡谈话是怎样被林彪一伙人知道的呢？主席每到一处谈完话都要求不要外传。可是，9月5日当李作鹏因外事活动到武汉时，刘丰却把毛主席的谈话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回到北京，马上将这一情况告诉了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迅疾把消息转给了叶群。当日深夜，在北京的周宇驰用电话从广州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那里了解到，广州部队正在传达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他们时的谈话内容，便说：“你们听完后也给我们传传。”深夜11点半，周宇驰通过于新野打电话给顾同舟，终于了解到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并作了15页纸的记录。9月6日，周宇驰亲自驾驶直升飞机来到北戴河，找到了正在那里谋划明天前途的林彪、叶群、林立果，把谈话的核心内容送给了他们，他们顿时惊恐不已，深感大难临头。9月8日，林彪写下了军事政变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命令办！”

后来才知道，他们要谋害毛主席，早就搞了个《“571工程”纪要》政变纲领，建立了一支大、小舰队。在审判罪犯时得知，在主席南巡时，叶群已向黄永胜送去了秘密亲启的信件：“现在情况很紧，我们决定在上海动

手！”他们决定在上海采取三条措施：一是用火箭喷射器击毁毛主席乘坐的专列；二是用100毫米口径高炮平射火车；三是让上海空军某部政委王维国带上手枪趁在火车上接见时动手等等。

这时，叶群很注意毛主席的行动，她对吴法宪说：“毛主席跑了一路，一定很疲劳，可能在杭州休息一段时间，国庆节前回北京，你要注意掌握毛主席的行动，及时报告。”

林立果亲自到了杭州，同陈励耘谈了一次话，临走时对其讲到：“毛主席到了杭州时，千万要给我打个电话。”

这伙人每天都在密切注视毛主席到了什么地方，找谁谈了话，谈了什么内容，要他们打听真实情况，及时报告。

9月2日，主席在南昌同江西省的一位负责人谈话，这位负责人听了主席这次的谈话，联系到他知道的一点情况，向毛主席谈了三点：一、7月间，空军周宇驰两次跑到南昌活动，并运来一辆水陆两用的汽车要江西仿造。7月底，周宇驰把汽车用飞机运走了。二、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带我去见了叶群，她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三、林立衡同我妻子讲了林彪、叶群的一些问题，她要我少同林彪一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毛主席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就在9月8日深夜，毛主席突然下令，把专列从杭州笕桥机场停车点，转向去绍兴线的支线上停放了一天半，10日下午离开杭州，晚上9点到达上海虹桥支线。主席告诉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次日上午许世友乘飞机来到了上海，他问领他去见主席的人：“主席下不下车？”回答说：“主席不下。”许世友上专列时，王维国也想一块上来，我们没有让他上车。主席开始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时分，主席对王洪文说：“今天中午你请客，陪陪这位老将军到锦江饭店吃饭去，我们在这里等候你们。”可是当汪东兴送走许世友、王洪文回来，主席马上说：“我们走，不同他们打招呼。谁也别通知，马上开车。先发前卫车。”而这时林立果、周宇驰正在北京西郊机场研究在上海谋害毛主席的方案。他们哪里想到，方案还未出来，毛主席便安然地离开了上海，下午6时到了南京车站，许世友从上海赶到南京，急呼呼地来到车站，再次问主席下不下车？汪东兴告诉他：“不下车了，主席已经休息了。”专列停车10分钟后，继续北行。12日早晨6时，专列到了济南车站，找杨得志同志谈话，可杨得志不在济南。列车北行到了天津车站时，主席突然对我说：“打个电话，通知吴德、李德生、纪登奎、吴忠到北京丰台车站支线开会。”

我当时想，快到北京了，毛主席怎么不回到北京找他们开会呢？虽然主席没有发现林彪的政变阴谋，但事实上主席是有先见之明的。我打完电话后，专列风驰电掣般地往北京行进。在12点多，列车到了预定地点，通知的四位同志都赶到了。会议进行了将近两个多小时。

毛主席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了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一万句吧，那也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都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就是

树他们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缔造的人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毛主席说：“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黑手后面还有黑手。”

但主席没有想到，就在当晚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事。

#### 5. 向张耀祠副主任报告，保卫好毛主席

12日下午4时，毛主席安全回到中南海。

9月12日下午，林立果得知毛主席回到北京后，哭着说：“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把性命都交给我了，我怎么去见首长呢？”

叶群接到林立果的电话，来到林彪的房里，叫喊起来：“——，不好了，老虎那里落空了（老虎是林立果的小名），人家早就过了上海，把我们蒙在鼓里，我们受骗了……”

林彪说：“慌什么，快，快执行第二方案。”林彪的第二方案，就是政变不成逃往广州。

林立果慌慌张张要了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呼啸着飞到秦皇岛，晚上8点15分到达北戴河。林彪、叶群正等候他的到来。林立果一到，三人便开始商量向外逃跑的方案。他们原计划政变如果不成功逃往广州，另立中央，实行割据，形成南北对峙局面。但是，毛主席找广州的丁盛、刘兴元谈话后，二人回到广州召开了师以上二千多人的干部会议，传达了毛主席谈话的主要精神。林彪知道这个消息后，害怕了，不敢往南，改向北逃往苏联。

这时候，正巧让林立衡听到了他们要逃跑的情况，便立即找到警卫秘书李文甫，要他立即向8341部队负责人报告此情况，李文甫说：“我离不开。”林立衡只好在晚上9点50分左右，到8341部队找到二大队长姜作寿，她说：“林立果、叶群正商量要挟持林彪逃跑，我要找你们

的负责人报告。”

姜作寿说：“我们张宏副团长在这里，我找他来。”

林立衡说：“请他快点来。”

姜作寿给张宏副团长打完电话后，在晚上10点20分钟给我打来电话，先将上述情况作了报告。我当即告诉姜作寿：“要派专人监视林彪住所的动静。”

我立即用电话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汪东兴同志，汪东

兴又马上将此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打电话查问吴法宪：“今天下午去秦皇岛的飞机是谁批准的？”

吴法宪支支吾吾，经查是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

总理说：“必须马上回来，不准带任何人！”

吴法宪向总理报告了假情况：“那架飞机是夜航试

飞，出了故障！”

总理说“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马上回来。”

周总理补充道：“秦皇岛这架飞机起飞，必须有周恩来、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飞机才能

起飞，要李作鹏马上打电话通知秦皇岛机场负责人。”

但是，李作鹏通知时，说“四个人中有一个人的命

令，飞机就可起飞。”李作鹏别有用心地篡改了周总理的命令。

晚上11点多钟，张宏给我打电话说：“林立衡讲，林立果、叶群正在

商量要挟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还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林立衡让我立刻直接向张耀祠副主任报告，保卫好毛主席。”我接电话是在汪东兴秘书值班室，汪东兴和秘书高成堂都在场。张宏说一句，我重复说一句，他们两人都听清了。

汪东兴立即用电话向周恩来总理如实报告了上述情况。

之后，我又给张宏同志交待了四条：一、派专人严密监视林彪住所的动静；二、要组织好部队；三、要准备好汽车；四、一有情况及时报告。

据林立衡未婚夫张清林说：“叶群连找林立衡两次，问她哪里去了。第二次找时，叶群直接问：是否去向 8341 部队报告去了？叶群显得很紧张。”

当晚 23 点 30 分，叶群为了掩盖逃跑企图，给周总理打了个电话，她说：“林彪今天晚上想动一动。”

总理问：“是空中，还是地上？”

叶群说：“是空中。”

总理问：“有飞机吗？”

叶群含糊糊地说：“没有，报告总理后再调。”

平时林彪用飞机，从不向总理报告，这一次报告总理，显然是为了遮掩林彪逃跑的阴谋企图。

总理讲道：“晚上飞行怕不安全吧！”

叶群说：“不要紧，林彪想看看夜景。”

是夜 23 点 40 分，张宏再次向我报告：“他们已经调汽车了。”

我问：“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张宏说：“准备好了。”

我说：“他们走时，你们要跟上他们，要特别注意他们去的方向。”

这时还没有报告毛主席，中央还没有指示，我只能向张宏交待注意去的方向。

我放下电话，“叮呤——”，又是张宏的电话，他报告说：“林彪他们出来了，刘沛丰手提四个皮包先上车，林立果、叶群、林彪最后上车，李文甫上车后汽车开走了。汽车离开 96 号楼后，路上被 8341 部队二大队一中队队长肖奇明挡了一下，没有拦住，汽车跑出约二千多米，李文甫叫停车，他从车里跳出来，与此同时连响三枪，可能是林立果他们打的，李文甫左手负伤。此时肖奇明听到枪声，还击了两枪。林彪的汽车加大了油门，以每小时 100 公里的速度向机场飞驰而去。”

“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我们必须正视历史。林立衡同志是林彪的女儿，但在那天晚上她从住地偷偷出来，向 8341 部队张宏副团长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逃跑，他们要暗害毛主席，派飞机轰炸中南海，要张耀祠保卫好毛主席。当飞机起飞后，林立衡又打了两次电话，头一次说飞机起飞了，听到了飞机的响声；第二次又打电话问飞机截住了没有。我认为林立衡同志这种行动是正确的，她及时报告，关心毛主席的安全，是有功的。她同叶群、林立果的是非是分明的。

由于她及时报告，至少使党中央很快地知道了林彪几个要逃跑。林立衡当时说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逃跑，这可能是对林彪的本质没有看透，也可能是还不知道林彪、叶群、林立果一伙的阴谋是要搞军事政变，急于篡党夺权，取代毛主席的职位。

9 月 13 日 0 点 22 分，林彪的汽车一进机场，就直奔停机坪开到 256 号

专机附近，汽车还没有停稳，叶群先跳下车，高声嚷叫：“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

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拿着手枪乱喊：“快！快！飞机快起飞！”

他们不等飞机加完油和开机舱门、架舷梯，就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往上爬。

他们看到 8341 部队汽车赶来时，顾不上等机组人员和搬运车上携带的机密文件与贵重物品就命令驾驶人员

起动飞机。顿时震耳欲聋的马达声响彻静谧的夜空。

9月13日0点32分，林彪乘坐的飞机，在一片漆黑

中强行起飞了。机组上的副驾驶员、领航员、报务员和服务员都没有来得及上飞机。

8341 部队的吉普车、大卡车还未到机场，飞机已经起飞了，张宏带领几个人，把那些未能走了的人包括专机的副驾驶员、报务员、服务员等，统统集中到候机室不准离开一步，等候处理。

这时周恩来来到毛主席住所，向主席作了简要汇报。并问：“怎么办？打不打，还在射程之内。”

主席说：“不要打，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都是没有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这时，总理向全国发了紧急“禁空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同时，向各大军区、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通告了情况。

9月12日晚，林立果按照林彪的决定，给北京周宇驰打电话，命令他说：“南去不成，速向北逃。”

9月13日凌晨3点15分，沙河机场报告说：“起飞了一架直升机，北上向张家口方向飞去。”总理得知后报告了主席，主席问：“又是哪几个？”总理说：“有周宇驰、于新野……”毛主席下令：“拦截回来，迫降，不听就打下来！”

上午，周宇驰等乘坐的直升飞机，被迫降落在怀柔县境内。被逼迫驾驶飞机的陈修文同志机警地把飞机转向北京，被周宇驰发觉，陈修文同叛徒搏斗光荣牺牲了。

飞机迫降后，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决定自杀。但是怎样自杀呢？

周宇驰说：“我打于新野，李伟信打我。”

于新野说：“这样不好，我们还是自己打死自己吧。你喊一、二、三，各自开枪。”

这样，都同意了。由周宇驰喊“一、二、三”，随着两声枪响，周宇驰、于新野均开枪打死了自己，李伟信不想死，没有开枪，被活捉了。

最后从直升飞机上缴获了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政变的全部罪证《“571工程”纪要》、大小舰队的名单、机密文件、军用地图、金、钱等等。这些罪证，对于处理林彪反党集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舰队名单是他们的政变骨干，经毛主席决定将舰队名单的九十三人全部抓起来进行审查。

9月14日下午，外交部接到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9月13日凌晨2时许，林彪叛逃所乘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汉草原坠毁，林彪和他的老婆、儿子等八男一女全部摔死了。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反党叛国落得个折戟沉沙、遗臭万年的下场。



## 6. 是江青提出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

林彪折戟沉沙后，我始终想不通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是谁提的？

我问汪东兴同志，我说：“为什么要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是谁提议的？”

汪东兴说：“是江青提的。”

1968年10月17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她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

1968年10月27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

1969年4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

张春桥第一个赞成。他说：“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康生极力吹捧林彪，他说：“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提到他的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又说，“我的意见，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应当写入党章”。

之后，起草报告的人对毛主席也不同程度的说了假话。他们对主席讲：“大部份同志要求把林彪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写进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以进一步提高他的威望。”

康生在吹捧林彪时，他自己心里也不是滋味，起初提出的候选人有康生，但是在搞无计名投票时，康生少了几票，他当天晚上就追查汪东兴，汪东兴说：“谁没有投票，我怎么知道？”

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主席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

主席哪里知道，实际上只有那么几个人在为此事闹腾。有些同志虽然口头上同意，但心里却不怎么赞成，因为选定林彪作为接班人是主席提出来的，所以只好附和同意了。

此后，江青跟林彪的关系便难以琢磨了。

因为江青的好多事情不得不倚重于林彪。但林彪虽然在许多场合也在吹江青，可他眼睛盯着的还是主席这里。于是二人总是在“换手搔背”，相互利用着。

多少年来，林彪既用语录、口号和“天才”吹捧毛主席，又跟叶群一起在各种不同的会上高度评价江青，给江青以许多桂冠。这对于想当副主席的江青来讲，是求之不得的事，加之主席又在会上讲她不能当副主席，她非常需要林彪和叶群这样为自己“提高威望”。可作为林彪来说，他并不认为江青有多了不起，只是看到主席这里的份量太重了。

说实在的，江青并不希望林彪当副主席。但是林彪还是当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就不得不在很多场合支持林彪了。所以，她的心里还是比较矛盾的。

江青与林彪的关系就是这样微妙。

江青与林彪尽管在相互支持，都不公开他们各自心中的账。

江青好事可以做，但坏事做起来特别心狠手辣，林彪对此是很害怕的。

那么，陈伯达对江青与林彪二人的态度呢？陈伯达是“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副组长，天天处在一起，对江青了如指掌。他最初跟江青搞得很亲密，但发现江青经常张狂害人，担心自己落得个不死不活的下场，所以后来只好倒向了林彪。而林彪正缺“文人”，很快，林、陈搞在了一起。

尽管陈伯达找林彪作了“保护伞”，但他哪里斗得过江青。

本来，九大的政治报告主席指示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但张、姚跟江青是铁了心的，在“文人相轻”和“难有共鸣”中，陈伯达一下子孤立了出来。

但陈并不罢休，他的“姜”确实比张春桥、姚文元“辣”得多，他很快就写出了政治报告，尽管张、姚联合了康生，但送到主席这里还是晚了一步。

这天晚上，陈伯达把报告呈送给了主席。主席当时提出了一些修改看法，陈伯达坐在一旁，一字一句地记录了下来。

陈伯达离开主席这里，显得很得意。他把主席的意见报告给了周恩来，却没有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讲一声。

于是，江青就拿此事对陈伯达开刀，说陈伯达“封锁主席的声音”，勒令陈伯达作检查。

后来，主席用了张春桥、姚文元写的报告。

虽然陈伯达根据主席的意见修改了报告，并呈送给了主席，但主席连拆也没拆，就在信皮上批道：退陈伯达。毛泽东。

听说陈伯达拿着退稿大哭了一场。

毛主席说：“陈伯达太不像话，怎么能单干呢，这不好嘛！”

当陈伯达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极力捧林彪时，主席说：“这人成心要把事情搞乱。林彪白天来了个突然袭击，陈伯达就在晚上搞袭击。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陈伯达倒台了，江青高兴了。

“封锁毛主席的声音”问题，江青没有整倒陈伯达，陈还是排行第四。可这回陈伯达什么也没有了，江青兴奋得四处请客，说“陈伯达早就该整一整了，现在终于把他拉了下来，真是大快人心。”

1970年11月16日，中央下达的《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中，把陈伯达定性为“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

林彪跟陈伯达不一样，作为接班人，他是被写进了党章的，所以主席当时还是很慎重的，如果把林彪与陈伯达拉到一起来批，这对中国很多人来讲是不好接受的。因此主席思考再三，决定“保林批陈”。就是在党内开展“批陈整风”运动中，主席也很少提及林彪的问题。但毛主席没有想到，林彪在此后开始磨刀了，阴谋政变，谋害毛主席。

当时毛主席作出“保林批陈”的决定，其用意是很清楚的。

过了一段时间，江青大概感到林彪还是“稳”的，觉得写进党章的东西还是管用的。于是她给林彪拍了一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发表在第七、八期《人民日报》合订刊和《解放军报》合订刊上，题目为“孜孜不倦”，署名为“峻岭”。

当林彪出逃后，江青摇身一变，成为批林的先锋，被任命为“林陈专案组”的主要成员。位子也一下子显赫了起来，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她排

行第四，居于周恩来、康生之后。

1971年10月3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一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这些工作量是很大的。

当揪出了林彪的一批黑干将后，我明显地看到，主席的身体、精神不如从前了，一下子变老多了，他后悔选定林彪作为接班人。他对国家的前途命运苦苦思虑，白发骤增，我们无不为主席的身体而焦虑。

而江青却趁这个机会四处表现自己，踌躇满志。早在九大时，她就想当副主席，这回似乎该轮到她了。为了表白自己的立场，她声讨林彪：“这几年，他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她还说：“我是在与林彪的接触中，并同他进行斗争中逐步了解了林彪。”

江青似乎忘记了，林彪作为接班人就是她要求写进党章的，是她首先提出来的，她真是一个善于脑筋急转弯、稔熟自圆其说的人。

#### 7. “你接触林彪才两次， 我和他的来往比你多”

1971年12月30日。

中南海。游泳池。

晚7时30分，我怀着一颗坦诚的心去找毛主席。主席正坐在大厅聚精会神看书，我怕打扰主席，便犹豫了一下。

但为了早些把我的几件“错事”向主席报告一下，我还是对主席讲道：

“主席，我写了一个检查，请你看一看。”

主席抬起头来：“你有什么问题呀？”

我说：“我和林彪有过两次接触……叶群也想拉拢我。”

我把我的书面检讨上的几个问题，简要地向主席讲了一下。

主席沉吟片刻，说：“要靠正确路线。王明错误路线搞了四年多，来了个二万五千里长征。不要靠个人，要靠集体，我也是个人，要靠中央。”

主席说：“林彪的问题是全党的问题，像你这样的干部，比你更高的也有陷得深的。林彪搞了好久，我说了一次（指1971年8、9月主席南巡谈话），广州军区开了个两千人师以上的干部会，林彪就不敢去了（指林彪逃往广州阴谋破产）。”

主席说：“你接触林彪才两次，我和他的来往比你多。你不知道林彪搞阴谋政变，我也不知道。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要搞几个人在一起。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我们要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你这些问题检查一下，就算了，你把心放下来，我们主要是教育。”

我跟随主席前后四十余年，主席从未严厉批评过我，这次对我谈的这番话，也是非常温和的。他的亲切教诲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

主席拿着我的检查说：“你把这个东西先放在这里，我看一看也可以。”

我也不清楚主席是哪一天看了我的书面检查。这份检查我保存下来了，以下是我的检查：

主席：

最近学习了主席批示的中共中央几个重要通知和文件，我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深深感到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生命线。我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并以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声讨林彪反党、阴谋政变、叛国的滔天罪行。林彪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打着红旗反红旗。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就同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指挥黄、吴、叶、李、邱等多次开黑会，多方串连，在庐山会议上早有准备、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地向党发动进攻，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篡党夺权。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彻底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为我们党清除了一大隐患，这是一件好事，它使我们党更加纯洁、更加团结、更加巩固。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由于我平时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努力不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在和林彪的死党叶群、陈励耘的接触中，没有识破他们反革命的真面目。有些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有些则是自己丧失了警惕性，上了当，办错了事，犯了政治错误。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对我的关怀和培养教育。我在 71 年 9 月下旬传达中共中央通知时，曾职系自己的错误作过三次初步检查，11 月 8 日在局、团党委常委会上又作了一次检查，但认识还不深刻。现将这些问题写成书面检查，向主席报告，请批评指示。

（一）1968 年 7 月 1 日晚，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文艺节目时，我的脚被开水烫伤了。7 月上旬的一天，叶群带来一些江西做的毛主席像章、两本毛主席语录，还从三 一总医院请来外科主任医生和一位护士，给我治疗烫伤一个星期。67 年 5 月 1 日，叶群托人送给我一本毛主席著作四卷合订本，林彪在书上签了“张耀祠同志存阅”七个字。1969 年叶群又送过一支国产圆珠笔。1970 年春节，叶群还让保密员送来三斤竹笋、两只死野鸡。为了表示我对她的谢意，我在 70 年春回送过叶群二十斤桔子。

（二）1968 年在杭州期间，因身体不好，请浙江医院中医看过几次病，服了他开的中药，觉得效果好。回到北京，在 9 月下旬我曾向叶群推荐了这位医生给林彪看过病。

（三）1968 年 9 月下旬，我到毛家湾同二大队干部研究加强国庆节期间安全保卫工作。会后，刘继春（林彪办公室保卫科长）要我去见见首长，由叶群引见，我第一次在林彪家中见了林彪，握了个手。林彪、叶群都为我们部队说了几句好话，说：“你们中队的同志学习好，工作做得好，经常给我们打扫卫生，院子里搞得很干净，部队同志能吃苦。”我说：“这些事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的工作还做得不好。”

1970 年 5 月 22 日，我和杨德中政委到毛家湾找叶群调回韩庆余副参谋长（在二大队负责林彪的警卫工作）去支左锻炼。叶群要我们二人去见林彪。我们说：“不要去麻烦了。”叶群说：“去见见吧！”叶群把我们二人给林彪介绍后，林彪说：“8341 部队支左有成绩，给主席提供了很好的情况，取得了经验。”又说，“你们的干部都比较老嘛。”我说：“我 1933 年在毛主席那里站过岗。”林彪说：“你已有 30 多年了。”

（四）1969 年 6 月（当时我不在北京），叶群提出要我的孩子去当兵，她说：“你们的工作忙，没有时间照管，到部队去锻炼好。”当时我认为她是对我们的“关心照顾”，还向她表示过谢意，后来我的大女儿向我提出想去广州中山医学院学习，我没有门路，只好在 1970 年 6 月在电话上与叶群说了这件事，希望她能帮助。叶群当即说：“我叫吴法宪办，大事要请示，小事不干扰。你不要向别人讲，不然人家说我们拉拢。”对叶群这番话当时我没引起注意，只是认为“不要向别人讲”和“拉拢”是注意一般的影响，根本没有想到他们会搞阴谋政变。所以，他说的这番话我没有向别人讲，也没有向党组织报告。

叶群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关心照顾”？现在看起来她心里有鬼，想利用我的私心，安排儿女当兵施展一种狡猾的“拉拢”手段，而自己在政治上麻木不仁，对她这种身份的人“关

心照顾”丧失了警惕性。这是一个政治错误，我愿接受党的处分。

(五)在杭州同陈励耘的接触中办了错事。1970年7月，经我同意，帮他搞了三次西药，计：谷维素300片，H3即奴夫卡因60支，凡锁拉斯丁375支。

1966年住在杭州期间，陈励耘说要给林彪盖栋房子，要我同他去看看地点，头一次，有二十军副军长；第二次，有南萍、朱全林。

1970年上半年，陈励耘来北京研究在杭州雷峰塔下挖防空洞时，我陪他参观人民大会堂。我私人出钱请他和他的秘书王明欣在大会堂吃过一顿午饭。

1971年春节，杭州警卫处给我捎来浙江特产香榧子和椒盐核桃二十斤、冬笋几斤。7月，警卫处杨金庆来北京，我托他给陈励耘带去二十斤桃子，并送给他们学习马列六本书的辅导材料五本。

(六)在组织干部学习时(在大队、中队、区队干部)曾选用过林彪一些讲话材料，宣扬了他的一些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反动观点。

今后，我决心遵照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陈伯达一类骗子”的教导，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认真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肃清他的流毒。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

张耀祠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主席看了我的检查，于1972年1月10日交给了吴旭君护士长，并说：“把这个东西退给张耀祠自己保存，就是那些问题。”

主席让吴旭君转告我今后要注意几条：

1. 不要拉关系；
2. 不要串门子；
3. 不要请客送礼；
4. 不要请人看戏、看电影；
5. 不要同别人照相。

此后，我特别注意主席对我讲的这样几条。

不管怎么讲，无论是主席，还是周恩来都是非常能宽容人的，始终在政治上关心教育干部，他总是对人说：有错误就改，改过来就是好同志。

在那样的年代，应当说跟林彪接触频繁的人是很多的。但主席都能区别对待，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在这之后，1974年，中央在北京召集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家机关和军队负责同志会议，由周总理主持。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中犯有错误和有牵连的同志，让他们有一个交待和说明问题的机会。

第一天，会议有王某某同志等检查和说明问题，他们的检查非常好，讲得很客观，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周总理听后非常高兴。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向毛主席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毛主席听后问道：“大家鼓掌了没有？凡是在会上作了检查交待和说明问题的同志都要鼓掌欢迎。今天会上没有鼓掌的，明天开会要宣布鼓掌欢迎。”

毛主席对待犯有错误的同志（不是主谋或是参与阴谋的骨干）不论错误大小，总是耐心等待觉悟过来，只要真心诚意，自觉自愿，向党说了真话，不隐瞒事实真相，都是会受到欢迎和谅解的。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毛主席

一贯坚持从政治上关心爱护干部，从思想上教育干部，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 第六章 粉碎江青“四人帮”的斗争

在毛主席的垂暮的岁月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反党集团，阴谋搞乱全国，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江青一方面迫不及待地伸手要权，一方面恨不得毛主席早一点死，以便夺权篡位。毛主席早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多次对他们进行了揭露和批评教育。但他们仍然我行我素，以至于在毛主席逝世之后，更加变本加厉，发展到了最严重的地步。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党中央决定一举粉碎“四人帮”。我亲历了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 1. 江青对毛主席的病情态度恶劣

1971年，毛主席工作很忙，身体每况愈下，我们非常为他的身体焦急，而作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却对此漠不关心，很少过问主席的健康。到了1972年1月25日，主席气喘喘地说：“张耀祠，请你同医生去钓鱼台，给江青谈一谈我的病情！”

当天下午3时，我们乘车去了钓鱼台。江青当时正坐在沙发上养神，护士叫醒了她，我们走进了她的办公室。医生对她说：“主席现在患肺心病，开始由感冒引起支气管发作，每日阵咳无法卧床睡觉，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困了，就在沙发上睡一会儿，打个盹，从入冬以来一直不好。”

江青听了，摇摇头，表示怀疑。她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不可能有什么大病！”

原本给江青汇报希望能引起她的重视，没想到江青却持这种态度。

我接着说：“主席现在年纪大了，身体抵抗力弱了，有病应该休息和及早治疗，可是，这两条主席很难做到。他日夜操劳着党和国家的大事，有病不能休息，也不治疗，不愿打针吃药，他的病拖的时间太久了，病的发展就重了。现在，他的双脚浮肿，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江青慢腾腾地说：“有什么变化，要及时报告我，我好有个思想准备！”

什么“思想准备”呢？是真的有心关心还是为篡党夺权作准备呢？

我们在江青这里谈了三个小时，她为什么无动于衷呢？非要坚持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不可能有什么大病呢？后来她的思想行为就一点一点地往外冒了。

1月28日晚12时。

我和医生进到主席卧室，主席正躺在沙发上，医生摸了摸主席的脉搏，摸着摸着，他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我急切地问：“怎么样？”

医生摇摇头说：“没有摸到脉。”

当时我们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医生转身给汪东兴打电话，请他马上来游泳池，并商量请总理来。

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说：“我马上就来。”

总理考虑到主席已是79岁高龄的人了，工作这样紧张，身患重病，应该请江青来看望主席，家属可以配合医生为主席治病，正是由于这一点总理亲自给江青打电话，请她来主席这里，主席病重。

周总理、汪东兴等到江青来后，医生把主席的病情作了简单的汇报，然后一块来到主席的卧室。

主席这时已经醒了，江青刚一见主席就拉大嗓门讲道：“我说，主席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厉害呢？”她气狠狠地说：“医生护士谎报军情，”

她接着讲道：“不要打针吃药，吃药反而不好！”

江青离开毛主席卧室来到值班室，蛮不讲理，闹得更凶。她死咬住一条吼道：“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像你们所讲的那么厉害呢，是医生护士‘谎报军情’，该当何罪？”她还说：“医生护士是‘特务’，是‘反革命’！”

这时，医生护士一肚子的怨气不好发作。我站在一边没有吭气，周总理、汪东兴同志也没有说什么。

江青闹了一阵，没有谁去搭理她，悻悻地离开了游泳池。

本来，主席这期间在打针吃药，进行治疗，可江青这么一闹，主席生气了，针不打了，药也不吃了，使医生护士们非常为难。

过了两天，医生护士对主席说：“主席，还是治病要紧，不要为江青同志那些话生气了。”

主席非常平静他说：“那么多意见，怎么治呀！”

经劝说，主席同意打针吃药了。

1月31日晚8时，江青来看主席，她在主席那里坐了十二分钟，主席没有跟她讲一句话，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她，仿佛对江青有很多愤懑。可江青出来却对我说：“主席的脸色比我好，很神气，只吐了一口痰，眼睛瞪得大大的，与你们谈的完全不一样。”

我长嘘了一口气，对江青说：“主席今天还没有睡觉，已吃过两次安眠药了。”

江青说“不对”，她觉得说的话不妥，停了一会儿，她又说：“我也希望主席好，你们要沉着，不要慌张，我并不是否定主席的病情，要看到好的嘛！”

对于主席的治病，江青也做做样子，表示她很关心和重视，但是没有想到江青所做的这种“样子”连她自己也骗不过去。2月2日晚12时，江青约周总理、姚文元以及我和五位医生，在怀仁堂研究给主席治病的问题。

可是江青在会上避开主席的病情不谈，专谈她自己的身体如何如何不好，说自己浑身都是病，一个劲儿地抱怨别人对她的健康问题关心不够，她整整谈了三个小时。我坐在那里感到非常纳闷：不是研究给主席治病的问题吗？怎么总是谈她自己呢？

我当时沉着个脸，连总理都没有插话的机会，我们这些人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只好陪着她，听她没完没了地谈。

最后，江青终于看到了我的脸色，一本正经地冲着我讲道：“你不要愁眉苦脸，你们责任重大。不是我不同意主席打针吃药，是主席不同意打针吃药。你们要做好准备。”

次日晚8时，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开会。由周恩来同志主持会议。江青告诉汪东兴同志：“让张耀祠同志来怀仁堂参加会议！”

汪东兴转告我说：“今晚8时，你去怀仁堂开会，我留下来值班。”

江青在会上摇头晃脑他讲道：“主席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呢？是医生护士‘谎报军情’。”江青再一次恶狠狠地说：“医生护士是‘特务’、是‘反革命’！主席身边有一个集团，要拔钉子。有些人杀人不见血，有各种各样的手段……要立专案审查。”

这一番话，江青讲了两遍，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只是听听而已，没有一个人附和她的意见，江青显得非常孤立。



江青每次来主席这里，都要向工作人员询问主席的病情如何，使工作人员非常为难。说真情，江青便骂骂咧咧；一句不讲，江青也大发其火，说“你有敌对情绪”。主席知道这个情况后，在2月6日下午特意向我们交待：“今后江青如果要问病情，你们不要说，说也说不清楚。”

2月6日晚8点钟，江青来了，像以往一样，江青问道：“今天主席的病情怎样？”

我对江青说：“主席今天指示，今后不要说病情，说也说不清楚。”

江青“吭”了一声，到了主席的卧室，不多会儿就出来了，气鼓鼓地对我说：“你今天有敌对情绪！”

我说：“我没有敌对情绪，我是执行主席的指示！”

江青没好气他说：“引起病人的不安不好，不要无事生非，有人告我的状。当然要听主席的话，你们不要紧张，不会否定你们的成绩。你们在主席身边工作，不要放松警惕！”

等到主席身体状况平稳后，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把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如实向主席报告了。主席听后，对江青憋了一肚子气。

一天，周总理、江青、汪东兴来看主席。主席是了解身边工作人员的，他当着周总理、汪东兴的面，用他那硕大的手，指着江青说：“你说这些人（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是‘特务’、是‘反革命集团’吗？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那就是我。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了，要害我早就可以害。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

一席话，说得江青垂下头来，暗中更恨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了。

## 2. 毛主席突然休克

毛主席由于过度疲劳，加之他的肺心病伴严重缺氧，病越发严重起来。在他的住处，都存放着氧气筒，二十四小时都放着氧气，以保证室内氧气充足。

1972年2月上旬的一天上午，主席突然出现休克，把我们都吓坏了，这是主席第一次这样发作，弄得医生护士手忙脚乱。当时是护士长吴旭君值班，她的工作精细认真，极端负责。看到主席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显得很安然，她摸了摸主席的脉，没有摸到，便立即叫医生快来。

这时，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急急忙忙地赶到了，和医务人员一起马上对主席进行紧急抢救。顿时，整个空气都紧张了起来，胡医生口述所需要注射的药物，他讲一句，吴旭君重复一句，生怕忘记和弄错了所需要的药物，她牢牢地记在心上。备完注射药物，即往针管里抽，然后由吴旭君向主席体内注射。

此间，主席一无所知，完全处于昏迷状态，他安然地躺着。

注完药物，胡旭东扶起主席，有节奏地用手拍打主席的背部，不停地呼叫：“毛主席，毛主席！”

张玉凤也帮着拍打主席的背部，深深地叫着：“主席，主席！”

这时候，周恩来总理赶来了，他指示：“你们要用全力抢救。”他沉重他说：“这个国家的担子重，不能没有毛主席！”经过紧张抢救，主席慢慢地睁开双眼，他见到眼前围在他身边的人后，才知道自己刚才休克了。醒过来的主席显得神态安详，他幽默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经主席这么一说，经历了一阵紧张时刻的工作人员，只有在这时才轻松地笑了，总理也笑了。张玉凤同志把周总理、汪东兴请到主席跟前，主席喘着气说：“谢谢你

们！”并请他们到沙发上坐坐。他们问主席：“是否把刚才的情况告诉江青？”主席用目光扫视了一下身边的工作人员，又看看总理，说：“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能添麻烦！”

主席的健康状况是绝对保密的，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各级党政军领导人，都不知道主席的身体如何。要说知道，那也只是接见外宾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的一般情况。

主席身体康复后，同医务人员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块合了影！

周总理为了鼓励医护人员和在主席身边服务的工作人员，自己出钱搞了两桌饭犒劳大家。饭吃得很香，心情也特别愉快。但这餐饭也有遗憾之处，那就是总理因工作太忙，没有同我们一起用餐。

中央决定，在主席病重期间，由周总理、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负责主席的医疗工作的领导。

### 3．江青是怎样为自己的后路做准备的

1973年10月的一天，江青要来见主席，打电话给张玉凤。张玉凤将此事报告了毛主席。主席说：“她要来就让她来吧。”

不多会儿，江青来了。

谁知她一走，主席气喘喘地对张玉凤说：“她看我身体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要分我的遗产稿费了。”

过了两天，主席叫张玉凤到特会室取了三万元。

张玉凤吃了一惊，是三万元，在那个年代，三万元钱可是一个天文数字。

张玉凤把钱送到钓鱼台，亲自交到江青的手上，江青看到只有三万元，嫌少，对小张说：“小张，三万元对你们来说，不算少了，对我来说是不够开销的。”江青拿了这笔钱叫张玉凤替她保管。

1975年7月，江青给张玉凤写了一张条子：“玉凤同志，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如从1968年算起，我应归还新华社八千元，从1969年算起我应归还七千元。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相，购置灯光装置，灯光用具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的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慨。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元。”她还要毛主席再给她八千元。

主席从来就是非常节俭的，没有吃完的饭总是叫大师傅下一餐热了再吃。李讷小的时候吃饭总是往桌上掉饭粒，主席常常就讲农民种地不容易。毛主席进北京只做过一双棕色皮鞋，皮鞋穿得很旧了，也不愿再做新的，买来的新布鞋他往往让卫士穿旧了自己再穿。主席处处想到的是老百姓，是穷人，很少顾及他自己，他身边的卫士大部分都得到过他的“救济”，谁家有困难或是遭了灾，他知道后总是要慷慨解囊。当然得到他的补助的同志谁也没有主动伸手找他要过，而江青不愁吃不愁穿，却厚着脸皮要了三万嫌少，还再要八千元。

主席后来对我们讲道：“鲁班到终南山学艺，出师时，老师送给他一把斧子，并说，有人用斧子为自己挣下了一座金山，有人用斧子在人们心中刻下了一个名字，你是选择那一种呢？鲁班毫不犹豫地回答：选择后者。我们共产党人的手中都有一把斧子，那就是为人民服务。”江青想拿这把斧子去挣一座金山，她也会在人们的心中刻下一个名字，但这个名字是万世臭名！人啊，要有志向，这种志，是中华民族之志，是共产党人之志。毛主席非常坚定地说：“共产党人的志不能仅仅写在党章上，而要写在每个党员的心中，

要落实到行动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4. 三箭齐发，只瞄一箭

1974年1月，江青乘主席病重期间，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不请示毛主席，以个人的名义写信给叶剑英同志，打电话给周总理，决定在1月24日和25日召开驻京部队、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这两天会议，都是由江青一伙事先找迟群、谢静宜在钓鱼台精心筹划的，江青要迟群和谢静宜在会上发言。

“四人帮”在这个大会上不批林，假批孔。实际批的是“走后门”，三箭齐发，只瞄一箭，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叶剑英等一大批老同志身上。江青在会上批评周总理，说他“行动迟缓，跟不上形势”。批评叶剑英和老干部送子女当兵“走后门”，要限期从部队中退回来等等。谢静宜说：“今天，我是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讲一讲批林批孔的问题，孔夫子是一个儒家，不是法家，长期以来他是保守势力的代表，不批臭他，中华民族就不能前进。”他把目光投向了周总理，说：“代表反动的孔老二的思想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我们要坚决批臭这种妨碍‘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想。不管这种代表孔老二反动思想的人地位有多高、威望有多大，都要把他拉下马。”谢静宜又说：“‘走后门’，这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格格不相容的，这也是坚不坚持要搞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一基本原则的一个重大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迟群发言，语调也是杀气腾腾的，他说：“还有那个走后门的问题，批林批孔不是要联系吗？那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迟群讲完，江青没好气地对总理说：“总理，你说说吧。”总理接过话筒，说：“我是来参加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但我事先也不知道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走后门’的问题，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不敏感，有点落后于形势！”会后，江青把两次大会的录音和材料带到钓鱼台，用了三天时间进行精心修改和复制，准备发到各省、市、自治区，企图在全国再次掀起一个批林批孔和批“走后门”的运动，把全国再次搞乱，以便混水摸鱼，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

一次江青得意忘形他说：“哈哈，如今，周总理都叫我们搞得没办法了。”

主席知道这个情况后，当即指示：“不要发录音，发了录音的要马上收回。”这样，给了“四人帮”当头一棒。

1974年1月28日，我们把江青“1.24—1.25”的两次万人大会的讲话录音拿来放了一次，其中江青念了一首诗，说是毛主席写的，现在有许多书刊在写这一段历史时，都引用了这首诗。该诗不长，只有四句，其曰：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我们把录音连放了两次，认真把该诗记录了下来，交给了主席，先后两个工作人员，问道：“主席，江青说这首诗是你写的，你看是吗？”

主席拿着这首诗，看了看，摇摇头说：“我没有写这样的诗。不知是从何而来。郭老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也不至于如此。”

后来根据工作人员和机要秘书回忆，都说主席没有写这样的诗。大家认为，可能此诗是江青自己杜撰的，用这种形式来欺骗群众，整倒郭老。

面对主席的批评，江青不但没有反省自己的问题，反而紧逼叶剑英同志限定时间把当兵的子女调回来。

叶剑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便把自己的子女情况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1974年2月15日，毛主席看后在信上批了一段话：“此事甚大，从

部队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批林批孔还是要靠这些老干部……”严厉批评了“四人帮”。主席把这封信批给了周总理，请他负责印发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江青是中央委员，她看到主席的批示，气急败坏地质问总理：“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不给我看呢？”

周总理说：“主席叫我印发的。”总理把主席的批件送给江青，江青仔细看完批件，眼睛一瞪，哑口无言。对于这两次会议，在主席多次批评后，王洪文迫于形势，不得不作了几句检讨。1975年5月，王洪文在他的检讨提纲中写道：“当主席批示了北大、清华那份批林批孔的材料以后，特别是74年1月24、25日两次大会。虽然我对于两次大会的召开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主席，关于反对走后门的有些提法不妥，如混淆两类矛盾的提法，扩大了打击面等，也同个别同志交换过意见，但我没有及时向主席报告。这是我原则性不强，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这伙人就是这样的，明知不对就是不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这一事实证明，他们是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处处阳奉阴违。

### 5. 主席最反对拉帮结伙

1973年3月3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强调指出，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总理感到这是一个解放老干部机会来了。这天他来看望主席，并向主席报告了有无数的老干部挨整，他们一直没有工作等情况。主席说：“你说打倒了那么多老干部，我也是无意的把他们打倒嘛，我并不知道有那么多老同志受罪嘛！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烧糊了就不好吃了。”总理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主席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

打倒那么多的老干部，都是林彪、江青“四人帮”干的，凭心而论，主席是不知道的，他们都瞒着主席四处整人。

1974年3月的一天，江青要求见主席，主席不愿意见。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74年3月20日

1974年7月17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下午3时，与会人员均陆续到了会场。

这时江青来了，尽管她尽力地向人展示出一种首长的派头，但仍然掩饰不住心中那种受训的刺痛，显得很不自在和拘谨，以往的那种高傲和主角的派头不见了。就在这次会议上，主席点名批评江青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主席接下来又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帽子，不好呢，你的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也在这个会上主席当着大家的面指着江青说：“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呢！”因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来自

上海，这就是主席讲的上海帮的由来。

毛主席宣布说：“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开完政治局会议，毛主席离京。7月19日到了武汉，9月29日离武汉去长沙。

1975年5月3日，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主席说：“江青，党的一大半斗争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我看江青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又严肃指出：“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要照样搞下去呢？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江青早在4月27日的政治局的会议上作了点儿自我批评。当主席在5月3日指出“四人帮”的严重危害性后，江青不得不于6月28写了一封遮人耳目的欺骗信：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是开得好的。政治局比过去团结多了。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为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是从来不让步的。

江青

江青身边的护士多是从8341部队调去的，一个个都是经过挑选审查好了的。最先向我诉苦的是小许同志，她在江青那里呆了三年多时间，其中先后四五次向我哭诉说：“我实在呆不下去了，我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折磨。” 她请求说：“首长，你把我调走吧！”

我非常同情小许同志，但是我不得不考虑到主席的情绪。当时我劝道：“不要计较她的那些不负责任的话，还是要看在毛主席的面上，多忍耐，要顾大局。”

小许的思想表现和工作能力，我认为是非常不错的。她对江青的服务情况，我感到是做到家了的，然而她被江青扣上帽子，赶了出去。

小许走后，又把小赵调了去，没过多长时间，小赵同志又哭哭啼啼找到我，说：“江青无故地发脾气，无事找事，常说，你是‘特务’、‘反革命’，你要害我，你走路把贼风带来了。逼得我们好惨！”

几年时间里，小赵也是找了我好几次，我是一次又一次地把小赵劝了回去。最后仍然是扣上帽子赶出了钓鱼台。

有一次我对汪东兴说：“江青如果再要调护士，我再也不给她了。” 以前，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汪东兴管，后来汪东兴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我。其实，我也难以处理好这些事情。

这些护士最惨的是小周同志。小周在江青这里也是干了好几年，江青对她百般摧残，动不动就骂，罚她长时间跪在地上，最后江青对她进行逼供审讯，戴上“特务”、“反革命”帽子，投进了监狱，把人逼疯了。

最不可饶恕的是，她把一个忠实可靠、很有才干的秘书阎同志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监狱达七八年之久。

毛主席知道江青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恶劣行为，恼怒极了。有一次，毛主

席指着江青的鼻子，严厉斥责：“你就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的剥削阶级作风。”

主席生完气，江青走了。主席说：“江青这个人谁也跟她搞不到一起。”他长叹着气说：“江青使我背上了一个政治包袱。”

此后，毛主席不愿多见江青了。

## 6. 伸手要官要权

1974年10月17日。

江青一伙人正背着中央政治局在钓鱼台开会，筹划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商议，觉得自己的如意算盘如何拨拉，必须得到毛主席的支持，于是决定让王洪文去长沙见毛主席。

10月18日上午，王洪文背着有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也不通知警卫部门，自己向空军要了一架专机，秘密从北京飞抵长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得知王洪文来长沙，赶到机场迎接。汪东兴要我去接王洪文。13点15分，我接上王洪文离开机场，我便直接将他送到主席的住处。

王洪文见到主席，询问了主席的身体情况，然后就讲道：“主席，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的会，最后商定让我来向主席汇报的。我是冒着危险来的。”主席静静地听着。王洪文讲道：“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进一步强调说：“主席，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主席反问道：“是吗？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哇？”王洪文见主席炽炽发光的眼神，颤颤地说：“是的，主席！总理虽然有病都忙着找人谈话，嗯……”王洪文“嗯”了好长时间，他灵机一动，转变话题，在主席面前对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分别作了一番吹捧。这时主席一声没有吭。王洪文见到主席没有任何表示，最后只好讲道：“今天我还要赶回去，主席有什么指示？”毛主席此时一脸正色，他语重心长他说：“那好，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主席此言，又一次奉劝王洪文不要跟江青搞四人小宗派。主席最后说：“你在政治思想上不强，你们这些人的职务也够高了。”一席话说得王洪文心里像倒了五味瓶。当日下午时15分，王洪文连招呼也不打就愤愤地离开长沙回北京了。

早在1969年4月，在召开党的九大前夕，有人给中央来信，要求选江青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主席在这封信上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在他们企图由“四人帮”“组阁”派王洪文去长沙“告状”回京后，主席于11月12日亲笔批示告诫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但是，江青并不听主席的告诫。11月19日，江青给主席写了一封“检讨信”，信上说：“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我认为这些话并不是江青的内心话，在她的信的末尾才是她写信的真实意图：“自九大以来，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主席看了江青的检讨信说：“这不是检讨，分明是伸手要权，她的权还

小吗？”毛主席一直没有给她发号施令的实权。

主席回信再次批评了江青：“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职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江青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后，其野心仍然不死。1974年10月18日，她把王海容、唐文生两人叫到钓鱼台十楼，要二人在陪外宾去长沙时，向主席转达她的意见。她说：“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经常往总理那里跑，没日没夜地去干什么？是搞阴谋活动，周恩来是后台。周恩来和邓小平不分白天黑夜地频繁活动，很像1970年林彪搞的那一套，是篡党夺权活动。现在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不能不提高警惕呀！”说到最后，江青说：“在人事安排上，我建议让王洪文当副委员长。”

10月20日，王海容、唐文生陪着丹麦首相哈特林来到长沙见毛主席，等外宾走后，她们向主席转达了江青的“人事安排”意见，主席毫不客气地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主席说：“你们回去，告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要他们不要跟在江青的后面批东西。”“江青有野心，到处伸手，她不管到了什么地方。都要向群众讲话。总而言之，她只能代表她自己，她不能代表我。”

江青不善罢甘休，再次找到王洪文说：“10月你去长沙虽然碰了钉子，这算什么！1966年你在上海造反时，不是连性命都豁出去了吗？地位权力是争来的，不是谁人恩赐的，你再进行一次拼搏，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不能怕这个三长两短，关键时刻连死都不怕，你还怕什么？快到嘴的东西你不去争，不去抢，难道还要别人喂到你嘴里来吗？我为你当委员长，费了多少脑子，采取了多少措施，你知道吗？只有你再去一次，你不去谁去呢？”

王洪文说：“江青同志，我知道你对我的一片好心，我辜负了你的一片期望。船到码头车到站，官当大了，怕失去位置。现在我们并不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时候，还要斗争，要拼搏，不然我们所得的一切，也可能被人家抢去。哪怕是百丈深渊我也要跳，一不做二不休，豁出去。我去长沙向主席面谈，再力争一次。”

江青高兴他说：“这才是好样的，就是要有这种精神。怕什么，顶多挨几句批评。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抓住，就不能放弃，这叫‘寸权不让，寸权必争’，必须要争。”

正好12月23日，周总理约王洪文一起去长沙，同乘一架飞机给国家节约一点经费，而王洪文心怀鬼胎，他既不吭声，也不与总理同行，独自乘坐一架飞机去长沙。

一天，王洪文按江青的意见去找主席谈。讲着讲着，主席生气了：“你上次来我是怎样批评你的？我告诉过你多次，不让你和江青搅在一起，你不听，你们几个人拉帮结伙搞在一起，这是错误的，你要作深刻的检讨，不允许再这样下去了。你在这里呆两天，好好检查一下你的错误。”

王洪文说：“主席，我是有错误，我一定作深刻的检讨。”

王洪文唯唯诺诺说罢，向主席告辞回到了住所，写了一个通宵，也没有写出一个像样的检讨。就是这个不像样的检讨，也没有交给主席。到1976年10月6日把王洪文逮捕后，才在他的抽屉里把检讨抄了出来。其中写道：“两天来，我认真。回忆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主席发现后曾多次指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地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当工作中遇有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而是只找少数

几个同志，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的政治局会议上曾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有同志来找我议事，我仍然顶不住，因此就继续犯错误。……小平同志并不错，而是我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我不是全面地听取各方面不同意见，而是只听少数同志的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地向主席报告。干扰了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

主席对周总理说：“江青有野心，你看有没有？我看是有的。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了，我对她作了许多工作，她就是不听。她搞了三件事，‘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

总理沉默了好长时间。

当总理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时，主席一字一句地说：我看让小平同志做个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兼总参谋长，说着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人才难”三个字。总理说：“人才难得。”主席放下笔来说：“是喔是喔！”

这样“四人帮”终于没能改变四届人大的主要人事安排。在周总理的主持下，十届二中全会于1975年1月8日在北京召开，选举邓小平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人大会上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副总理。会后因周恩来病重住院，决定由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

江青一伙深感这是一场政治上的失败。

这天她又把王海容、唐文生叫去，把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王、唐把她的意见报告给主席。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唐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江青不死心，于1975年1月23日乘飞机来到长沙，她见到主席，主席开言道：“你的意见我已写信告诉你了。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江青于27日愤愤地离开长沙，回北京去了。

江青深感历史对她不公平，借古喻今，为自己登上权力的峰巅摇旗呐喊。1976年3月2日，江青擅自召开十一省、自治区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她提出“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她还表露了想当“女皇”的野心，她说：“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诽谤吕后，诽谤武则天，诽谤我，就是诽谤主席嘛！”

主席知道后批评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一省谈话。”

## 7. 穷于心计抓军队

江青一伙早就筹划着要把军权抓到手。1974年3月5日，江青、张春桥召集于会泳、陈亚丁等人开会。在会上，江青点名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说什么“八一（厂）造孽了，军阀管你们”，“陈亚丁回去你要动一动了”。“春桥同志，看来要夺军权，军队文化工作还是让亚丁去管起来，你在军委提一下”。江青以部署性的口气说：“放火烧荒，你们去三个人，去放火嘛！”江青还说：“亚丁的问题，军委备个案。”张春桥说：“那没问题！”



此后，部队工作中的报告、文件和信是写给军委的，但江青不送给军委主管部队工作的叶剑英同志，而往往是批给了王洪文。他们秘密放火烧总后、烧总参，搞得人心惶惶。

江青甚至想把火烧到毛主席的身边来。一天，她跑到游泳池，对主席讲道：“8341部队是跟林彪的，靠不

毛主席没好气地批驳说：“8341部队是跟林彪的，林彪为什么要搞大小舰队呢？有8341部队就够了么！林彪逃跑，8341部队一个也没有被带走嘛！8341部队是一支好部队！”

江青的阴谋没有得逞，又生一计。一天她向汪东兴提议：“让迟群到8341部队当政委，你看怎么样？”

汪东兴说：“迟群不能当政委，如果要她去当政委，必须报告毛主席同意。”

后来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当时反问道：“迟群怎么能当政委呢？！”

8341部队当时有八个大队，数千人，是一支林彪害怕、江青一伙千方百计想抓到手的部队。但是，任何野心家、阴谋家都未能得逞。

江青没抓住军队，便决定搞第二武装。

1974年的一天，江青同王洪文、张春桥说：“现在我们怎样把军队抓过来呢？这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一步棋。现在都抓晚了……”“人总不能让尿憋死，我们搞第二武装，造反派还是听我们的话。把民兵组织起来。发给枪支弹药，进行军事训练，到了节骨眼上时，把这支队伍拉起来，是可以同他们较量一番的。”

江青看着王洪文说：“洪文，第二武装，你在上海先搞起来。那是你的根据地，人熟地熟，又有群众基础。”

王洪文点头说：“给民兵的武器，要现代化的机枪、大炮、甚至火箭等都应装备齐全，不管出了什么情况，我们都要有自己的武装。‘权’肯定不是靠别人恩赐，而是靠我们自己去夺取。”

王洪文多次到上海去，经过精心策划把武装部改为民兵指挥部，另立系统，受“四人帮”一伙操纵，并力图把它作为篡党夺权的工具。王洪文直言不讳他说：“把我这支队伍（民兵）建设好，就是一个领导权的问题。要把现有的民兵武装牢牢控制在我们手里。”

此后几年，王洪文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上海擅自扩大组织，增加经费，生产军火，储备物资。

1975年9月18日，王洪文窜回上海，接见了市委和民兵指挥部的头头，他说：“我最担心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因此，要建立民兵指挥部，把武装部合并进去。这不是一个组织形式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搞起来的，你们可要给我抓好。现在你们要作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来，我们是否站得住。”

主席逝世后，上海民兵工作更加紧锣密鼓了。他们在主席病逝的第二天，就决定把库存的几十万支枪发到基层民兵手里，以加强“第二武装”。1976年9月21日，张春桥、王洪文请徐景贤秘密从上海来到北京，要他汇报民兵准备工作情况。

徐景贤说：“民兵现在可以应付一阵了。”

张春桥说：“你回去抓紧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不能只应付一阵子。要抓

紧搞好战备，这是大势所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上海民兵责任重大，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谈完话的当天，王洪文去上海检查战备落实情况，回到北京后，江青找到王洪文说：“洪文，你现在要紧的是抓紧上海的第二武装。”

王洪文说：“上海没有问题，我刚回来，已经部署就绪，过几天，准备再去检查落实一下……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北京。如果这里的军队控制在我们手里，就什么也不怕了。”

其实，王洪文并不放心，23日又给上海的玉秀珍打电话，叮嘱“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没有结束”。

9月28日，张春桥又派秘书肖木去上海，向市委常委传达他的指示：“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当然要看看到阶级斗争是曲折的，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上海还没有真正经过严重考验，林彪要在上海搞都没有成功。”

“四人帮”商议了分头进行“抓枪杆子”的活动。

江青到了北京昌平某部。

王洪文到了保定某部。

张春桥到了通县某部。

他们分头串连拉拢煽动部队跟他们走，但是谁也不理他们，没有拉动一个。解放军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

#### 8. 江青大闹政治局

1976年9月29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和北京及外地的部分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华国锋同志主持。江青气哼哼地首先发难，劈头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王洪文、张春桥也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帮腔，说什么“今后要加强集体领导，为了保证不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就在今晚研究讨论安排江青工作问题。”一时间空气异常沉闷。很显然，要求讨论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让她当党中央主席，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然而，江青一伙错误地估计形势。过去政治局的同志对江青的胡搅蛮缠、无理取闹多是谅解她，谁要说个不字，谁就会遭到厄运。现在不一样了，特别是毛主席选定了第一副主席后，这自然让江青没了份，即使要大吵大闹，许多政治局的老同志也都会理直气壮地站出来主持正义，顶住她。这不，王洪文、张春桥把江青“抬”出来，立即就遭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多数委员的反对。这时，华国锋同志在会上念了毛远新给他写的一封信，信中大意是这样的：我是主席的联络员，是从辽宁来的，主席现在去世了。我没事可做了，是留在北京还是返回辽宁？我觉得返回辽宁好。

华国锋念完信，当即表态：“我同意毛远新同志回辽宁。”那四个人一听，都语无伦次地说：“毛远新应该留下！”

其实，毛远新给华国锋同志的信是江青一伙人事先策划好了的，想以此来试探对他们的真实态度。没想到华国锋同志一下子砸烂了他们的如意算盘。

江青瞪着眼讲道：“毛远新不能回辽宁，要留下来起草三中全会报告，他还要处理毛主席的后事！”

华国锋同志没好气地盯着江青说：“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怎么现在又说毛远新要留下来参加后事呢？”

这时江青气得青筋暴胀，高声吼道：“我什么时候讲的，我根本就没有讲，这是栽赃，这是诬陷！”

江青的撒泼，在座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看到了。也就在这时，汪东兴出来作证：“江青是讲过她与毛远新不参加主席的后事！”

在证人面前，江青脸面大扫，立刻又哭又闹，她说：“你们这是要赶我走，我偏不走，我要留下！”

张春桥见此情景，马上打圆场道：“还是这样吧，毛远新暂时留在这里，他熟悉情况，主席写的东西只有他能看懂！”

江青也拿出演员的技巧，也不哭不闹了，她说：“对，还是把主席的文件、材料交给毛远新。这样做，我放心！”叶剑英这时斩钉截铁他说：“我同意国锋同志的意见，毛远新还是回辽宁，文件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保管。”会议对峙到次日凌晨。江青眼看难以实现自己的意愿，再一次哭闹起来：“喂！你们不想讨论了！？好吧，有关的留下，无关的都走！”这话，好像政治局会议是由她在主持，由她发号施令。华国锋同志长叹着气，说：“这样，叶剑英副主席年纪大，先念同志身体有病，两位可以先走，其他的同志留下来，还是不要走。”江青非常强硬他说：“不行！”王洪文也附和道：“无关的都走！”叶剑英愤然离席。接着有几个委员相继离开会场。汪东兴没有走，他怕会出现更加可怕的情况。江青又开始喧嚣起来，感到无关的人员还没有走完，死死扭住华国锋不放。华国锋同志不耐烦他说：“你究竟想要干什么？”江青说：“要讨论起草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张春桥也跟着讲：“毛远新不能走，还要他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

华国锋同志马上讲道：“会议开到这里，不要再吵了。我认为毛远新应该回辽宁去，这是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华国锋说：“由于叶副主席和其他一些委员不在场，关于三中全会的问题根本不能讨论。”华国锋同志毫不客气地说：“即使三中全会要做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做，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

讲完，华国锋站起来说：“散会！”

1976年10月1日至5日，江青等先后去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二七厂等单位频繁活动，到处发表演说，蛊惑群众。她在清华大学居心险恶地说：“有人要迫害我，有人要弄死我。他们绑架了我一次，我准备被绑架第二次。我随身带了一把剪子，准备自卫。我向你们年轻人宣誓：‘我要斗，我还能斗，我要锻炼好身体，跟他们斗’。”

江青还散布谣言：“毛主席这么早逝世，是受了林彪、邓小平的迫害，特别是邓小平，你们要继续批邓，要把邓小平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同时，江青也在为自己梦想登基制造混乱。她对一些群众讲道：“什么叫生产力呢？我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讲，生产力最主要的是劳动力，劳动力是我们妇女生的。你们在座的诸位，都是我们妇女生的。”一席话，讲得一些师生员工一个个睁大了眼睛。这江青究竟懂不懂政治经济学，懂不懂生产力的概念呢？

江青外出的这几天，不告诉警卫部门，而是让她的亲信派民兵给她站哨。

10月3日，王洪文窜到北京郊区平谷县，他问人家：“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们，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 9. 我负责一个行动小组抓江青

党中央决定：粉碎江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把王、张、江、姚抓起来，做到一网打尽。

这项行动，由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部署，汪东兴同志负责组织实施。

从中央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抽调了二十几名干部，分成四个小组，分别交待任务。

10月6日下午3时，汪东兴找我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到他的办公室，正式给我们交待任务：“中央决定在今天晚上8时统一行动，粉碎‘四人帮’，你和健华逮捕江青。”

汪东兴还交待了逮捕方式，“你去了向她说：‘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交出文件柜钥匙，不准打电话’。并说，‘对毛远新实行保护审查……你也一并解决’。

我当时对汪东兴说：“对，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想起那时的情况，的确是这样，江青一伙正在蠢蠢欲动，加紧篡权，党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就是在这关节点上。我们必须先下手。

当我们的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一看表，才下午点，离晚上8点还有四个小时。这四个小时中，勾起了我许多往事的回忆，越发感到江青罪大恶极，恨不得马上就去抓她。等呀等呀，觉得这四个小时特别漫长。

时间到了，我们随即出发。江青当时住在中南海201号楼，这个地方的每一个角落我都很熟悉。我和武健华等人在晚上8时，先到毛远新的住所，进了他的办公室。他们正在看电视。毛远新见到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立即站了起来，马上关了电视。

我即宣布：“毛远新，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保护审查’，为了你的安全，还住在这里（中南海），但要换一个房间。现在，你把文件柜钥匙和手枪交出来，材料和文件由中央办公厅派人接收。你的生活、安全仍由李连庆同志负责，不准向外打电话，要遵守纪律。你写的交待材料交李连庆同志转交党中央。”宣布后，毛远新骄横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不交钥匙和手枪，我们一位干部上去收缴了他的手枪和钥匙。

江青离毛远新的住所很近，我和武健华20点30分来到了她的住所。一进她的办公室，她正坐在沙发上。我向她宣布：“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党中央决定将你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你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由于对江青极大的愤恨，我当时说的“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是我临时加上说的话。

在我宣布的时候，江青双目怒视，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未发一言。她似乎早有思想准备，会有这一天的。她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在地上打滚。

我宣布完后，江青站起来，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拿了一个信封，用铅笔写上这样几个字：“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将信封两头作密封签贴好，顺手交给我。这时武健华同志上前领着江青出来。外面江青平时用的小车和一直跟着她的司机在外面等候着，江青以一种惯常的姿态上车，将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了。没有给她戴手铐，没有人向她扔纸团、吐口水。

其实，早在1975年5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就提出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说：“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

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番话，虽然没有明确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但是，它表明了毛主席解决“四人帮”的决心和时间。在他生前没有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在他逝世后的第27天，在党中央领导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 第七章 毛泽东生活拾趣

在人们看来，毛主席工作很累，生活也很枯燥。其实并不是这样，他是一个富有情趣的人，他谈吐幽默，跟身边的人非常随和，喜欢游泳、爬山，平时爱和身边的人逗逗趣，大家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在主席身边工作，我们一直处得很愉快。在这一点上，江青却与毛主席反差很强烈。江青跟她身边的人难以处在一起，动不动就吵架，赶人家走。毛主席曾经对我们讲：“跟自己身边的人都搞不到一起，这等于是自己孤立自己，心不齐，力难支，蜂王再大也做不起巢，自己把自己搞得很累，何苦来哉！”

### 1. “来来，我们比一比手劲”

1974年9月29日，我当时跟随主席在武汉。晚10时，张玉凤同志来电话说：毛主席找我。我大步地走到主席那里。主席正坐在沙发上，一见到我就笑着说：“来来，我们比一比手劲，看谁的劲大。”

我看他是吃了安眠药，很兴奋，没有睡着觉，我摆出一副较量的架势，但没有用劲，有意让毛主席赢，他一开始就使出劲压住我的右手，我说：“主席，你的手劲大，我比不过你。”

毛主席哈哈大笑，兴致很高。然后，他说：“我们今天晚上去长沙。你告诉医生明天回北京，眼科罗、方医生回成都，方医生回上海，李培英医生回北京医院。需要时再来。”

我说：“主席，内科医生还是跟我们去长沙，给我三个小时作准备。”

主席说：“好！”

我回到住所分别通知有关部门立即进行准备工作，通知眼科、化验医生明天先回北京，再从北京回到原单位，需要时再来。

凌晨1时主席专列离开武汉。30日早晨6时多到达长沙，住在九所6号楼。

11月14日凌晨4点20分，毛主席接见内、外科医生，他说：“见见你们，你们回去好，参加临床实验，不要脱离临床，这是正确的，你们的工作是好的，帮了我很大的忙，成绩是九分，缺点是一分（用无名指示意），不足的不说了。”

主席谈话15分钟，最后医生给主席看了身上的皮肤病，量了血压，当时血压是130/80，脉搏83次，发现一个早搏，其它均正常、规则。

11月、12月，高龄81岁的毛主席在长沙省游泳馆游了五次泳，最多的游了45分钟，最少的也游了30分钟。

其间，从北京请来了两位皮肤病的专家袁兆庄、赵炳南。11月20日，主席游完泳，正在休息，汪东兴向主席介绍了两位医生。

当时袁医生很有把握地说：“主席，这个皮肤病好治，有几天就可以治好。”

主席开玩笑地说：“你吹牛皮。”

袁医生这时认真分析了主席的皮肤情况，采用口服药、外擦药的治疗方式，过了几天后，有了明显好转，最后终于痊愈。

主席在长沙住了一百一十二天，快要过春节了，主席对服务员说：“我们要走了，让你们好好过一个春节。”

1975年2月3日，主席离开长沙到达南昌，在南昌过春节，住了两个晚上。

1975年2月6日早6时，主席离开南昌在晚上到达杭州，住在汪庄。

1975年4月12日晚10时15分，主席离杭州经上海北上，于4月13日晚回到北京中南海。

## 2. 风雨无阻爬山锻炼

1953年12月24日至1954年3月7日，毛主席带领一个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写作小组来到浙江杭州。当时主席住在刘庄，写作小组住在北山。我带领着一支警卫部队，分住两地，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外围的警卫工作由当地的公安警卫部队负责。

毛主席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毛主席深深感受到了一个国家宪法的重要意义，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又要照顾到过渡时期的具体情况。因此，毛主席对此极为重视，他自始至终地领导和参加了宪法的起草工作。不仅提出了制定宪法的指导思想和许多重要内容，而且还反复进行文字修改工作。

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一切工作都要从头开始，工作量很大，非常紧张和疲劳。在此期间，主席风雨无阻地爬山锻炼。他说：“散步是锻炼身体，也是锻炼意志。”散步有时（工作时间长了，睡觉前）在院子里走走，约摸10分或20分钟，有时则到野外走走，约半小时或一

个小时……这要根据他的工作忙闲来决定。散步时，爱和跟随他的工作人员聊天，天南地北、海阔天空都谈，他谈为主，问问你的家庭情况、家乡情况，还谈到重大事件，也问问你的意见，如：“应不应该打过长江去解放全

中国”、“美帝国主义快要打到中国鸭绿江边，敢不敢和美帝国主义打仗”等。有山的地方就爬山，领略风光；有江河的地方则游泳。这次，主席主要是爬山，一般在下午4点钟左右出去，7点钟左右回来。他爬山就像他游泳一样，是谁也甭想打乱他的计划的。他意志坚强，轻易

不愿改变初衷，哪怕途中遇到荆棘或坎坷等，他也都向前爬去。他对杭州周围有名的山几乎都爬过一遍，先后共爬了三十五座山。

其中，“岳王庙”主席爬了两次，“南高峰”爬了三次。天下着雨也坚持按计划爬山。一块陪同主席爬山的有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公安部九局局长汪东兴等同志。

主席对我们讲：“不要因为天下点雨，就干扰了我们的散步计划……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从来都是风雨无阻的嘛！”

“五云山”也是一座高峰，上下山有五十华里，山上有寺庙。一天下午，我们随主席从西湖方向上山，爬到

半山腰，太阳偏西了。要是爬到山顶上，太阳就要落山了，天一黑下来，便很难看清回家的路。我们动员毛远新去劝主席下山：“今天太晚了，天快要黑了，我们下山回去，下次再来吧”。主席听了不高兴地挥挥手说：“你们没有志气，就不要来。”

听如此说，大家再也不吭声了。

我们只好跟着主席继续往山上走，一直爬到了山顶。

这时，太阳落山了。可毛主席还要参观寺庙大殿，找和尚谈谈。然后，同我们一起合影。

往回走时，主席不走回头路，要从钱塘江方向下山。这条路不朝阳，山坡上还有一层积雪，天黑路滑，走起来一脚高一脚低，实在太难走了。

当我们走到山脚下时，已是晚上8点钟了，离公路还有十几里呢！主席对我们说：“凡能做到的事，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跑步、爬山、游泳、打太极拳及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爬山就是前进，使人步步登高，可以尽情地享受山中的新鲜空气，阳光和无限风光，锻炼身体，舒畅胸怀。爬上山顶，举目瞭望，会有胜利在握、心旷神怡的感觉。”

“碧云山”从山脚到山顶有四五华里路，但要走过山腰往西约十华里的路才能向山顶上爬。我们在中途休息了一会儿，又走了几里路，这时候已经下午6点钟了，我们向主席建议：“现在往回走吧，再往前走天黑了看不见路了。”

主席没有答话，继续走他的路，过了一会儿，他停下来，擦了擦身上的汗，笑着说：“你们都累了吧？我也有点累了，身上已经流汗水啦！”

我们建议：“那我们下山回去吧？”

主席说：“不不！走得累一点，身上流点汗水，这对身体有好处，这才叫锻炼呢！锻炼要有点毅力，不能累了就不干啦。”

一席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主席转身对后面的人说：“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们往前走，绝不下山。”

过了一会儿，主席向我们解释说：“刚才说的好马不吃回头草，是说的马，我拿这句话作比喻，我们人也可以说，好人向前，坏人向后，一个革命者干什么事，总是永往直前。”

在爬山时，主席常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说笑笑，气氛十分活跃融洽，常常不知不觉地爬到了山顶。站在山顶，极目远眺，杭州城环抱西湖，满目青翠，一片葱茏，阵阵清风吹来，令人心旷神怡。主席说：“爬山是全身运动，既能增强体质，又能观赏风景，还可以使人心胸开阔。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嘛！这是一举三得。”毛主席青年时代就爱爬山，参加革命，在战争年代，在江西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在陕北胡宗南进攻延安，几乎天天要爬山，如井冈山、武夷山、六盘山，数也数不清的大山。战争年代爬山是为了打仗，消灭敌人；和平时期爬山是为了锻炼身体，锻炼意志。

### 3. 朴素的生活

主席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战士和服务员说：“要注意勤俭节约处处爱护公物，注意节约水电。”甚至要求他们火柴用完了，把火柴盒留起来，再买一些散的火柴装上再用。一粥一饭都是来之不易，一针一线也不应该浪费，这都是来自人民，是劳动人民流血流汗生产的果实，如果浪费了，就是白白丢了人民的劳动果实和自己手里的财富，影响我们国家财富的积累。万万不可这样做。”“几棵小麦做一个馒头？几株稻子做一碗米饭？有谁算过这笔账？”又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如果一个人一天浪费一粒米、一年就要浪费掉365粒米。这样，8亿人一年浪费的粮食积累起来，就能救济很多灾民，如果8亿人民每人每天再节约一粒米，其数量不就可观了吗？实行勤俭节约，反对浪费，能够使我们的国家富强了再富强，



使人民生活提高了再提高”。他说：“只要大家注意，处处都可以节约，积少成多嘛！节约也是建设社会主义重要的一条。”

主席是这样要求别人的，也处处用这些原则来要求自己。

在衣着上，主席做过一套灰色毛料制服，这套制服只用于接见外宾和参加会议等场合穿，其余时间穿睡衣办公、看书。开国大典做了套制服，只穿了一次便送给身边的工作人员了。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要来华访问，工作人员向主席说：“做一套新制服吧！原来的那套制服太旧了。”毛主席同意了，做了第三套制服，他仍然只穿了一次。

主席的衬衣、袜子、睡衣、布鞋、毛巾被等都是旧的，打过很多补丁。无论哪一件，总是破了就补，补了再补。实在不能补了，主席总是说：“想点办法嘛，艰苦奋斗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呀！”我们见到主席的衬衣、睡衣和毛巾被的补丁“千姿百态”，“不成方圆”，灰布头、白布头、蓝布头，有什么布头就补什么布头。主席说：“没有关系，穿在里面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了。我的标准不露肉、不透风就行。”主席说：“我节约一件衣服，前线战士就能多有一发子弹。现在国家还穷，不能浪费啊！”主席每天穿的两件睡衣，一件黄色，一件白色，裂了口子，缝一缝，破了找块布补好，一件有五十九个补丁，一件有六十七个补丁。曾有一位同志把这件补丁最多的睡衣换下来，拿了一件新的睡衣放在主席的卧室。这天，主席起床穿衣时，发现睡衣被人换了，很不高兴，一再追问“那件睡衣到哪里去了？”工作人员只好又把那件破旧的睡衣拿来让他穿上。毛主席边穿边说：“习惯了，还是这件补了补丁的好穿。”

进城后，主席仅做过一双棕色皮鞋，旧得褪了色，工作人员劝他再买一双新的，他就是不同意，直到去世他也没有买过一双皮鞋。给他买来新的布鞋，他要让卫士或警卫战士帮他穿旧了再拿给他穿，他说：“我岁数大了，穿旧的舒服。”最值一提的是一双旧拖鞋，鞋底早磨穿了，已经修补好几次了，主席不愿意丢了，坚持说还能穿。工作人员只好顺便把拖鞋带到长沙，请技术好的修鞋匠修理。可是，在长沙市里找了三四家鞋铺，补鞋师傅提起鞋看了又看，都是一句话：“换双新的吧，这双拖鞋没法子修了”，工作人员既不能说这是主席穿的拖鞋，又不能不予修理。再去找吧，后来找到一位耐得烦、功夫细的老修鞋匠，好说歹说，又帮他打下手，又递烟，才总算把破了的拖鞋修好了。拿回去后，主席穿上了很满意。他一再叮嘱工作人员，凡是给他添制衣物之类“不经我的允许不准做新的”。

在饮食上，主席基本上保持农民的生活习惯，一天吃两餐饭，个别时候吃三餐，有时一天只吃一餐。只饮茶，不喝酒、不喝牛奶。主食是大米，尤其爱吃糙米，大米掺小米，大米掺芋头，新鲜玉米和烤红薯代主食。副食以青菜为主，条件好的时候每周吃一二次红烧肉。在西柏坡，毛主席指挥三大战役期间，有多少不眠的日日夜夜，同志们想把毛主席的伙食搞好一点，警卫战士下滹沱河捉鱼。毛主席说：“不要乱忙，你们弄来了我也顾不上吃，你只要隔三天给我吃顿红烧肉，我肯定能打败蒋介石。”“济南解放了！”毛主席向卫士挥着攻克济南的电报。一个卫士调皮地把它与红烧肉联系起来：“主席吃了红烧肉，指挥打仗没有不赢的。”

到了60年代末和70年代，因年纪大了，主席就基本上不吃红烧肉了，什么炒肉丝、炒肉片、炒腊肉之类他都不爱吃，牛羊肉基本不吃，更不吃大虾、鱼翅、鱼肚、鱿鱼、海参等海鲜。他还不爱吃水果，五六十年代还吃点

桔子、桃子、西瓜。因牙齿不好，一吃水果就痛。到了60年代末期以后，这些水果也不吃了。工作起来不分钟点，有时工作起来连续几个昼夜不停。吃饭也没有钟点，只是感到有点饥饿了，才想起吃饭。他习惯于简单朴素，粗茶淡饭，一生没有吃过任何补品。他为党为人民工作终生不息，却从来没有追求过非分的享乐，在他看来追求个人吃喝享乐，那是格调很低、很庸俗的事，尤其厌烦宴会。在50年代，我国接待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时，举行国宴的标准较高，一般都有山珍海味等贵重食品。为此，毛主席曾作过指示：“不能总是山珍海味，既浪费又不实惠”。“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吃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是人，人跟其它动物就有这个区别。”

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为了战胜苏联对我国经济建设施加的压力和自然灾害，毛主席与全国人民同甘苦，七个月没有吃肉，也不喝茶。警卫战士看到主席这样艰苦，心里非常难过，大家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毛主席为全国人民日夜操劳，还在乎他老人家吃点肉、喝点茶吗？工作人员再三劝他吃点肉、喝点茶：“你年纪大了，又是高度脑力劳动，需要补充营养。”毛主席说：“有饭吃，有青菜就很好嘛，国家有困难，人民都过着艰苦生活嘛。”

周总理有一天到毛主席住处谈工作，谈完后劝主席吃点肉，主席笑着说：“你吃不吃肉？”

周总理也笑了。主席说：“大家都没有吃肉了，我们要和人民群众一起过艰苦生活嘛！”毛泽东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青年时代是一个穷书生，参加革命，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条件极其艰苦，常常吃不饱饭。1932年、1933年在江西瑞金期间，每天每人只有十二两粮食，五分钱菜金，更谈不上吃好的了。

到了北京后，条件比过去好多了。但毛主席一直保持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医生和工作人员经常劝毛主席“要加强营养，多吃点好的，每周制定菜谱，改善饮食习惯”。毛主席说：“全国农民要是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不错了，你们就可以来跟我提建议了”。

毛主席特别关心农民，关心全国人民。他活得洒脱，对金钱、物质生活条件方面从不讲究。他不讲究吃，不讲究穿，生活不拘小节。对于钱，他绝不当它的奴隶。没有钱，他不苦恼，有了钱，他也不当守财奴。他收藏的几万册图书，绝大部分是自己掏钱买的。

1965年冬，毛主席搬到中南海游泳池住。游泳池是建国后为中央领导同志游泳修建起来的，包括室内和室外两个。毛主席把室内游泳池临时更衣休息用的一间约有十五平方米的房子用作卧室。而另一个大厅，用于开会、接见外宾和兼作书房。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到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郭沫若同志看到毛主席没有表，就送给他一块瑞士产的手表，毛主席很珍爱它，时间久了机器有些失灵，送去修理时，临时拿来了一块礼品表，想给他换一下。毛主席说：“我还是用我原来那块表，外宾送的礼品统统要交公，不能留一件东西。”郭沫若送的表，他一直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如今这块表存放在毛泽东纪念馆里。

#### 4. 打球也要讲友谊讲团结

1969年10月中旬，林彪说：“根据当前的动态，苏联要进攻中国，我们要备战，准备打仗。中央领导同志要疏散到外地去。”

10月15日，毛泽东主席乘火车离北京到了武汉，住在东湖宾馆1号楼。

在此期间，主席很少出来散步，忙着审批文件、看书、思考问题。

有一天，一中队同当地机关和警卫部队的同志进行了一场球赛，结果一中队赢了。

周福明将此事向主席说了。

没过几天，当地机关跟我们一中队商量再进行一场球赛，地点在东湖宾馆礼堂旁边的球场上进行。

周福明再次报告了主席，主席点了点头。

这天，球场上双方队员都到齐了。

毛主席兴致勃勃地来到球场。大家见到主席也来看打球，双方队员都非常高兴。

球场上，一声哨声吹过，争球，球一出手，整个球场角逐起来，双方争夺不让，特别是在抢篮板球时，主席站在那里都看笑了。

过了一会，一位工作人员给主席搬来了一把椅子。主席坐下来，掏出烟，点燃后猛吸一口，这时一中队进球了，透过烟雾还可以清楚地见到主席那慈祥的笑容。

可是，当地的警卫部队进球时，主席竟轻轻地鼓起掌来，在他看来，上次我们一中队赢了，这次就不一定硬要去赢人家嘛。但是我们一中队的同志争球激烈，当球在对方手里时，一中队往往就非要夺过来不可，主席看了就不高兴，他很希望我们一中队打得谦让一些，打出风格来。

但是主席看到了球赛结束，抬头看看比分，还是一中队赢了。

主席没有吭声。离开球场沿着湖边走，我们尾随在主席身后，转了半个圈，主席一句话也没有讲，仿佛有不少心事。

主席回到1号楼。坐在沙发上点燃了烟，对我们讲道：“打球，不要老想赢人家嘛，要讲友谊、讲团结啊！要有风格、要谦虚。你们这些人到地方上，人家总是热情接待你们。今后不管到了什么地方，都要尊重人家，要尊重他们的领导、尊重大师傅、服务员和水电工人，说话态度要和蔼。”

我把主席的重要指示向一中队的同志作了传达，大家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讨论，不少同志讲道，主席的指示意义重大而深远，赛球不是为赢几分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同兄弟部队用球赛的活动联络感情，增加友谊，加强团结，老是抱着赛球是为了赢几分的思想，出发点就是错误的。

之后，主席到一中队战士宿舍看望大家。他走进一个宿舍说：“我来看你们在干什么？”

他笑容满面、慈祥可亲地对战士张广民说：“你是山东人吧？”

张广民说：“主席，我是山东人。”

主席问：“你叫什么名字？”

张广民说：“弓长张，广大的广，人民的民，张广民”。

毛主席“噢”了一声，便转过头来对大家说：

好，要和广大劳动人民在一起。”

毛主席指着在场的几个战士说：“你是山东的，你是广东的，你是河南的，你是江苏的……我是湖南的，咱们一个人一个省，是五湖四海啊！”

毛主席对一个广东籍战士意味深长地说：“你们广东肇庆的曾文，到哪里去了？我很想他。”

主席难过地说：“曾文是五华县人，从小没有父母，是卖给人家的，你们知道吗？曾文在回乡调查材料中说，他们那里的老百姓组织起来，同自

然灾害作斗争的事迹很可贵啊！合作社就应该起这样的作用。”主席赞扬那里的群众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气魄。

## 第八章 毛泽东对人做事对子女

毛泽东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既能反省自己的思想和问题，也能谅解别人的难处和苦衷。他尊重别人也希望人家尊重他，对人对事对家庭成员既有人间真情，又讲原则性，一切从国家的大局出发，原则性中伴着灵活性。很多时候，亲情、友情、同志情往往交汇在一起，让人感到伟人也是凡人。但是，大多数时候同志情、战友情远远胜过了亲情。

### 1. 毛主席参加军人大会

旧军队，打骂体罚士兵是司空见惯的事。毛主席也参加过旧军队，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走上革命道路后，他为部队制定了种种纪律。但是，部队时有所犯，屡禁不止。

中央政府警卫连三排王排长，是从旧军队过来的，思想作风改造不够，存在着严重的军阀残余意识，对新战士说话态度生硬粗暴，有时骂战士打战士，用脚踢战士，有的战士受不了这种气，开小差回了家，造成了连队减员；王排长同住地群众关系也不好，老百姓放了几个马桶在营区厕所旁，为积点尿水作肥料，他用脚“砰砰砰”地踢得老远，有的马桶被踢坏了。老百姓的意见很大，非常气愤地说：“我们放几个马桶积点尿水，又不影响你们什么嘛，为什么不让我们积呢？让他们白白地流走了呢？还把我们的马桶打坏了。”

这些情况很快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毛主席亲自来到这个连队参加军人大会。

1933年12月的一天，警卫连正准备开军人大会，这时毛主席来了，全连同志心情非常激动，鼓掌热烈欢迎。毛主席满脸笑容连连向大家招手致意。王自然连长宣布开会，请毛主席作指示。

毛主席双手撑在桌上，讲道：“同志们，警卫连担负中央政府机关的安全保卫任务，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成绩是主要的。今天我主要讲讲军民关系、官兵关系问题。你们连三排王排长骂战士、打战士、用脚踢战士，被打骂的战士不满意开小差回家了，造成部队减员；他还打坏了老百姓积肥的马桶，损害了群众的利益，破坏了军民关系。这是一种军阀残余作风，很不好，要坚决纠正。军民关系好比鱼和水的关系，鱼离开了水就不能活，军队离开了人民群众，就失去了依靠，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就无法打胜仗。中国工农红军是为人民谋利益求解放的。因此，红军的一切行动都要爱护人民的利益。一定要搞好军民关系，加强军民团结。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中国工农红军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队，是有本质区别的。两个军队代表着两个阶级的不同利益，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队，当官的都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子弟或是他们的亲戚朋友，他们都代表着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些当官的为了个人升官发财，压迫剥削士兵，克扣士兵的军饷，喝兵血。用欺骗打骂手段统治士兵，驱使士兵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上前线打仗卖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从战士中培养提拔起来的，他们都是工人农民的子弟，干部和战士只是分工不同，都是阶级兄弟，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大家都是为工人农民，为全中国各族人民求解放来当兵的。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重视军政团结、官兵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干部要模范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关心爱护战士。遇事要冷静，不要急躁，处理问题不要简单粗暴，要学会管理教育部队的方法。要严格禁止打骂战士、侮辱战

士的人格。战士要尊重干部，服从领导，听从指挥，遵守纪律。”

对王排长怎么处理呢？毛主席说：“王排长违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骂战士破坏了官兵团结，破坏了军民关系，错误是严重的。为了严肃军纪，教育本人，撤销排长职务，调离警卫连。希望王排长改正错误，只要改正了错误就是好同志。”

毛主席还讲了当前革命斗争形势，他说：“现在国民党蒋介石又调集了几十万军队。向中央苏区发动反革命‘围剿’。敌人实行堡垒政策，步步为营，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全党、全军要团结起来，团结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坚决打败蒋介石的反革命‘围剿’。”

毛主席的讲话使警卫连的官兵很受教育和鼓舞。从此，全连干部和战士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上下之间、官兵之间更团结了。打那以后，警卫连每星期六帮助驻地群众劳动一天时间，军民关系也大大地得以改善。

## 2. 毛主席请彭德怀出山

1965年9月22日，毛泽东约彭德怀到颐年堂谈谈，准备让彭老总出来工作。六年前，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彭老总感到会议的前期对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总结不够、问题没有摆够，如果这样何以纠正我国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于是他在1959年7月14日向主席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看法。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批道：印发各同志参考。其后，毛泽东积极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中央立即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全会对彭德怀进行了组织处理。

六年了，彭德怀与毛泽东一直就没有联系。可在1965年，彭德怀又一次给毛主席写了信，这一次是八万字。毛泽东的心里很不平静，加之要搞三线建设了，彭德怀是一个强有力的指挥者，可以让他去领导三线建设。9月23日早晨7点多钟，毛泽东提前来到颐年堂等候彭德怀同志。彭老总是8时来到颐年堂，他大步走了进来，主席这时笑容可掬地站了起来，热情地同彭德怀握手。

主席拉着彭德怀坐了下来。主席说：“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收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儿就会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亲王，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这时，彭德怀同志对我说：“这位同志不认识。”

徐业夫秘书说：“他是张耀祠同志。”

过了一会儿，少奇、小平、彭真同志到了。

毛主席说：“现在要建设大小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他对着彭德怀说：“你去西南是适当的。”

主席沉吟片刻，说：“你说的三条保证，我还记得后面两条。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作结论吧！”

毛主席向少奇、小平、彭真同志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是中央的决定。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到三线是我提议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主席说，“由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的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当天的谈话，我和徐业夫秘书、吴旭君护士长均在场。当时我心里很不平静，主席的心胸是多么的宽阔，“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说明主席也在

反省自己的问题。而再一次请彭德怀出来工作，又反映了主席不管在任何时候都是为了大局出发，着眼于中国革命和建设。

### 3. “朱毛是分不开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操纵下，中南海机关的一些造反派写大字报攻击一大批老干部，其中有几张大字报诬蔑朱德同志是“黑司令”，对中国革命没有做出多少贡献。

朱德同志看了大字报，有一种惶恐感，对造反派争辩说：“我不是黑司令，我是同毛主席一条船上的人。”

有一位工作人员把贴朱德大字报的内容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后非常生气地说：“朱总是红司令，不是黑司令！”

有一次政治局召开会议，朱德同志来到游泳池，毛主席热情地站起来同朱总握手，请他挨着坐下。

毛主席亲切地说：“红司令！红司令！你好吗？”

朱总说：“好，好，我很好！”

毛主席把头靠在沙发上，说：“有人讲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我总是批评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你是朱，我是朱身上的毛啊！”“朱毛是分不开的嘛”。

毛主席讲话时总是那么幽默风趣。

### 4. 毛主席追查：是谁批斗中央领导人？

1967年7月中旬，毛主席到达武汉巡视工作，住在东湖宾馆。7月19日晚至20日凌晨，发生了“七·二事件”，武汉造反派抓走王力，要揪谢富治。7月20日早6时多，毛主席离开东湖来到武汉飞机场，乘飞机飞往上海。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策划下，由戚本禹具体指挥中南海一些造反派，事前召开会议布置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要求他们绝对保密。

1967年8月5日下午，在中南海分三批到刘、邓、陶家里进行批斗。并将批斗的现场情况拍成电视，准备向全国播放。

8月5日晚和次日上午，相继接到杨德中、武健华同志的电话向汪东兴同志报告，汪东兴及时向主席汇报了中南海发生的事情。

毛主席听后大为光火，非常生气地说：“是谁人干的，要追查！”

汪东兴同志把毛主席的指示，打电话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很明显，毛主席是不知道和不同意他们这种错误做法的。

在周总理追查的同时，戚本禹又召开会议，也进行追查，他们追查“是谁告的密？”这是林彪、江青一伙人乘主席不在北京、未经请示所采取的错误做法。他们自作主张，违犯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是有意把“文化大革命”搞乱。事实说明，他们的错误做法是有意封锁毛主席的。之后他们打倒了那么多老干部，有许多人毛主席是不知道的。中南海的这一事件败露后，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他们要“五·一六”组织派专人搜集周总理的材料，并策划了冲中南海揪周总理的阴谋计划。“五·一六”组织中，有些人看到中南海警卫严密，产生害怕心理，没有敢动。

8月7日，王力领头在外交部讲话，挑动学生冲外交部，揪陈毅外交部长。8月16日，这伙人封了外交部的大印。8月17日，他们押着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游街。8月20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周总理找到了王力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代总长带到上海，请毛主

席定夺。

毛主席看完王力的讲话稿，找到杨成武说：“我考虑好了。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杨成武记了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林彪、陈伯达、江青相勾结，表面上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实际上干着分裂党、摧毁党的罪恶勾当，把忠于党、忠于人民事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干部统统打倒，便于他们实现篡党夺权的阴谋。

#### 5. “你们比我的儿女都好”

搬到游泳池后，李讷还住在丰泽园。李讷生了孩子。我去看她时，她对我说：“生了孩子，雇了保姆，生活上有些困难”。

我对李讷说：“向你父亲要一点吧！”

回到游泳池，我对主席说：“主席，李讷生了孩子，生活上有些困难，主席能否给她点钱？”

主席正看着书，这时抬起头来，对我说：“给多少呀？”

我说：“给她八千元吧。”

主席说：“给那么多呀？我的钱是工人农民给的呀！”他坐在那里抽了几口烟，想了一下，说：“好吧，给她八千元，先给她三千，那五千元等她走时再给。”

我说：“我写一个领条，主席批一下吧。”

主席说：“不要了，你去办吧。”

之后，我写了领条，请管理员吴连登同志到特会室领了回来，先给李讷三千元，那五千元帮她存银行，等她走时再给她。钱都是吴连登同志经手办的。

1970年，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访问中国，给毛主席送来了一些芒果，毛主席不吃，我担心放久了坏了，便给张玉凤同志说：“你向主席报告一下，是否把芒果给他在北京的孩子送去一些？”

毛主席却说：“不要给他们，给大师傅、你们和警卫战士吃吧。你们比我的儿女都好。”

毛主席时刻想着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在政治上爱护、生活上关心，这一点凡在主席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无不铭心刻骨。



## 后记

我的这本回忆录今天面世了。

由于我的水平有限，书里必然会有不少不准确和错误的地方，诚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辑同志大力支持和帮助，我表示谢意。

本书由毛卓同志负责整理形成。我基本给他谈完了我在主席身边 40 余年的见闻，他自己也对主席作了大量的研究，我们一块去粗取精，将本书删改了 11 次之多。他积极认真，做了大量工作。我对他的工作很满意，在此表示感谢。

张耀祠

1996 年 9 月 9 日

